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何思因博士

權力抗衡到政治均衡：以近代愛爾蘭經濟與
外交策略為例



研究生：陳建豪撰

中華民國一百年一月

謝辭

九十年蓋達組織衝撞世貿雙子星，納莉颱風重創台北城，而我進入了政大政治，從此開啟了我與政治學系的不解之緣。少數人為了選校以政治系為跳板；而我沉浸在本系學術氛圍內，轉眼就要十年。從學士到碩士我毫不後悔，因為當年選我所愛，如今我愛我所選。今年是建國百年，而我也要告別政大求學生涯。

首先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何思因老師，大學跟著您研讀政治、經濟、外交、文學。受您的影響，我在政治學本科之外，又備齊經濟、統計、微積分、會計等諸多工具，讓學生在未來的道路上更具競爭力。更感謝您在百忙的公務中，撥冗悉心指導學生的論文，讓學生對為學有重新的體認。冷則剛老師，當我還是懵懂無知的碩一新生時，擔任系主任的您對本班所付出的關心，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您主動了解我們，協助我們，身為您的研究助理，所獲得的關心更是不在話下。系辦公室銀珍、詠雯助教，教導我許多課堂上所學不到的職場課程，很榮幸在最後這半年能夠從工讀生轉為你們的同事，時間雖短，但每日下午的咖啡時光令我難忘。

盛杏媛老師，您方法論課程是我為學基礎，若不是您的鼓勵與堅持，我不會在碩二就有論文發表；黃紀老師您的授課，讓我愛上統計，而我更敬佩的是您對學問的堅持；林繼文老師的賽局，架構了我對政治學的科學思考。寇健文老師的中共政治改革，讓我對中國大陸有了新的認識。還要感謝您與信豪學長對我的賞賜，雖然始終因資料原故而遺憾無法完成環渤海的文章。大學加上研究所郭承天老師您是我四年的導師，感謝您和師母對學生們的關心與照料，是你們讓我堅信政治系是個正確抉擇。郭立民老師您那縱貫古今橫越中西的思想十二學分，對我人生的啟迪則更勝千百。六年前民生東路麥當勞那堂課，見識到您對教學的堅持與熱誠，不能繼續在本校本系的課堂上繼續見到您的身影，絕對是政大最大的損失。

我還要感謝戰友們：阿派、二哥、生哥、郁明。研究所考試的讀書會，讓我們輝煌的戰功榮耀了本系的榜單。沒有你們，別說榜首，可能連備取都沾不上邊。高個、小牙、俞萱、青慈、維茵，碩一的比政讀書會有你們，我才可能每週安全過關。當然還有六月、聯康，你們是咖啡及四川良伴，屢屢論文寫煩了想大吃大喝你們總是義不容辭。還要祝福研究所本班所有同學，希冀我們來日前程似錦！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感謝我的家人，媽媽、爸爸、姊姊。感謝你們讓我在學生生涯能夠潛心向學，一路走來無後顧之憂。政治系雖非你們所愛，但你們依然還是支持我走了下去，如今我若有任何一絲一毫的成就，都要歸功於你們。謹以這本論文獻給你們，謝謝！我親愛的家人。今日正好是元宵節，桌上一根湯匙配上兩顆湯圓，代表的就是一百，願將來日日都是百分百的圓滿、百分百的平安。

辛卯年正月十五日于台北

權力抗衡到政治均衡：以近代愛爾蘭經濟與外交策略為例

摘要

本文首先討論權力平衡與政治均衡的差異。以 Waltz 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是力學式、演繹邏輯的國際觀；而 Schroeder 的政治均衡則是生物學式、整體式、歸納的國際觀。權力平衡與政治均衡構成本文的分析架構。本文採歷史研究法，以愛爾蘭為例，說明愛爾蘭在受到「國家」、「人」、「國際體系」的影響後，放棄抗衡的策略後，均衡的國際觀才為愛爾蘭帶來和平與繁榮。

愛爾蘭自十二世紀起成為英國的殖民地，累積八個世紀的恩怨情仇在二十世紀初爆發。愛爾蘭政治家 de Valera 採用抗衡式的經濟外交策略，即使愛爾蘭成為歐洲的乞丐也在所不惜。1959 年接手主政的 Lemass 對國家利益則有完全不同的見解。取消閉關自守的經貿政策、大膽與英國簽訂英愛自由貿易協定，促使愛爾蘭在 1973 年順利加入歐洲共同體，開啟了塞爾特之虎的序幕。

文末則是回到兩岸關係的探討。台灣與愛爾蘭相似點在於，同屬小國且也同樣面對同文同種的強敵威脅。台灣或可以愛爾蘭為鏡，走出成功的小國國際政治。

關鍵字：英愛自由貿易協定 (AIFTAA)、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經濟戰爭 (Economic War)、愛爾蘭 (Ireland)、政治均衡 (Political Equilibrium)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3
第一節	前言.....	3
第二節	抗衡觀與政治均衡觀.....	5
第三節	愛爾蘭研究相關文獻.....	12
第四節	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	15
第五節	章節安排.....	24
第二章	愛爾蘭島與大英帝國的歷史情仇	25
第一節	1171-1800 愛爾蘭與英格蘭的衝突	25
第二節	併入英國後的經濟發展.....	32
第三節	19-20 世紀初的政治發展	46
第三章	愛爾蘭近代經濟與外交	53
第一節	自由邦政府時期的經濟戰爭.....	53
第二節	語言復興運動與二戰時的經濟外交.....	69
第四章	蛻變的塞爾特之虎	80
第一節	二戰後愛爾蘭的國內情勢.....	80
第二節	AIFTAA 與 EC	90
第五章	結論	103
參考書目	113

圖表目錄

圖 2	影響愛爾蘭經濟外交決策之模型.....	16
圖 3	近代愛爾蘭經濟外交策略圖.....	21
圖 4	愛爾蘭 1940 年代死亡率分區圖.....	34
圖 5	1841-1890 愛爾蘭外移人口數.....	36
圖 6	1841-1890 愛爾蘭平均外移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36
圖 7	1841-1861 馬鈴薯與燕麥價格變化.....	39
圖 8	1842-1850 愛爾蘭穀物進出口量.....	41
圖 9	19 世紀中愛爾蘭語人口分佈圖.....	71
圖 10	1926-2002 愛爾蘭語人口總數.....	74
圖 11	1926-2002 愛爾蘭語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百分比.....	74
圖 12	1991-2002 平均每年淨外移人口.....	87
圖 13	1950-2000 愛爾蘭經濟成長率變化.....	94
圖 14	愛爾蘭對英國進出口比例.....	96
圖 15	愛爾蘭與英國衝突合作分析圖.....	100
圖 16	歷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累積額度.....	109
圖 17	歷年對中貿易佔我國總貿易百分比.....	109
表 1	英愛經濟外交策略分析表.....	18
表 2	1922-1933 愛爾蘭主要政黨國會席次及百分比.....	56
表 3	愛爾蘭經濟戰爭前後之進出口變動.....	65
表 4	1926-1946 愛爾蘭農、公、服務業人口比例.....	76
表 5	愛爾蘭國會主要政黨席次分配及所佔比例.....	83
表 6	兩岸經濟外交策略分析表.....	10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普魯士名將克勞塞維茨 (Karl Von Clausewitz) 於《戰爭論》(Vom Kriege) 中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在國際政治中，我們也經常發現到外交受到內政的影響。觀察近代愛爾蘭與英國的經濟外交關係，本研究發現愛爾蘭國內的政治發展，始終是牽動英愛關係的關鍵變數；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治口號，反映在實際的經貿政策上。無論從政治、文化還是地緣上來看，愛爾蘭自古以來就與英國關係密不可分。自十二世紀英格蘭軍隊登陸開始，愛爾蘭長期受到英國的殖民，歷經數百年的衝突浴血抗爭後，愛爾蘭在 1921 年成立「愛爾蘭自由邦」，1949 年脫離大英國協建立「愛爾蘭共和國」。然而愛爾蘭在經濟上的表現，卻未因政治上的獨立而脫胎換骨。愛爾蘭近代的經濟外交政策可以 1959 年總理 Eamon de Valera (1882-1975) 交棒給 Sean Francis Lemass (1899-1971) 作為分水嶺，前後呈現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

從 1932 年 de Valera 重返執政舞台開始，愛爾蘭政府所採取的對英外交策略，符合新現實主義學者 Kenneth Waltz 的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 觀點。1932-1938 年不惜發動經濟戰爭與英國相抗衡，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拒絕與英國站在同一陣線，以彰顯外交政策的自主性。除此之外，為了能在經濟上獨立自主以達到提升國家能力的目標，愛爾蘭到了二十世紀中仍維持幾近「閉關自守」的貿易政策。相較於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的復興蓬勃，民族主義主導的經濟外交政策帶給愛爾蘭的卻是貧窮，不是發展。1959 年以後，愛爾蘭在新任總理 Lemass 的帶領下轉變對外的經貿策略。愛爾蘭依循國際建制，與包含英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進行體制內的會談協議，積極尋求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Lemass 對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定義與 de Valera 並不相同，至此愛爾蘭的新策略

符合 Schroeder 所提出政治均衡 (Political Equilibrium) 的國際政治觀。鼓勵自由貿易的新經濟外交政策也成功使得愛爾蘭的經濟起死回生。

過去國內政治學者對愛爾蘭的研究，多著重於愛爾蘭獨立建國的過程。近年來，一直到 2008-09 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前，愛爾蘭因為亮眼的經濟成長，成為經濟發展學者的重要研究目標。但是很少有學者針對其經濟外交策略作分析研究。本文希望能比較愛爾蘭在 1932-1959 年與 1959 年以後兩個時期的經濟與外交策略，說明愛爾蘭這個與強權為鄰的小國，在放棄追求抗衡與經濟完全自主的策略後，改而追求「政治均衡」，才為愛爾蘭帶來和平與繁榮。文末則嘗試從愛爾蘭的經驗當中，找尋我國經濟外交政策的借鏡。

在下一節當中本研究所要討論的是新現實主義學者 Kenneth Waltz 所提出的「權力平衡」以及歷史學者 Paul Schroeder 所提出的「政治均衡」分析架構。這兩個概念將構成本文的分析架構。

第二節 抗衡觀與政治均衡觀

新現實主義中最具代表性的學者 Kenneth Waltz，於 1979 年在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書中提出「權力平衡理論」(Balance of Power Theory)。

「傳統現實主義」學者如 Hans Morgenthau 認為，個人會追求利益的極大化，權力本身就是行為者最主要的目的所在。而國家乃是個人的擴大，同樣會以追求利益極大化為目標，因此各國無不追求權力極大化。但若每個國家都毫無止境的追求權力極大化，世界將爭戰不休永無寧日。因此基於理性思考的國家，均應自我約束對權力的追求，權力平衡才能實現。換句話說，Morgenthau 把權力平衡看作是各國刻意營造的結果¹。相對的，以 Waltz 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不認為權力為國家最終追求的目標，國家追求的是「生存」，權力只是生存必要的工具。

Waltz 對國際體系有一最基本的假定：國際間各國為己，沒有合法暴力的壟斷者。這種狀態可稱為無中央政府狀態 (anarchy)²。有別於同一國家內各個行為者的整合，在國際體系中，國家與國家間有互賴關係 (interdependence)，可是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可以保證國際社會的成員不起衝突或是防止戰爭的發生。一個國家如果過度依賴他國將提高其生存風險。處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中，各國都要設法自助(self-help)³。各國既以生存為目的，內則必須使自己富強，外則要與他國結盟，對抗強權。就在「競爭」與「社會化」的雙重作用下，各國的行為自動趨同，漸漸的將形成權力平衡 (Balance of Power)，也就是弱國會結盟他國對抗強國⁴。Waltz 對國際政治的分析架構可稱為結構理論。

(圖 1 約略至於此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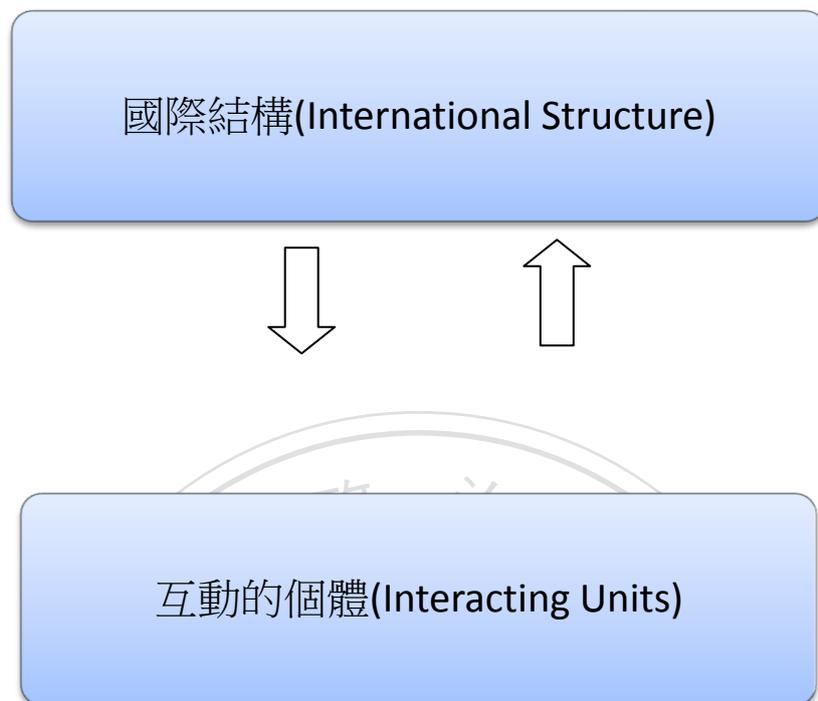
¹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Y: McGraw Hill, 1985) p. 187

² Waltz, N.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102~128.

³ Waltz, N. Kenneth., "Force, Order and Justi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1, No. 3 (September, 1967), p. 279.

⁴ Waltz, N. Kenneth, 前引書，註 2, pp. 102-128.

圖 1 結構理論研究架構



資料來源：節錄自 Waltz, N.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40.

Waltz 主張國際體系有兩個層次，即國際結構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以及互動的個體 (Interacting Units)，前者框架了後者的活動，而後者互動的結果會影響前者。Waltz 認為國際結構由國家的「能力(Capability)」、「數目(Number)」、「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Ordering Principle)」決定⁵。在國際社會中，各國雖有大小及能力之別，但在功能上，各國都要自助以圖生存，並無差異。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國際體系中，國際結構限定了行為者的行為模式：各國為求生存必須制衡強權。這是自然形成的趨勢並非政治人物刻意追求而來的。個體互動的結果自然形成權力平衡的國際結構。

自助的國際體系中，各國都希望能夠自助以減少對他國的依賴，當國際體系中的強權 (Great Powers) 越少，越能夠使體系穩定。Waltz 認為權力不平等，但權力的不平等並不會阻礙權力平衡。在國際政治中，不平等乃是既存的事實，強權可以從中獲得較大的利益。身為既得利益者，強權將有動機維持體系的穩定。

然而，若將 Waltz 的權力平衡理論運用在分析愛爾蘭近代經濟外交策略時，會遭遇到一個最直接的問題：為何愛爾蘭還要抗衡英國，而不抗衡美、蘇。英國進入 20 世紀以前的確是世界的霸權，愛爾蘭在過去也曾試圖聯合英國的敵人來對抗英國統治⁶。但是到了 20 世紀，經歷過兩次的世界大戰後，美國、蘇聯才是新的強權，但愛爾蘭並未抗衡美、蘇。

這個問題或許可以 Stephen Walt 所提出的 Balance of Threat 來解釋。Balance of Threat 是修正 Balance of Power 而成，他將主觀的意圖加入分析。Balance of Threat 認為「國際結構層次」並非決定國家行動策略的單一變數。Walt 以第二次大戰後的國際結構為例，如果單看結構層次，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在各方面

⁵ Waltz, N. Kenneth, 前引書, 註 2, pp.88~98.

⁶ 曾經聯合詹姆士二世、西班牙等英王的對手來對抗英王。

都比蘇聯強大，那麼許多美國的盟友都應該與蘇聯結盟來抗衡美國⁷。因此除了國際結構層次之外，「國力」、「地理位置」、「攻擊能力」、「攻擊意圖」也是分析的關鍵⁸。依此四標準，當一個國家察覺到另一個國有改變現狀的意圖時，才會構成威脅。當威脅程度越高，國家越會採用抗衡 (balancing) 的策略，反之則會依附 (bandwagoning)⁹。運用 Walt 的觀點，20 世紀的愛爾蘭之所以沒有抗衡美、蘇強權，可以解釋成是因為美、蘇距愛爾蘭的地理位置不如英國那麼近，且美、蘇也沒有攻擊愛爾蘭的意圖，所以愛爾蘭並不認為美、蘇會對其造成威脅。而 de Valera 會繼續抗衡英國自然是因為八個世紀以來的殖民仇恨，英國總是愛爾蘭最大的假想敵，最大的威脅來源。

但 Walt 的理論在運用上，卻又難以解釋為什麼愛爾蘭在 1959 年開始突然轉變策略，不但不再抗衡英國，甚至與英國簽訂 Anglo- Irish Free Trade Area (AIFTAA)，英國的威脅不會在一夕之間突然消失。這個問題可嘗試用 Randall Schweller 的觀點來解釋。

Schweller 認為抗衡與依附並非總是相反的策略，而且國際政治現實中依附的例證往往多於抗衡。一小國可以藉由依附於另外一個強國，從中取得利益。在 17 世紀 Dutch War (1672-1679) 中的英國，就為了取得補償金與領土，選擇依附法國共同對抗荷蘭¹⁰。依附他國可能是為了穩定，以依附來達到維持現狀的目的。但依附他國也可能是因為對現狀不滿，想要藉由依附來增強實力，來突破現狀。Schweller 依照對現狀的不滿的程度由強到弱，將國家分為四類：狼(Wolves)、豺(Jackals)、羊(Lambs)、獅(Lions)。前兩者對現狀不滿，會依附他國以求改變現狀；「羊」則是為了維持現狀而依附。只有對現狀最滿意的「獅」才會採取抗衡的策

⁷ Walt, M. Stephen,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275.

⁸ 前揭書, p. 59.

⁹ Walt, M. Stephen, 前引書, 註 7, pp. 17~23.

¹⁰ Schweller, L. Randal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90.

略¹¹。因此，若依照 Schweller 的論點，1959 年愛爾蘭開始與英國在多項經濟議題上合作，乃是為了壯大本身取得利益。易言之，愛爾蘭是要藉由依附英國改善愛爾蘭經濟發展不佳的現狀。但如此一來，又回到原先最基本的問題：是什麼原因造成 1959 年前與 1959 年後的愛爾蘭有不同的決策。因此，本文就希望能在新現實主義之外，再找出更好的解釋途徑來說明此一轉變。

學界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非常繁多，其中以 Vasquez 的批評最為深入。Vasquez 就「什麼樣的理論才是典範」作為批評的基本點。Vasquez 採用 Imre Lakatos 的標準，從典範的意涵及理論的研究設計出發，對新現實主義理論進行評價¹²。若新理論建構只是為了解釋舊理論無法解釋的異例，因而僅在舊有的理論之下再去做出的語意修正，那麼這個理論就是退化中的理論¹³。依此標準他認為現實主義一直以來都在退化中，原因是諸多現實主義學者都是在 Waltz 權力平衡的框架下，當發現事實與理論不符時，就對理論進行語意上的修正。如同前文所述，從 Waltz 到 Walt 又到 Schweller，新現實主義被修正地越來越多，卻沒有新觀點。語意修正降低理論的「可否證性」，新現實主義就愈來愈走進死胡同¹⁴。

儘管對新現實主義的批評很多，但是 Waltz 的理論卻十分精鍊，對國際政治的研究重點，如能力、數目、權力關係等，提出言簡意賅的觀察。因此新現實主義仍是許多國際政治分析的起始點。

和 Waltz 力學式的、演繹邏輯的國際觀點成為鮮明對比的是 Schroeder 的生物學式的、整體式的、歸納式的國際政治觀點。Schroeder 著重歷史途徑，關注每一個歷史事件的獨特性，歷史上有很多霸權都沒有被抗衡，被抵制的霸權乃因

¹¹ 前揭書, p. 100.

¹² Vasquez, John,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New Jerse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1981).

¹³ Vasquez, John,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Programs," in, Vasquez John and Elman, Colin eds.,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rentice Hall, 2003), pp. 26.

¹⁴ 前揭書, pp.30~42.

過度擴張帶給他國不安。例如拿破崙的霸權興起之時，周遭的小國不但沒有抗衡他，反而選擇與之結盟來分享利益。拿破崙遭到討伐是因為過度擴張帶給他國不安全感¹⁵。他認為人、國家、體系會互動而形成每個時代特殊的國際關係。他進而提出政治均衡 (Political Equilibrium)的觀點¹⁶。他的均衡觀點和「生態均衡」的觀點很接近。Schroeder 認為，國際政治中各個國家無論從軍事力量或是經濟實力衡量，各國的權力(Power)不會均等，國際體系中的各個行為者該依照自己的能力(Capability)，在有限的選擇中作出最佳決策努力適應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因為每個國家的天賦不同，因此即使面對相同的環境，每個國家都可能採取完全不同的適應方式。也有可能天賦相同的國家面對不同的環境，採取完全不同的適應方式。國家的存續並不一定會機械式地聯合其他國家相互制衡以求權力平衡，而是要客觀評估自己的能力追求政治均衡。

以十九世紀的歐洲國際政治為例，雖然新現實主義學者多認為此時期的國際體系是典型的權力平衡；但 Schroeder 看到的是權力均衡，不是機械式的權力平衡¹⁷。Schroeder 認為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乃是經由各國代表在維也納會議上，透過協商機制所達成的政治均衡。各國所欲追求的並非武力上的平衡，也不是要制衡強權。相反的，各國肯定良善的強權有助於達成政治均衡。維也納會議之後的歐洲各國達成共識，接受英國和俄羅斯兩大強權的存在。1815-1848 年歐洲的和平穩定乃是因為英國和俄羅斯兩大強權的自制而穩定¹⁸。

綜合上述，政治均衡理論和權力平衡理論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政治均衡理論認為國際政治並非僅僅只有「力」的存在，還包含了各國對於規範、條約以及道德價值的尊重，各國家領導者之間可能依許多變數處理國際關係，並非只從權力

¹⁵ Schroeder, W. Paul, "Why Realism Does Not Work Well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Vasquez, John, and Colin Elman, ed.,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rentice Hall, 2003), pp. 116~117.

¹⁶ Schroeder, W. Paul,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 Essay o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46

¹⁷ 前揭書, pp. 232~236.

¹⁸ Schroeder, W. Paul, 2004, 前引書, 註 16, p.46.

角度來處理國際關係。本文並非要評價新現實主義的適用性，而是要尋求 1959 年前後兩期差異性的最佳解釋途徑。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Waltz 的權力平衡理論分析 1932-1959 的愛爾蘭經濟外交策略；對於 1959 年以後則採用 Schroeder 的政治均衡理論。在下一節當中，本研究要回顧國內外政治學者對近代愛爾蘭的研究成果。



第三節 愛爾蘭研究相關文獻

國內學者過去對愛爾蘭的研究，多著重於愛爾蘭的文學成就、宗教問題及獨立建國的過程，近年因愛爾蘭卓越的經濟表現，使得學者開始探討愛爾蘭的經濟成長因素。學者們泰半認為，愛爾蘭的經濟發展深受英國殖民的影響。學者張勝柏認為，愛爾蘭經濟在 19 世紀出現停滯，除了因 1840 年代的大饑荒造成人口外移與生產力流失，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英國的殖民政策。長久以來英國在愛爾蘭的土地掠奪，使絕大部分的土地掌握在極少數的英國人或愛爾蘭裔新教徒手中，占人口比例多數的愛爾蘭人天主教徒，反倒淪為佃農階級。殖民地的經濟型態，主要作用是滿足殖民母國的需求，對產業並沒有整體性的規劃。甚至到了 20 世紀初期，愛爾蘭仍無法擺脫此種殖民地經濟型態，多數的愛爾蘭人仍必須仰賴農業維生，農產品的出口也大多集中於英國市場¹⁹。

學者甘逸驊指出，愛爾蘭在北愛爾蘭問題上與英國的齟齬，使得愛爾蘭島一直給人動盪不安、貧窮飢饉、人口外移的負面印象。從 1970 年代開始，愛爾蘭與英國開始在北愛問題上尋求非暴力的管道來解決，經過 20 多年政府間與國際力量等多元面向的介入，北愛衝突逐漸獲得控制²⁰。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是愛爾蘭經濟蛻變的轉捩點。學者杜依庭分析，在歐洲經濟整合逐漸成型的初期，愛爾蘭就得以加入，可謂佔得先機，搶占英國以外的歐洲市場。然而歐盟東擴後，來自東歐國家更廉價的勞動力，對工資已經上揚的愛爾蘭而言將會是一大挑戰²¹。儘管如此，由於長期受到英國殖民的緣故，英語雖然是愛爾蘭的「第二」官方語言，卻是愛爾蘭人最為普遍使用的語言，此一殖民背景的遺緒對愛爾蘭進入國際

¹⁹ 張勝柏，「論十九世紀愛爾蘭經濟發展的困境」，**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10 期（2006 年 12 月），頁 190~192。

²⁰ 甘逸驊，「北愛爾蘭和平進程：政府間因素與國際勢力的介入」，**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04 年 3、4 月），頁 5~12。

²¹ 杜依庭，「全球化下愛爾蘭經濟發展過程之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頁 99~102。

市場反倒成為一股助力。學者張亞中認為，語言的優勢再加上高素質的勞動力，使愛爾蘭成為美商跨國企業的最愛。就愛爾蘭而言，這是其他東歐國家無法相提並論的優勢²²。

除卻歷史因素，近年來愛爾蘭政府本身所做的努力也不容抹煞。學者李秋錦歸納愛爾蘭政府的成功要素：

1. 政府財政改革。政府運用歐盟的資金補助，不但償還了長久以來因為不當的福利制度所造成的政府債務，更充實了愛爾蘭的基礎交通建設，有助於產業升級。
2. 區域的安全和平。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從 1960 年代開始大幅改善，北愛爾蘭的緊張情勢也在兩國的合作下趨於緩和。
3. 社會契約促成高效率的社會夥伴關係。1990 年代愛爾蘭產官學合作以及和諧的勞資關係，共同促成新一波的經濟高峰。
4. 優質的投資環境與人力資源。政府在賦稅政策上，刻意調降稅率吸引外資；優良的科學技術教育，養成許多說英語的高科技人才，深受美商青睞²³。

國外學者研究愛爾蘭發展最具代表性的學者為 Burnham、Barry 和 Walsh。Burnham、Barry 都認為愛爾蘭近年來崛起，「歐盟」的角色不可或缺。歐盟要求會員國必須去除關稅障礙，初期對愛爾蘭部分傳統產業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因為這些產業長期受到政府高度保護，市場過度集中於本國市場，頓失關稅的保護傘

²² 張亞中，**小國崛起：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 年），頁 195~226。

²³ 李秋錦，「愛爾蘭經濟發展對我國的啟示」，**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42 卷第 1 期（2006），頁 7~10。

林健次，「愛爾蘭成長模式」，施正鋒、謝若蘭主編，**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9 年）頁 152。

後，難以面對外來同業的競爭²⁴。但歐盟對愛爾蘭的巨額補助，卻讓愛爾蘭迅速振作。愛爾蘭政府將部分的補助款投入改善基礎交通建設，特別是航空運輸；另外還有相當高的比例，由愛爾蘭產業發展部(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負責規劃，致力於發展高等育，尤其在科學技術教育的投入著力甚深²⁵。

IDA是愛爾蘭政府在1949年所設立，主要負責制定愛爾蘭的產業發展政策。Walsh認為，一直到了1950年代晚期，愛爾蘭逐步放棄自給自足的經濟策略後，IDA才有較大的揮灑空間。隨著對自由貿易的解禁，IDA主張調降公司與個人所得稅率，藉以吸引外商投資。起先針對資本密集的製造業，漸漸再擴展到服務業²⁶。1980年代IDA開始規劃培育愛爾蘭本土人才，造就了許多專業人士。又因為與美國在語言文化上的相似，再加上地處美洲與歐洲大陸之間，比起歐洲大陸各國，愛爾蘭對於美商資本的吸引力更大²⁷。學者Barry及Burnham更提到，1980年代愛爾蘭解除與英國間的空中交通管制，非但使觀光旅客人數口呈倍數成長，更讓愛爾蘭扮演起歐美間轉運樞紐的角色²⁸。

事實上任何單一因素，都不足以完全闡釋賽爾特之虎的崛起，更無法完整解釋1959年起愛爾蘭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策略的轉變。本文研究目的希望在於「歐洲統合」和「內部政策」之外，提供「經濟外交」的解釋途徑。更具體而言，本文是藉由比較de Valera、Lemass及其繼任者所採行經濟外交策略來看愛爾蘭的崛起。

²⁴ Barry, Frank, "Ir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ree Decades of EU Membership," *Czech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53, No. 9-10, (2003), pp. 408~409.

²⁵ Burnham, James, "Why Ireland Boomed," *Independent Review*, Vol. 7, No. 4, (2003), pp.545~547.

²⁶ Walsh, Brendan, "The Role of Tax Policy in Ireland's Economic Renaissance," *Canadian Tax Journal*, Vol. 48, No. 3, (2000), pp. 666~667.

²⁷ 前揭書, pp. 671~672.

²⁸ Barry, Frank, 前引書, 註 24, pp.537~538.

第四節 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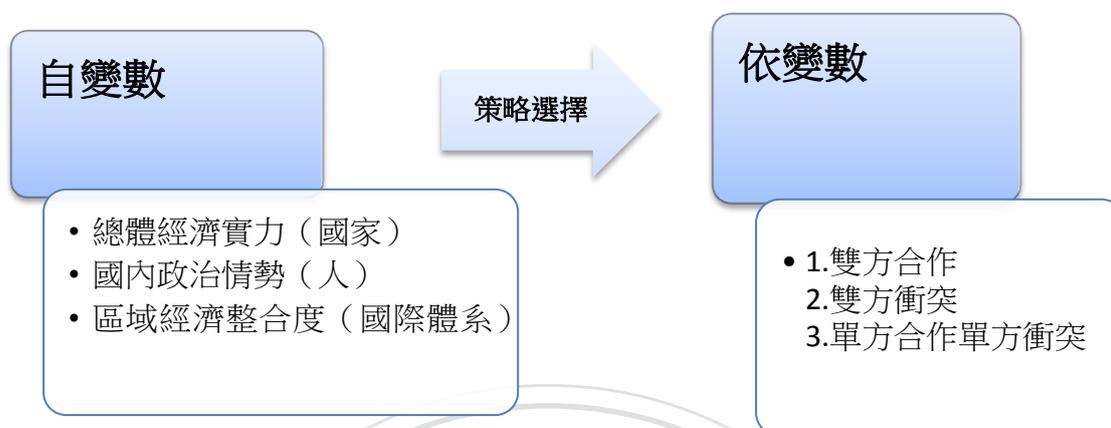
論及愛爾蘭與英國的經濟外交關係，不免會提及宗教衝突以及愛爾蘭的獨立過程，但本文並非針對宗教及民族問題作探討，宗教與民族問題僅是英愛關係的參考背景。然而，欲了解國家的決策，時空背景條件仍是不可忽略的關鍵因素，因此本文在第二章仍會對愛爾蘭宗教與民族問題作一歷史回顧，在此基礎之上分析經濟外交政策才不至於落入空中樓閣的泛談。

文章採用歷史研究法，從愛爾蘭出發針對國家、政治領導者、國際體系三個層面進行分析。在國際體系上，一次大戰結束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倡議民族自決，愛爾蘭利用這個機會於 1921 年成立自由邦。1932 年 de Valera 重新執政，國際上孤立主義瀰漫，在經濟上又遭逢經濟大蕭條，各國關稅壁壘分明。此時愛爾蘭主動出擊，與英國展開為期六年的「經濟戰爭」，企圖改變現狀。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機會，愛爾蘭在 1949 年獨立成功。政治上雖獲得勝利，但經濟卻每況愈下。同一時間的歐洲，適逢關鍵的重建時期，利用「戰後復興計畫」歐洲各國快速發展經濟。1959 年 Lemass 執政後，國際上進入歐洲統合的新階段，愛爾蘭改變經濟外交策略，終止閉關自守政策重新加入國際市場。國際體系的轉變對愛爾蘭的發展影響確實不小，但個體層次的國家、政治領導者的影響也是本文的討論重點所在。

欲探討 1959 年以前與 1959 年以後的愛爾蘭，會在經濟外交上有截然不同交策略。首先，本研究要釐清本文的自變數與依變數。

(圖 2 約置於此)

圖 2 影響愛爾蘭經濟外交決策之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在影響國家決策的自變數上，本文將從「總體經濟實力」、「國內政治情勢」、「區域經濟整合度」三個面向來推估。這三個指標依序分別代表政治均衡理論「國家」、「人」、「國際體系」。

總體經濟實力，意指國家是否有能力在經濟上與他國相抗衡。面對衝突時，是要犧牲經濟利益，還是要在其他方面退讓以換取經濟成長。以愛爾蘭而言，他的對手就是英國。從自由邦建立到愛爾蘭真正崛起以前，愛爾蘭的經濟實力毫無疑問遠不如英國。

國內政治情勢則是指，當國家領導者面臨國內人民的壓力，領導者在做出決策前，必先衡量本身是否有足夠的政治資本。究竟是要如 de Valera 依民族主義的「民意」行事，抑或如 Lemass 站在領導人的高度發揮影響力，回過頭來說服群眾，而不是被民族情緒牽著走。

區域經濟的整合度則是指國際市場的重要性。隨著國家在產業上從第一及傳統產業轉換至二三級產業時，國際市場的重要性將與日俱增。愛爾蘭在自由邦時期，恰逢 1930 年代國際孤立主義興盛關稅壁壘分明，國際市場的整合度並不高。但是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歐洲的復興，國際貿易更勝以往，國家的決策過程不得不將區域經濟納入考量。因此我認為「總體經濟實力」、「國內政治情勢」、「區域經濟整合度」這三個指標對英愛經濟外交關係有決定性的影響。

依照前述的分析模式，愛爾蘭和英國的互動可能有四種結果產出，下頁整理出一個 2x2 的互動關係表。

(表 1 約置於此)

表 1 英愛經濟外交策略分析表

愛爾蘭 \ 英國	合作	衝突
合作	共創雙贏。	即使英國不合作，愛爾蘭仍可尋求其他國家作為貿易夥伴。
衝突	英國隨愛爾蘭調整政策，愛爾蘭從中獲利。	不顧經濟利益，造成貿易衝突。英國小有損失，愛爾蘭陷入經濟困境。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表 1 中行為者設定為愛爾蘭、英國，行動策略則可分為「合作」或「衝突」。各階段的合作與抗衡意義不同，對愛爾蘭與英國的判準也不同。但大體而言，愛爾蘭方面的「合作」是指不挑戰主權現狀、遵守條約、開放自由市場；而「抗衡」則是指挑戰主權現狀、毀約、經濟閉關自守、去英國化。在英國方面，「合作」是指簽訂協議、加強經貿往來、默許愛爾蘭主權變更；英國的「抗衡」策略，不外乎經貿制裁、武力威嚇。至於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決定國家經濟外交政策的產出。

表 1 中可見的四種結果是「雙方合作」、「雙方衝突」、「愛爾蘭合作但英國衝突」、「愛爾蘭衝突但英國合作」。依據史實，從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英國的反應都是依愛爾蘭的行動所做出的反應。當愛爾蘭採取衝突策略時，英國也同樣採用衝突回應；反之若愛爾蘭肯與英國合作，英國也會採行合作的策略。因此本文是要探討前兩種情形，即為何「雙方合作」與「雙方衝突」。

接下來要討論為什麼愛爾蘭會從 1959 年前的衝突策略，轉為 1959 以後的合作策略，這正是我的研究目的所在。依據人性的最基本假定，所有的行為者都是趨利避害，選擇使己方利益極大化的行動選項。評估了「總體經濟實力」、「國內政治情勢」、「區域經濟整合度」，de Valera 在執政期間採取了衝突策略。de Valera 一直以來就是依靠民族主義的訴求而發跡，1932 年的大選中也是以民族主義的訴求來擊敗對手。對於國家利益，de Valera 和 Lemass 有著截然不同的定義。在 de Valera 的認知中，鞏固執政黨 Fianna Fail Party 的執政地位是當務之急。再加上當時遭逢全球經濟大蕭條，各國間貿易關稅壁壘。若維持合作的成本遠大於衝突的成本，即使總體經濟實力不如英國，de Valera 仍孤注一擲採行衝突的策略，英國方面也是衝突以對。衝突的結果釀成 1932-1938 年的「經濟戰爭」，這場經濟戰爭雖然英國方面也有損失，但是經濟實力遠不如英國的愛爾蘭，因為這場「經濟戰爭」使得愛爾蘭落人民生凋蔽的窘境。

相對的，1959 年接任的 Lemass 則有完全不同的認知。在經歷經濟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愛爾蘭的經濟狀況持續低迷，Fianna Fail Party 兩度輸掉選舉失去政權²⁹。雖然 Fianna Fail Party 在 1957 年重新執政，但 Lemass 認知到愛爾蘭必須有一番不同的作為。在國際上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伴隨著戰後歐洲的復興，國際貿易也日漸復甦。因此「區域經濟整合度」所扮演的權重越來越大。此時在 Lemass 的認知中，合作策略所能獲得的利益遠大於衝突策略。Lemass 帶領愛爾蘭改採合作的策略，英國方面也合作以對。因此產生 1965 年的 Anglo- Irish Free Trade Area (AIFTAA) 與 1973 年兩國攜手加入歐洲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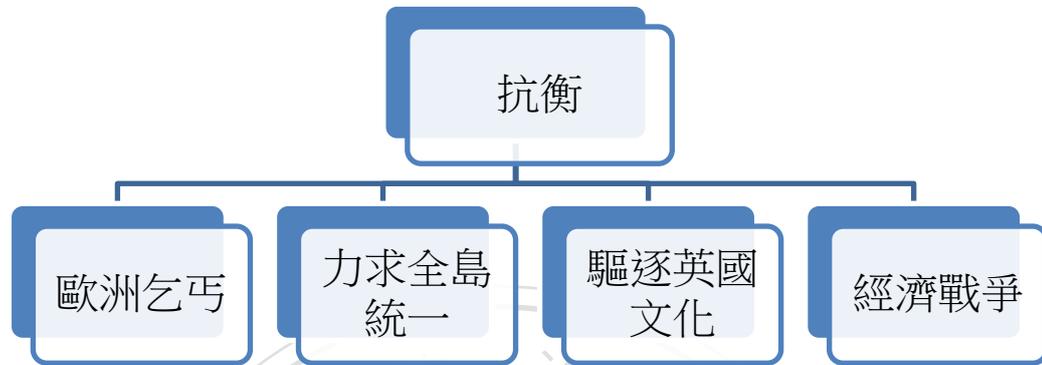
有了基本理論架構，本文再依此把愛爾蘭近代實際經濟外交的策略納入分析。本文將愛爾蘭經濟外交策略分二時期探討。

(圖 3 約至於此)

²⁹ 1948-1951 及 1954-1957 Fianna Fail Party 兩度失去執政權。

圖 3 近代愛爾蘭經濟外交策略圖

1932-1959 年代愛爾蘭對英國之經濟與外交政策



1959 年代後愛爾蘭對英國之經濟與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第一時期為愛爾蘭自由邦政府由 de Valera 重新執政，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獨立建國成功，到 de Valera 1959 年最後一任總理下野為止。第二時期為 1959 年 Lemass 接任總理迄今。從 1932 年 de Valera 重新領導愛爾蘭自由邦開始，他所採取的對英國策略符合抗衡的論點。雖然在「英愛條約」簽訂後愛爾蘭取得自由邦地位，但愛爾蘭的政治菁英並不因此滿足，進一步思考的是如何完全脫離英國掌控，因此「獨立自主」成為首要目標。此一時期的政治菁英習慣將所有愛爾蘭的不幸都歸咎於英國，Fianna Fail Party 的 de Valera 總藉由悲情的訴求與統一愛爾蘭等民族主義的口號來換取選民的支持。往往立場越是極端的政治人物，越是容易從中獲取政治利益。一場「經濟戰爭」與去英國化運動雖然鞏固了執政者的地位，然而這對愛爾蘭的經濟發展，並無正向的助益。民族主義的認知讓愛爾蘭經濟在原地踏步，甚至被摒除在戰後復甦的列車之外。

與 de Valera 對比鮮明的是 Lemass，雖然兩人同屬 Fianna Fail，但此二人對國家利益的定義並不相同，連帶使得他們對「總體經濟實力」、「國內政治情勢」、「區域經濟整合度」的價值判斷大相逕庭，政治菁英的目標也從獨立自主轉為繁榮發展。從 1959 年上任的 Lemass 總理開始至今，歷任愛爾蘭領導人的對外政策，包含經貿政策與前一期時期相較，都有很大的轉變。1965 年 Lemass 不顧本身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和英國簽訂 AIFTAA。繼任者 Jack Lynch 在 1973 年攜手與英國加入歐洲共同體，使愛爾蘭重新回到國際貿易的核心。第二時期的領導人們認清愛爾蘭的優劣條件所在，不再堅持對立衝突。放棄閉關自守的保守政策，鼓勵外國企業到愛爾蘭投資。更重要的是，透過國際建制，加入重要國際組織來提升國家地位，符合政治均衡的國際觀。此時才真的讓愛爾蘭脫離悲情，真正為愛爾蘭共和國帶來前所未有的實質經濟發展。

本文就是藉由對比「de Valera 及其所引發的經濟戰爭」、「Lemass 繼任後與英國的和平共榮」。領導者不同的認知配合不同的國際外在環境，面對相同的對

手國做出完全不同的決策，造就迥異的愛爾蘭與英國關係，這印證「權力抗衡」與「政治均衡」之異。



第五節 章節安排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

第二章要敘述大英帝國在愛爾蘭的殖民歷史。

第一節是要回顧英格蘭自 12 世紀起的武力入侵，透過軍隊，達到傳教與經濟掠奪的目的。雖然愛爾蘭人有不少的反抗運動，但都被英國的優勢軍力弭平。第二節則是要敘述 1800 年英國將愛爾蘭併入英國後，新的殖民階段對愛爾蘭的影響。

第三章則是要開始具體進入愛爾蘭近代的經濟外交政策。

第一節敘述 1932-1938 年經濟戰爭的前因後果。第二節則是要討論愛爾蘭近代的語言文化政策，究竟其成敗與意義何在。此外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愛爾蘭的中立策略，以及 de Valera 所主導的閉關自守經貿政策。

第四章則是要探討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愛爾蘭。

第一節先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愛爾蘭的政治經濟情勢。第二節則是講述 1959 年 Lemass 接手執政後，認知的改變使得愛爾蘭的策略從抗衡到均衡。

第五章為結論。

第二章 愛爾蘭島與大英帝國的歷史情仇

自上古時期起，就有許多不同民族來到愛爾蘭島，但是從西元十二世紀英格蘭登陸愛爾蘭島開始，英格蘭對愛爾蘭展開長達八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對愛爾蘭的影響最為深遠。至今日，愛爾蘭島北部的北愛爾蘭仍屬於英國領土一部分，獨立建國的愛爾蘭仍以英語人口為主。英格蘭對愛爾蘭的殖民除了有經濟上的掠奪，更包含了對其宗教與文化的摧殘。原本篤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在英國殖民時期被迫改宗新教。在政治上，英國幾乎完全不賦予愛爾蘭人參政的權力，大批來自英國本島的移民於愛爾蘭形成統治階級。本章首先討論 12 世紀英國登陸愛爾蘭到 1800 年頒布 *Act of Union*，這段期間英國在政治與文化上對愛爾蘭的入侵。其次討論 1801 年 *Act of Union* 生效後，英國對愛爾蘭新一階段的殖民經濟型態，對愛爾蘭政治與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一段歷史對愛爾蘭近代政治發展有極大的影響。

第一節 1171-1800 愛爾蘭與英格蘭的衝突

大約在西元前四世紀時，來自中歐的塞爾特人 (Celts) 飄洋過海來到愛爾蘭島，在此繁衍成為愛爾蘭人。其語言塞爾特語 (Celtic) 也就是後來的「愛爾蘭語」。文化上，自西元五世紀開始，天主教在愛爾蘭傳遞開來，相傳是由出生於不列顛的羅馬後裔派翠克 (Patricius) 將天主教傳入愛爾蘭，使得愛爾蘭人普遍信奉天主教³⁰。在政治上，當時愛爾蘭島北方由本是海盜的維京人 (Vikingo) 統治，南方則由五個不同的王國組成一個聯盟，因此有學者主張，這時的愛爾蘭已有高度的社會發展與行政體系³¹。西元十一世紀初期南方的國王 Brian Boru (941-1014) 曾

³⁰ 每年的 3 月 17 日是愛爾蘭的聖派翠克節，各地舉行熱鬧的嘉年華會慶祝。

³¹ Henthorn, James, *Cogadh Gaedhel re Gallaibh: The War of the Gaedhil with the Gaills* (London: Longmans, 1867), pp.57~69.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ledge, 2005), p.4.

驅逐北歐統治者，短暫統一了愛爾蘭島³²。但 Brian 於 1014 年去世後，愛爾蘭境內又再度陷入各部族間互相攻伐的混亂³³。1169 年在 Leinster 地區戰敗的 Dermot MacMurrough (1110-1171) 跨海求助於英格蘭王亨利二世 (Henry II, 1133-1189)，希望能在英格蘭的協助下反敗為勝。亨利二世欣然同意，1170 年 8 月派遣 Richard de Clare (1130-1176) 率軍協助 Dermot 復國，英格蘭的軍隊很快就擊潰傳統部族。戰爭結束後 Clare 娶了 Dermot 的女兒，繼承 Dermot 的土地成為新的領主。亨利二世擔心 Clare 在愛爾蘭坐大後，一旦聯合其他部族建立一個有系統的政權，將不利於英格蘭。因此，1171 年亨利二世率兵進入愛爾蘭，以優勢的軍力強迫愛爾蘭島上各部族領袖對他效忠，自此開啟了英格蘭對愛爾蘭長達八個世紀的殖民。但事實上，英格蘭國王採用的是西歐的封建制度，僅以愛爾蘭領主 (Lord of Ireland) 自居，並未完全掌握整個愛爾蘭，英格蘭的勢力仍僅止於都柏林及其近郊，對愛爾蘭的控制並不是太積極³⁴。

此後的三個世紀，愛爾蘭湧入來自諾曼地、英格蘭、蘇格蘭等地的移民。這些新移民與原本的愛爾蘭人通婚，英格蘭也將政治組織、法律制度與商業規範引進愛爾蘭各地，使新移民能與既有的社會融為一體，成為新的愛爾蘭人。相較於 16 世紀以後參雜宗教因素的衝突，這段期間同樣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與英國沒有嚴重的衝突，但 15 世紀中葉的玫瑰戰爭 (Wars of the Rose, 1455-1487)，開啟愛爾蘭與英國衝突的序幕。

英王在愛爾蘭各地分封土地給來自英格蘭的新愛爾蘭人，這些小領主成為新的貴族，負責管理原有的愛爾蘭部族。15 世紀中，英國爆發爭奪王位的玫瑰戰爭，部分在愛爾蘭的貴族們選擇支持約客家族 (House of York)，但 1458 年戰爭

³² Henthorn, James, 前引書, 註 31, p.137.

³³ 周惠民, *愛爾蘭史：詩人與歌者的國度* (台北：三民書局，2009 年)，頁 42。

³⁴ 前揭書，頁 44-46。

范盛保, 「愛爾蘭的文化意象與主體意識-兼論愛爾蘭文化、產業」, 施正鋒、謝若蘭主編, *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9 年)，頁 2。

的結果卻是由蘭開斯特家族 (House of Lancaster) 勝出。新即位的亨利七世 (Henry VII, 1457-1509) 擔心政敵再與愛爾蘭貴族聯合，因此決定要加強對愛爾蘭的控制，遂於 1494 年頒布 *Poyning's Law*，條文規定：任何在英國通過的法律，在愛爾蘭也自動生效，且愛爾蘭人必須恪遵英格蘭法律，象徵著英格蘭對愛爾蘭的直接統治。*Poyning's Law* 就此埋下日後愛爾蘭與英國政治與宗教衝突的種子³⁵。

如前文所述，早期從英格蘭移民到愛爾蘭的新移民，和愛爾蘭人一樣在宗教信仰上都信奉天主教，但自從英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 創立英國國教步入政教合一後，情況有相當大的轉變。在亨利八世以前，英格蘭未能有效統治全愛爾蘭，在英格蘭勢力範圍以外的地方，愛爾蘭仍有許多部落，由部落長主導著地方事務的發展，信奉自己的宗教，執行自己的法律。英格蘭於 1534 年頒布至尊法案 (*The Act of Supremacy*)，宣告英國國王乃是英國教會在世間的唯一最高權威。至尊法案形同否定了天主教教宗在英國的地位，這讓英國王室正式與羅馬教廷決裂。而同年頒布的王位繼承法 (*Treasons Act*) 更進一步規定：任何否定英王此一至高無上地位者，可以被處以死刑³⁶。而至尊法案和王位繼承法因為 *Poyning's Law* 的緣故，自然也被強制施加於普遍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島上。在愛爾蘭的天主教徒被迫改宗英國國教，拒不改信者則被標籤為「異教徒」³⁷。因為宗教爭議讓原本的部落對英格蘭心生不滿，雙方偶爾發生零星的衝突。為了加深對愛爾蘭的掌控，亨利八世於 1541 年率兵進入愛爾蘭，以優勢的軍力征服愛爾蘭各部落。1542 年頒布愛爾蘭王權法案 (*Crown of Ireland Act*)。此後，英格蘭的國王在愛爾蘭的頭銜，從「愛爾蘭領主」變成「愛爾蘭國王」，愛爾蘭的日常事務也交由愛爾蘭大臣 (Lord Deputy of Ireland) 處理。

³⁵ Curtis, E., and R. B. McDowell, *Poyning's Law: Ir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72-1922*, (London: Methuen & Company Limited, 1968), p. 83.

³⁶ Heal Felicity, *Reformation in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17-127.

³⁷ Welsh, Frank, *The Four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 115-16.

此時在愛爾蘭的政治發展上，已設有殖民地議會，但並不具有議會民主的形式。所有議員都是英格蘭人，且只有愛爾蘭大臣要徵稅時才會召開議會³⁸。為進一步降服愛爾蘭，英格蘭逐步有計畫的將新教徒遷入愛爾蘭北部 Ulster 地區，使新教徒與原有的天主教徒形成對立。就在天主教被禁止後，愛爾蘭原先的天主教堂被英國國教派接收，「異教徒」在政治、經濟、教育各方面的權力都備受打壓遭受不平等的對待。就此開啟往後四個世紀，以天主教為中心的反抗運動。

愛爾蘭人屢次想結合英王的敵人來挑戰英國的統治，但結局往往使自己落入更艱難的處境。除了前文所述，在玫瑰戰爭中，愛爾蘭貴族選擇支持約客家族，招致亨利七世以頒布 *Poyning's Law* 作為報復。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 在位期間，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又做了類似的抉擇。

亨利八世雖然建立英國國教派，但基本上並不強迫「異教徒」改宗新教；伊莉莎白一世即位後，下令強迫天主教徒必須改宗英國國教。1592 年，Ulster 地區信奉天主教的貴族 Tyrone 伯爵因不滿英格蘭歧視性的宗教政策而發動叛變。Tyrone 家族本是英格蘭人，也屢次襄助英王平定愛爾蘭島上的衝突，直到伊莉莎白在愛爾蘭推動新教信仰後，打破了 Tyrone 家族與英王原本和諧的關係³⁹。Tyrone 聯絡同屬天主教陣營的西班牙，希望能聯西抗英，因為這時期剛好英國也與西班牙處於長期的戰爭狀態⁴⁰，西班牙於是答應出兵相助。1601 年西班牙無敵艦隊 (Spanish Armada) 在愛爾蘭的 Kinsale 登陸，Tyrone 原本想借用西班牙艦隊來支援自己的叛變計畫，但無敵艦隊遭遇英軍 George Carew 與 Arthur Chichester 兩名將領擊潰。Tyrone 失去外援後不得不投降，最後還遭到流放。天主教徒也參與了這次的起義，因此伊莉莎白一世開始對愛爾蘭實施高壓統治，大規模鎮壓愛爾蘭天

³⁸ 范盛保，前引書，註 34，頁 2~3。

周惠民，前引書，註 33，頁 88。

³⁹ Connolly, J. Sean, *Contested Island: Ireland 1460-16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233.

⁴⁰ 1585-1604 年英西戰爭，始於 1585 英國出兵荷蘭，終於 1604 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和西班牙王腓力三世雙方簽訂 Treaty of London。

主教徒⁴¹。

英國的宗教政策對愛爾蘭形同宗教迫害，這使得原本就備受壓迫的愛爾蘭人，又因宗教問題加深了對英格蘭統治者的仇恨。斯圖亞特王朝 (The House of Stuart) 入主英國後，詹姆士一世 (James I, 1566-1625) 除了延續伊莉莎白一世的高壓統治，更在殖民政策上大規模的鼓勵新教徒移入愛爾蘭 Ulster 地區，使 Ulster 逐漸成為全愛爾蘭新教徒最多的地方⁴²。經過了近十年的殖民，當地的新教徒數量漸超過了天主教徒人口數，篤信天主教的愛爾蘭人因此形成以天主教會為中心的反抗團體，這使得日後愛爾蘭對英國的政治反抗鬥爭，除了追求民族的獨立之外，還帶有反抗宗教迫害的色彩⁴³。

英國本土在 1642-1651 年間爆發國會派與保皇派的內戰，也就是清教徒革命 (Puritan Revolution)。愛爾蘭島上的天主教徒再度欲利用英國內戰的機會來對抗英國統治，主要的目標在於要求宗教自主權。1643 年愛爾蘭的天主教徒串聯塞爾特人以及早已融入愛爾蘭生活的老英格蘭人，組成天主教聯盟 (The Confederate Catholics of Ireland)，並宣布愛爾蘭獨立。天主教聯盟率領群眾襲擊英國派駐在 Ulster 的英國守軍和新教徒。但是，英國本土內戰的結果卻是由身兼清教徒與國會派領袖的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 擊敗保皇派勝出，並於 1649 年建立共和政體。清教徒克倫威爾並未給予愛爾蘭天主教徒任何的寬容，同年率兵親征愛爾蘭，不但取消了愛爾蘭的獨立，也以屠殺的方式報復愛爾蘭人利用內戰期間偷襲 Ulster 地區守軍與新教徒的仇恨⁴⁴。

清教徒革命落幕後，皇室復辟，第二任國王詹姆士二世 (James II, 1633-1701) 本身是天主教徒，因此對愛爾蘭天主教徒還算友善。但 1688 年發生「光榮革命」

⁴¹ Connolly, J. Sean, 前引書, 註 39, pp. 270~277.

⁴² Connolly, Micheal,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Northern Ireland* (NY: Philip Allan, 1990), p.15.

⁴³ 張亞中, 前引書, 註 22, 頁 198。

⁴⁴ Welsh, Frank, 前引書, 註 37, p. 165.

時，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再度做了事後證明是錯誤的選擇。天主教徒選擇支持詹姆士，因而得罪威廉三世(William III, 1650-1702)。光榮革命起因亦是宗教問題，英王詹姆士二世不斷因為宗教議題和國會發生衝突，使得新教徒相當不滿。1688年一群英國貴族「邀請」遠嫁荷蘭的瑪莉公主 (Mary Stuart) 及其夫婿奧倫支親王 (Prince of Orange)，也就是威廉三世入主英國，迫使詹姆士二世退位，信奉新教的威廉國王繼續維持了新教在光榮革命後的優勢地位。遭到罷黜的詹姆士帶著殘存的勢力逃往愛爾蘭，此時愛爾蘭人面臨天主教的詹姆士與新教威廉間的抉擇。信奉天主教的愛爾蘭人自然選擇同是天主教徒的詹姆士，只承認詹姆士為愛爾蘭國王⁴⁵。詹姆士過去的大臣 Richard Talbot (1630-1691)為他在愛爾蘭籌組軍隊，號召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準備對抗英王威廉。1690年英王威廉統帥英國、荷蘭、丹麥、瑞士、德國、法國和愛爾蘭新教徒組成聯軍，在愛爾蘭 River Boyne 與詹姆士的軍隊開戰。戰爭從 1690年6月持續到 1691年9月，在這場戰爭中，愛爾蘭的七千名天主教徒被殲滅。戰後簽訂 *Treaty of Limerick*，確保詹姆士無法再聯合愛爾蘭對抗英格蘭，也確立新教徒在愛爾蘭的優勢地位⁴⁶。雖然威廉三世願意給天主教徒更多的寬容並歸還部分土地，但掌控殖民地議會的地主和新教徒不願放棄既得利益，這使得愛爾蘭人的情況並未好轉。

經過了這場戰役，愛爾蘭人已經沒有能力再對抗英國政府，但這並不減少英國對愛爾蘭及天主教徒的壓迫。18世紀開始，陸陸續續頒布的法令中，英國政府剝奪了更多愛爾蘭人的財產權與參政權，這些法令統稱為 *Penal Laws*。*Penal Laws* 不是單一法律，而是一系列英國政府用來打壓愛爾蘭天主教徒的歧視性法律⁴⁷。內容包含教育、公職、婚姻、參政、土地等多面向。諸如：天主教徒不得從事教育工作、天主教徒不得受雇於軍隊或公部門、天主教徒不得與新教徒通婚、

⁴⁵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A History of Irel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159~160.

⁴⁶ Gilbert, T. John, *The Treaty of Limerick, 1691*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2005), pp.298~308

⁴⁷ Moley, Raymond, *Daniel O'Connell: Nationalism Without Violence* (NY: Fordham University, 1975), pp.7~9.

不宣誓效忠英王者不得擔任國會議員、天主教徒不得自由決定財產繼承人⁴⁸。

由這一系列的法律可知，英國對愛爾蘭的殖民和宗教脫離不了關係，宗教迫害的目的在於徹底改變愛爾蘭人的精神信仰，經濟的掠奪則是為了得到實質的經濟利益。宗教政策與經濟政策雙管齊下，凸顯英國的高壓統治。早從亨利二世開始，英國就以征服者的心態面對愛爾蘭，掠奪土地、奪取生產原料，再將愛爾蘭人趕到沼澤帶和森林。對於以農牧維生的愛爾蘭人來說，土地是最重要的資產，但在英國的統治下，國王可以任意掠奪愛爾蘭人的土地以供其分封、獎賞。而從新教在英國確立優勢地位後，在愛爾蘭的新教徒雖然在人數上是少數，但在政治與經濟上卻享有絕對優勢。新教徒自原本的天主教地主手中取得土地，成為新的統治階級。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天主教徒，卻只能被當成次等公民對待⁴⁹。在 *Penal Laws* 當中，有許多條文將宗教信仰連接到社會地位⁵⁰，這一切又因 1800 年 *Act of Union* 通過後，英國對愛爾蘭直轄而進入另一階段。在第二節當中，本研究要討論 1801 年愛爾蘭正式併入英國後的產業發展。英國的統治惡化了 1845-1847 年在愛爾蘭所發生的大饑荒 (Great Famine)，大饑荒這個事件深深影響 20 世紀的愛爾蘭與英國關係。愛爾蘭的工業也因為受到英國的限制而無法發展。

⁴⁸ 一系列的 Penal Laws 可見於 <http://library.law.umn.edu/irishlaw/subjectlist.html>

⁴⁹ Moley, Raymond, 前引書, 註 47, p. 9.

⁵⁰ 舉凡參政權、就業權、財產繼承權、婚姻權，天主教徒處處受限，遠不如新教徒。

第二節 併入英國後的經濟發展

愛爾蘭大饑荒 十九世紀初愛爾蘭人政治權力的爭取上略有斬獲⁵¹，但經濟方面仍深受英國殖民所苦。透過觀察 1840 年代的饑荒，可發現造成愛爾蘭 19 世紀經濟發展不佳的成因，除了天災還有人禍。前者指的就是大饑荒本身此一天然災變，後者則是英國的殖民政策。

隨著商業貿易的興起，西歐一些較富裕的國家願意以高價向其他國家收購穀類作物，為了將高價值的穀物銷往歐洲大城市，英國的殖民政策刻意將愛爾蘭塑造成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使大多數的愛爾蘭人都必須以農業維生。即使愛爾蘭的農業還算發達，但除了少數的地主，絕大部分的愛爾蘭人都是經濟條件不佳的佃農。這些佃農吃不起也吃不到自己所種植的穀物，不得不改以較廉價的馬鈴薯為主食。因此除了少數較肥沃的田地用來種植高價穀物之外，其餘大量的土地單一化種植馬鈴薯⁵²。過度依賴馬鈴薯的後果是一旦馬鈴薯歉收，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饑荒。而饑荒所造成的人口外移又更進一步侵蝕愛爾蘭的生產力，如此的惡性循環阻礙愛爾蘭的經濟發展。

事實上馬鈴薯於 16 世紀從南美引進歐洲時，多被當作動物飼料，但愛爾蘭的農民發現愛爾蘭的氣候條件適合馬鈴薯的栽種，因而擴大馬鈴薯的種植面積，18 世紀中葉馬鈴薯反成為愛爾蘭平民的主食。歷史上愛爾蘭發生多次因馬鈴薯歉收而造成的饑荒，最嚴重的一波出現在 1845-1847 年間，史稱「大饑荒」(Great Famine)。1845 年愛爾蘭各地出現一種「晚疫病菌」危害了馬鈴薯的生長，造成全愛爾蘭有三分之一的馬鈴薯無法收成。第二年農民為彌補前一年的產量不足，種植更大面積的馬鈴薯，但災情不減反增，饑荒的災民於是大批湧現⁵³。1847 年

⁵¹ 在此所指的是天主教徒的參政權，在本章第三節當中會再介紹。

⁵² Gray, Peter, *The Irish Famine* (NY: Hary A. Abrams, 1995), pp.22~23.

⁵³ 范盛保，前引書，註 34，頁 137~139。

災情達到高峰，在流行性疾病的助威之下，造成大量的人口因疾病和營養不良而死亡。由於相關的政府統計數據並不完整，但依部分地方的統計數據顯示，死亡的人口大約在二十九萬到一百五十萬之間。近年來學者估計大約是一百萬人左右，相當於當時人口的 12%⁵⁴。

學者 Joel Mokyr 以統計分析方式發現，影響各地區死亡率高低最關鍵的自變數是「人均收入」和「識字率」。人均收入越低的地區死亡率越高，而識字率越高的地區死亡率就越低，反之亦然⁵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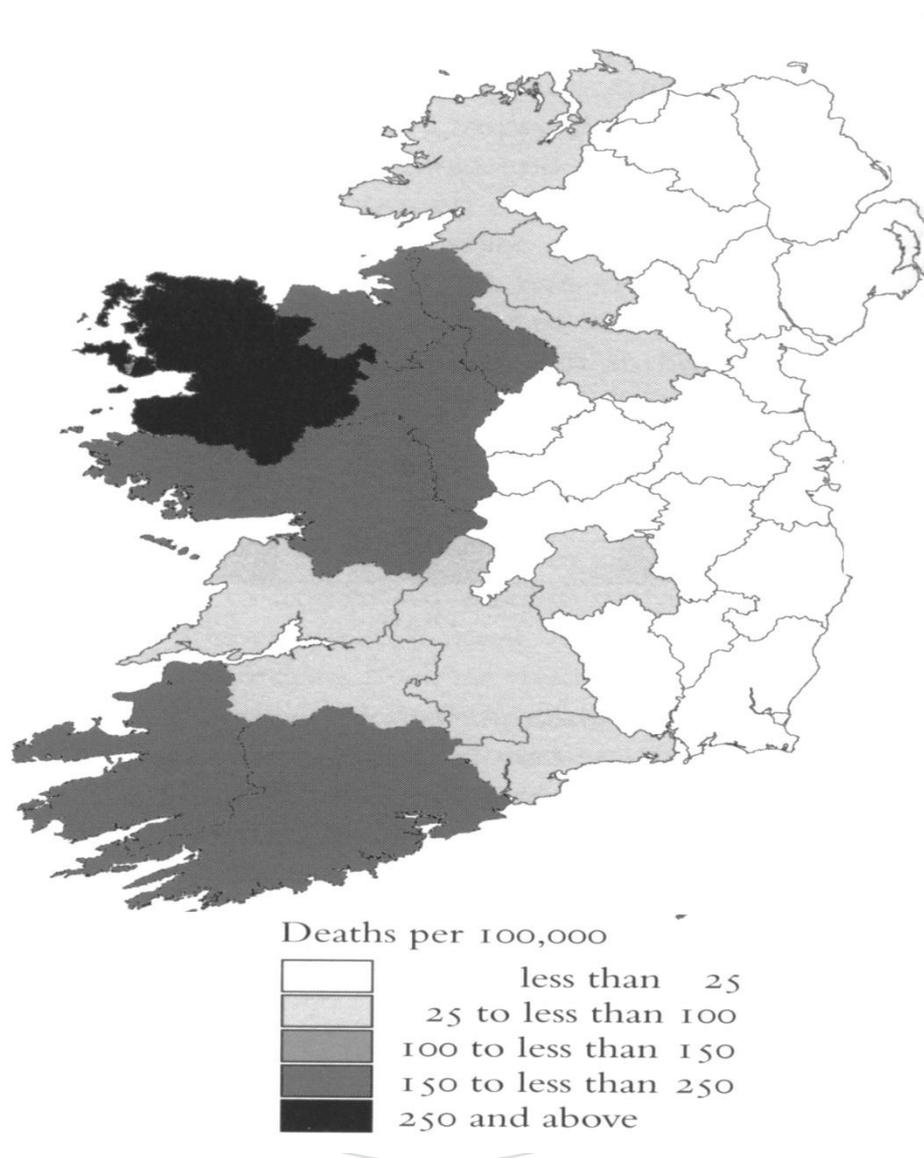
(圖 4 約置於此)



⁵⁴ Kennedy, Liam, Ell, Paul, Crawford, M. E, and Clarkson, A. L, editions, *Mapp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9), pp.36~37.

⁵⁵ Mokyr, Joel, *Why Ireland Starved: A Quantitative and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y, 1800-1850*,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261~276.

圖 4 愛爾蘭 1940 年代死亡率分區圖



資料來源：節錄自 Kennedy, Liam, Ell, Paul, Crawford, M. E, and Clarkson, A. L, editions, *Mapp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9), p.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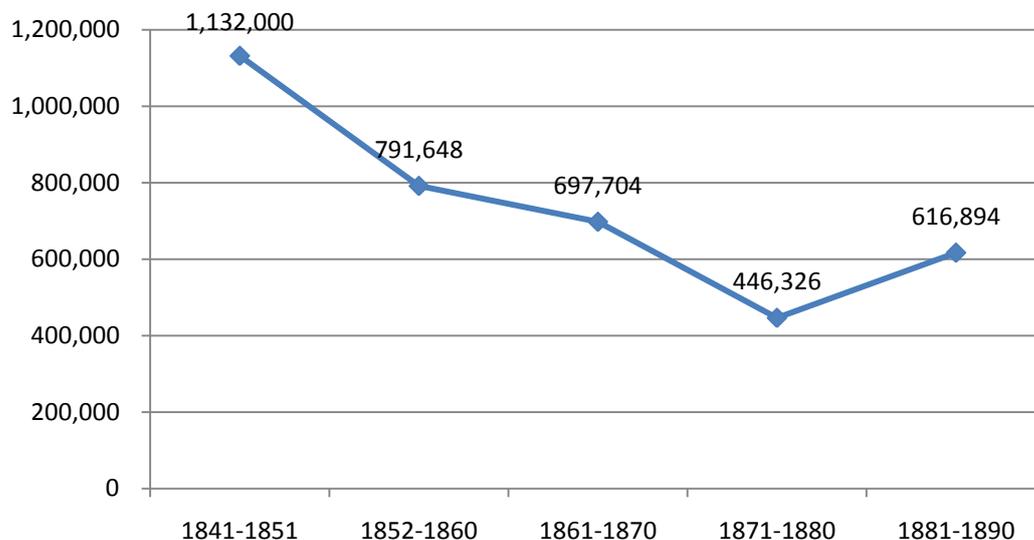
由圖 4 可知，1940 年代大饑荒受創最嚴重的地區多半集中在愛爾蘭島的西部及南部，這正是人均收入最低且識字率也最低的農業區。除了人口的死亡，人口的外移也是大饑荒的負面影響之一。

(圖 5 約置於此)

(圖 6 約置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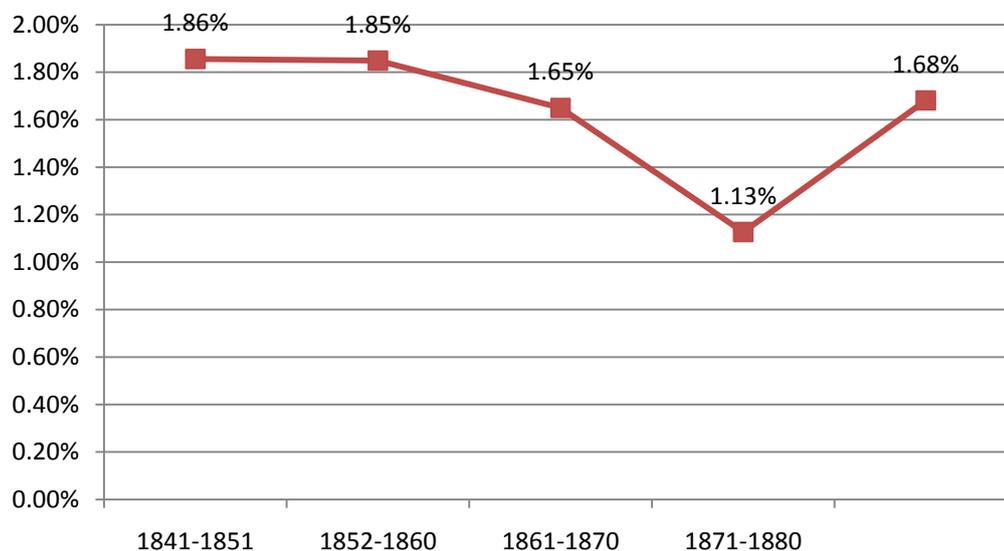


圖 5 1841-1890 愛爾蘭外移人口數



資料來源：節錄自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edge,2005), p.464 再由作者編繪。

圖 6 1841-1890 愛爾蘭平均外移人口占總人口比率



資料來源：節錄自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edge,2005), p.464 再由作者編繪。

從圖 5、6 可見 1841 到 1851 十年間，有超過 113 萬人移往海外，外移人口占總人口比例 1.86%。1861-1870 年這段期間移民態勢趨緩，但仍有接近 70 萬人因無法維持生計而出走。總計從 1841 年開始到 1890 五十年間，大概有三百六十八萬人自愛爾蘭出走，生產力大幅流失。在 1845-1855 年，大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出海移往美國，另有 34 萬人移往現今的加拿大，其餘數千人則分散至澳洲等地⁵⁶。除了勞動力的損失，人口大量外移也關係到愛爾蘭語的沒落問題，影響日後愛爾蘭政府的語言文化政策⁵⁷。

當愛爾蘭發生饑荒之時，來自愛爾蘭的議員在英國國會中大聲疾呼要求英國政府要有更積極的作為，但因穀物法 (Corn Laws) 的限制，英國政府在第一時間並沒有積極的救災行動。穀物法的制定可追溯至 17 世紀，一系列的進口管制是為了保障英國本土的穀物價格，確保英國本地農民的利益，屬於重商主義的貿易政策⁵⁸。穀物法的條例規定，英國必須對進口的穀物抽取關稅，而且必須等到英國穀物上漲至規定價格後才能准許進口他國的穀物。除此之外，穀物進口的數量設有上限，最大的受惠者是地主和穀物商。18 世紀末開始，新興的工業資本家崛起，逐漸成為可與舊地主相抗衡的中產階級。新的中產階級以工商人士為主，主張取消重商主義的政策，希望改行對自己有利的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⁵⁹。19 世紀初期英國本土興起了廢除穀物法運動，然而執政的保守黨主要支持群眾來自農業地區，在選票的壓力下自然反對廢除穀物法。1845 年愛爾蘭發生馬鈴薯歉收時，英國首相 Robert Peel 透過進口外國穀物來救災。國會同意緊急向印度及美洲購買玉米運往愛爾蘭，但此種作法緩不濟急，愛爾蘭長久以來缺糧的情形無法依靠偶一為之的緊急進口來解決。首相 Peel 雖然是保守黨籍，但他的態度卻傾

⁵⁶ Donnelly, S. James, "Excess mortality and Emigration," in Vaughan E. W., eds.,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V: Ireland Under the Un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p. 353.

⁵⁷ 愛爾蘭語問題於第三章會再討論。

⁵⁸ 朱雯琪，「從重商主義到自由貿易-英國航海法與穀物法的政治經濟分析」，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90~91。

⁵⁹ 前揭書，頁 94~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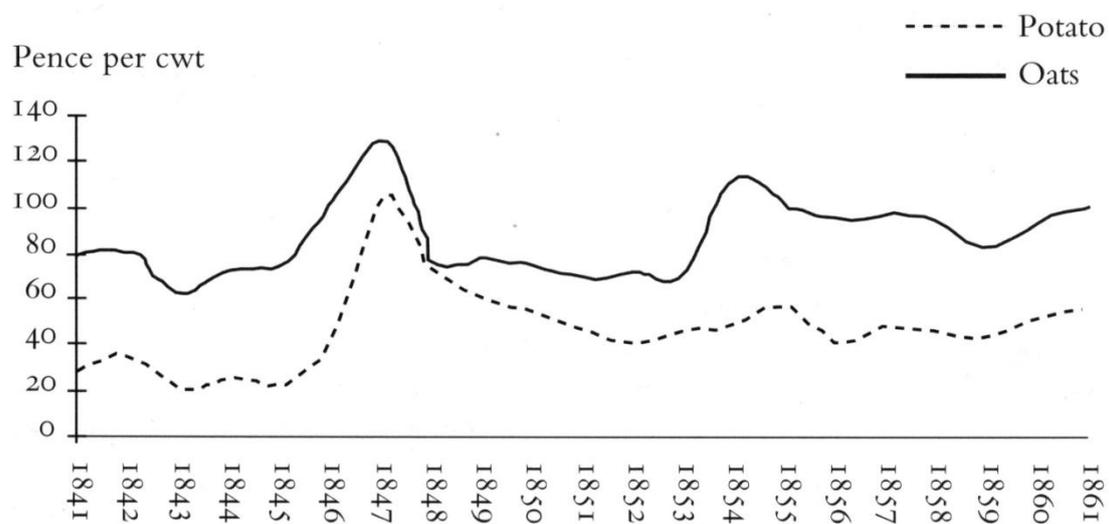
向自由貿易。1845 年的飢荒雖然發生在愛爾蘭，但是難保英國本土不會發生相同的糧荒。1845 年 10 月 31 日的內閣會議中，Peel 提議廢止穀物法，讓商人可以直接進口東歐等地較為廉價的穀物進行救災。但是廢止穀物法計畫遭致保守黨內部以及英國農民強烈的反對，反對廢除穀物法的國會議員甚至認為是 Peel 誇大與捏造愛爾蘭的災情來遂行他廢除穀物法的意志。但在 Peel 堅持之下，串連部分支持自由貿易的保守黨議員和反對黨議員，終於在 1846 年 5 月 26 日廢除穀物法⁶⁰，據統計 1847 年單一年度就進口了 75 萬公噸穀物。即使英國政府開放外國進口糧食來救災，仍無法提供飢民充足的糧食⁶¹。最根本的原因是愛爾蘭所生產的高價穀物，在市場考量之下仍被大地主當作商品運送到英國市場上銷售。再加上馬鈴薯本來就已經是最廉價的食物，農民也沒有其他食物可以替代。昂貴的糧食吃不起，原本廉價的食物又因歉收而漲價，加劇了大饑荒的災情。

(圖 7 約置於此)

⁶⁰ 朱雯琪，前引書，註 58，頁 112~124。

⁶¹ 周惠民，前引書，註 33，頁 143。

圖 7 1841-1861 馬鈴薯與燕麥價格變化



資料來源：節錄自 Kennedy, Liam, Ell, Paul, Crawford, M. E, and Clarkson, A. L, editions, *Mapp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9), p.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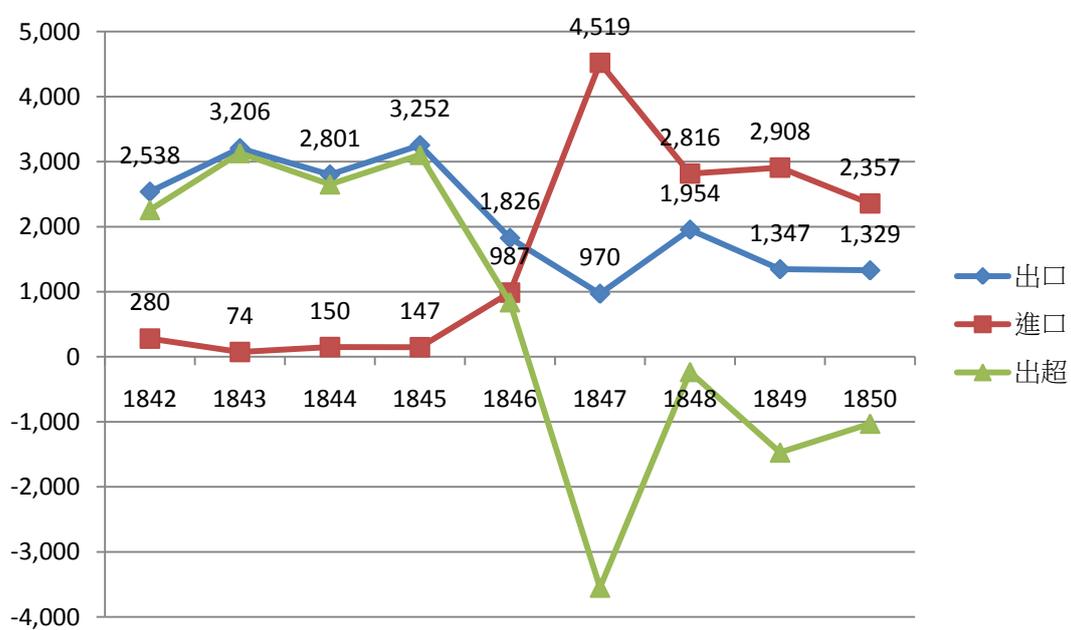
由圖 7 可見，在大饑荒發生以前，馬鈴薯的價格大約只有燕麥的三分之一，屬於廉價作物。到了大饑荒期間，馬鈴薯因為細菌感染而歉收，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讓馬鈴薯的價格直追燕麥。直到穀物法廢除後，開放穀物進口使馬鈴薯價格回穩，逐漸回到供需平衡的常態價格上，大饑荒的災情才得以舒緩。

(圖 8 約置於此)



圖 8 1842-1850 愛爾蘭穀物進出口量

單位：1000 夸脫



資料來源：節錄自 O'Grada, Cormac, *Black '47 and beyo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n history, economy, and memor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23.

由圖 8 可知，饑荒發生期間穀物進出口量的變化。饑荒發生之初，大地主仍大量從愛爾蘭出口高價值穀物到英國市場⁶²。1845 年，也就是大饑荒的第一年，穀物出口量上升到此一時期的最高點 3,252,000 夸脫。愛爾蘭的穀物貿易在穀物法廢除以前，長期維持大量的出超，直到 1846 年英國政府為了救災緊急進口穀物來救災，進口數量才大幅提升。1846 年穀物法廢除後，逐年開始增加糧食進口，調節供需早已失衡的愛爾蘭，1847 年開始愛爾蘭的穀物市場由出超轉為入超。1849 年雖然馬鈴薯再度因為細菌感染而歉收，但有賴廉價穀物進口救濟災民，沒有再傳出大規模的災情。

面對饑荒的威脅之時，恰逢英國方面因為自由主義的興起，讓廢除穀物法趕上大饑荒的救災，但是政府未在饑荒發生的第一時間解決，傷害已然造成，愛爾蘭人被迫遠走他鄉移民海外。人口的死亡與外移除了歸因於天然災害，英國政府的施政作為也是關鍵所在。從大饑荒本研究可以歸納三點英國殖民政策對愛爾蘭的影響：

1. 因為一系列的 Penal Laws，愛爾蘭的土地集中在少數英國人及新教徒的手中，土地只為少數大地主服務，多數的天主教徒淪為佃農。
2. 愛爾蘭的農業政策缺乏規劃，作物的種植過於單一化，面對突如其來的馬鈴薯病變卻因穀物法的限制而無法有立即的作為。
3. 因饑饉所造成的死亡與人口外移，損耗了愛爾蘭的生產力也改變了人口結構⁶³。

重農輕工的產業政策 愛爾蘭的農業因為大饑荒而遭受重創，工業則是從來就不

⁶² Kinealy, Christine,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mpact, ideology, and rebellion* (NY: Palgrave, 2002), pp. 24~25.

⁶³ 最明顯之處在於天主教徒與愛爾蘭語人口的流失。

是愛爾蘭的強項。愛爾蘭工業的落後可從自然條件和人為因素兩方面來探討。在地理位置上，愛爾蘭孤懸於歐洲的邊陲地帶，並非重要航線的必經之地，其所需要的物資多仰賴英格蘭的轉口。此外，愛爾蘭又缺乏煤礦等工業發展所需的天然資源，諸多自然條件上的限制，不利於愛爾蘭的產業轉型⁶⁴。人為因素指的就是英國的殖民政策。

早從 1699 年開始，英國就禁止愛爾蘭的羊毛製品輸出到英國以外的地方，又對輸入英國的愛爾蘭羊毛製品課取高關稅，目的就是要保護英國本土的製造業。除了管制羊毛出口，英國政府還規定愛爾蘭的肉品、牲口、造船業都必須經過英國本土才能轉銷其他國家。18 世紀中期，英國本土一系列的技術革命促成了以機器生產取代手工的重大變革。機械器具成功應用於農業後，有多餘的勞動人口，可以投入工商業的發展，貿易量也隨著生產力的提高而擴大。當英國成為世界的首善之區、工業革命火車頭的同時，受英國政府統治又鄰近英國本島的愛爾蘭本應蒙受其利，但事實上卻不然。因工業蓬勃發展對原料有大量的需求，使英國需要不斷的從海外殖民地輸入棉花、蜜糖等物資，愛爾蘭正是英國本土工業原料的重要來源之一。又因為英國本土的人口成長，在部分農業用地變更為工業用地後，對於糧食有迫切的需求，所以英國政府必須將愛爾蘭當作糧倉。

學者分析認為，愛爾蘭工業停滯的原因，主要是因為英國的阻礙⁶⁵，而所謂的阻礙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土地制度。為了避免地主與佃農間的關係太過緊密，進而養成對抗殖民政府的勢力，1695 年英國政府就規定，所有的土地租賃都必須經過英國政府同意，對於承租人的身分與租金都有所限制。政府又透過徵稅的手段，使地主為了繳納土地稅金，不得不向佃農收取更昂貴的租金⁶⁶。前文曾提到 *Penal Laws*，其中有一條文規定天主教徒不得自由繼承財產，經過數十年的演

⁶⁴ O'Grada, Corma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since 1870* (Hants: E. Elgar, 1994), p.X

⁶⁵ O'Malley, Eoin, "The Decline of Irish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vol. 13, no.1, pp.21~22.

⁶⁶ Hechter, Michael, *Internal Colonialism* (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 pp.80~81.

變，絕大部分的土地都落到少數英格蘭人或是支持英國政府的新教徒手中，多數的愛爾蘭人都淪為佃農階級，必須辛勤耕作才能繳納農地的租金。人力被限定在農村中，無法流動至其他產業部門。1801 年愛爾蘭被併入英國後，對於土地利用有更加嚴格的限制。土地的擁有者只能利用土地作為生財工具，地主不得以土地當作抵押向銀行貸款，地主也不能任意出售土地。如此一來，愛爾蘭的工業部門將沒有多餘的資金得以擴張。併入英國之後，雖然兩地間的貿易障礙不再，但缺乏資金的愛爾蘭小型工廠已無法與英國大工廠競爭。大饑荒發生前夕，許多製造業工廠倒閉，失業人口最後只能回歸農地，使農地的負擔更大，加重 1840 年代大饑荒的災情⁶⁷。

愛爾蘭雖屬英國政府管轄，但實際上愛爾蘭僅是英國本土的原料與糧食來源，扮演英國工業革命的供應者的角色。愛爾蘭未能搭上工業革命的熱潮，再加上人口外移造成生產力大量流失，使愛爾蘭錯失走向現代化的絕佳機會。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英國對愛爾蘭在政治上的直接統治，是要讓愛爾蘭在經濟上填補英國不足之處，並不是讓愛爾蘭與英國競爭。除此之外，愛爾蘭貿易市場被限制在英國國內，加深愛爾蘭在經濟上對英國的依賴⁶⁸。由於英國對愛爾蘭農產品的需求大於工業產品，愛爾蘭的地主自然致力於農業而非製造業。在這段時間內，愛爾蘭製造業規模與發展速度比西歐其他國家都慢，1876 年愛爾蘭最後一家棉紡織廠也因無力與英國大型紡織廠相抗衡，宣告倒閉⁶⁹。進入 20 世紀以後，愛爾蘭的製造業雖略有起色，但這些工業城大多集中在東北部的沿海地帶，屬於英國直接管轄的北愛爾蘭境內。南方則是因為 19 世紀饑荒的影響，人口大量流失，再加上戰亂的破壞⁷⁰，讓南愛爾蘭的工業發展停滯不前。

⁶⁷ O'Malley, Eoin, 前引書, 註 65, pp.21~22.

⁶⁸ Hechter, Michael,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p.80.

⁶⁹ O'Grada, Cormac, 前引書, 註 64, p.IX.

⁷⁰ 在此指的是復活節起義和愛爾蘭自由邦的內戰。

在下一節當中，本研究要簡述的是 19 世紀到 20 世紀初愛爾蘭的政治發展。這段時間裡，愛爾蘭的政治發展大致可分為兩種路線：第一種是尋求體制內的議會路線；第二種則是武裝革命。兩者的手段雖然不同，但是主要目的都是希望能夠撤除 1801 年所通過的 *Act of Union*。



第三節 19-20 世紀初的政治發展

18 世紀在愛爾蘭的殖民地議會只有立法的功能，天主教徒不能參選也不能投票，愛爾蘭的行政官員也不受議會監督，愛爾蘭通過的法律要送英國國會通過才算數。雖然愛爾蘭人多次要求英國給予更完善的立法權，但英國仍不為所動。殖民地議會的議員有三分之二來自小選舉區，這些席次多由地主階級所掌控；其餘三分之一的席次由愛爾蘭新教徒平民所選出。天主教徒被排除在外，不能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議員。1776 年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發生美國獨立革命，雖然沒有激起愛爾蘭人的獨立運動，但天主教徒不滿英國殖民模式的情緒再度被挑起，其中以 Henry Grattan(1746-1820)最具代表性。身為殖民地議會議員的 Grattan 雖不是天主教徒，但他主張自主的立法權和效忠大英帝國並不牴觸。立法權的改革，應該從選舉資格的放寬開始，愛爾蘭應該要有普遍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Grattan 的主張獲得其他議員及天主教徒的支持。英國政府抵擋不了輿論的壓力，美國獨立革命又殷鑑不遠，終於在 1782 年通過後來被稱為 *The Constitution of 1782* 的選舉改革法，讓愛爾蘭的天主教徒開始有投票權，可以選出重視天主教徒權益的議員⁷¹。這是天主教徒得以參政的一大步，雖然不是直接親身參與殖民地議會，但天主教徒已經可以透過選票，要求自己所選出的議員為自己發聲。美國獨立後，緊接著在 1789 年又爆發法國大革命，這使得英國開始擔心愛爾蘭是否有天也會聯合外力走向獨立⁷²。如前文所提到，愛爾蘭的天主教徒有多次聯合英國敵人的紀錄，英國首相 William Pitt(1759-1806)因此提議將愛爾蘭併入大英帝國，加強管理⁷³。1800 年 *Act of Union* 送達愛爾蘭殖民地議會，1800 年 8 月通過，1801 年正式生效。繼 18 世紀初蘇格蘭被併入後，愛爾蘭也正式被併入大英帝國，原本的爱爾蘭殖民地議會取消，改選出 100 名代表參加在倫敦的英國國會。相較於

⁷¹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180~188.

⁷² 周惠民，前引書，註 33，頁 123~124。

⁷³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 213.

英國國會議員總數 658 名，愛爾蘭的 100 名代表無法單獨成為多數來推動法案
74。

遭英國併入直轄後，愛爾蘭的反抗從未終止，但此階段的反抗運動不見得都以暴力手段，也有仿效 Grattan 在體制內要求改革爭取權力者，Daniel O’Connell (1775-1847) 最具代表性。1805 年開始，在愛爾蘭陸續有許多知識分子開始鼓吹天主教徒的解放活動，要求天主教徒也該有更平等的參政權，其中以 O’Connell 所率領的天主教解放運動 (Catholic Emancipation) 最具代表性。O’Connell 生長在天主教家庭，1789 年成為首批通過考試成為律師的天主教徒。O’Connell 嚮往法國大革命的民權觀念，但反對暴力革命，因此能言善道的他在愛爾蘭各地發起天主教徒的集會，透過演說鼓吹和平的天主教解放運動。1823 年 O’Connell 成立天主教協會 (Catholic Association)，宣揚爭取天主教徒政治權力的理念。O’Connell 在愛爾蘭各地獲得天主教徒熱烈的回響，紛紛加入爭取平權的行列。1828 年 O’Connell 投身參選國會議員，雖然當時法律仍禁止天主教徒參選國會議員，但 O’Connell 仍受到天主教徒的支持而高票當選，1782 年的選舉改革法在此顯現成效。英國政府擔心激起更大的反對聲浪，迫使國會不得不在此議題上讓步。1829 年國會通過羅馬天主教救濟法 (*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撤銷禁止天主教徒任公職的規定⁷⁵。1830 年 O’Connell 再度參選且當選，終於成為第一個進入英國下議院的愛爾蘭天主教徒⁷⁶。O’Connell 在國會內主張愛爾蘭要在合法非暴力的體制內，向英國爭取更多平等的權力。O’Connell 很快就成為愛爾蘭的意見領袖，他聯合愛爾蘭議員在下議院組成聯盟，以交換法案支持的方式向執政的輝格黨 (Whig) 要求更多權利⁷⁷。在議場外，他組織愛爾蘭全國聯合會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reland) 鼓吹撤銷 *Act of Union*，雖然終其一生沒有成功撤銷，但

⁷⁴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ledge, 2005), p.5.

⁷⁵ 前揭書, p.7.

⁷⁶ 周惠民，前引書，註 33，頁 126~128。

⁷⁷ 例如：獄政、法制、廢止奴隸制度、解放猶太人等。

O'Connell 所代表的是近代愛爾蘭人在政治上的大突破。

相較於 O'Connell 的議會路線，青年愛爾蘭(Young Ireland)則鼓吹暴力手段。青年愛爾蘭不滿 O'Connell 無法在國會中堅持撤銷 *Act of Union*，因此主張要以更激烈的手段來達到目的。青年愛爾蘭主要領袖為 Thomas Davis(1814-1845)、John Blake Dillon(1814-1866)、Charles Gavan Duffy(1816-1903)，三人在 1842 年創辦「民族報」(*The Nation*)。在浪漫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民族報吸引相當多愛爾蘭青年人的注意，他們認為和平的議會路線並非唯一的手段，必要的時候應該使用武力以求目標的達成⁷⁸。1848 青年愛爾蘭想要效法歐洲青年，發展秘密組織從事武裝革命。但此時的愛爾蘭才剛剛結束一波大饑荒，未獲得多數群眾的響應，零星的衝突很快就被英國政府平定⁷⁹。

1848 年青年愛爾蘭失敗後，部分逃往美國的成員在紐約組成愛爾蘭共和國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 IRB)，IRB 在美國先向同情愛爾蘭遭遇的愛爾蘭裔美國人募款，再伺機潛回愛爾蘭。在愛爾蘭 IRB 的成員自稱 Fianna，字面上的意義是「戰士」，鼓吹用武力驅逐英國統治。為躲避追緝，1858 年 Fianna 改組為芬尼安兄弟會(Fenian Brotherhood)，在愛爾蘭秘密拓展組織，成員橫跨工人、農民和白領階級，1865 年此一組織已達數千名成員。1867 年領導 Fenian Brotherhood 的 John O'Mahony(1816-1877)準備在愛爾蘭大規模起義，但消息走漏，英軍先發制人瓦解了可能的武裝行動⁸⁰。

雖然 19 世紀中兩次起義接以失敗收場，但英國政府已經體認到愛爾蘭民意的不滿。愛爾蘭的政治菁英也明白，透過議會路線才是實際可行的途徑。接手 O'Connell 領導愛爾蘭自治運動的是 Charles Stewart Parnell (1864-1891)。Parnell

⁷⁸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222~226.

⁷⁹ Donnelly, S. James, "Landlord and Tenants," in Vaughan E. W., eds.,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V: Ireland Under the Un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p. 368.

⁸⁰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242~246.

雖然是新教徒，但他同情天主教與愛爾蘭所遭受的不平等遭遇。1875 年 Parnell 當選為國會議員，和 O'Connell 一樣，Parnell 尋求的也是議會路線，在國會中聯合其他愛爾蘭國會議員，再透過與自由黨的聯盟，為愛爾蘭爭取更多利益。有鑒於 1840 年代大饑荒主因之一就是大地主對佃農的剝削，此時愛爾蘭政治菁英所要爭取的重點就是土地改革。Parnell 藉由與自由黨的合作，1881 年使愛爾蘭重獲自由買賣土地的權力，英國政府更承諾要求英格蘭地主調降租金。除此之外，土地法庭的成立，可作為協調佃農與地主間爭議的媒介⁸¹。

另外一項愛爾蘭人所要爭取的權力是「地方自治」。從 O'Connell 開始，要求自治一直是愛爾蘭政治菁英所追求的目標。1907 年以後，澳大利亞、南非和加拿大三個大英帝國的殖民地都取得自治權。在愛爾蘭籍國會議員們強烈要求自治的聲浪下，英國政府在 1913 年頒布了地方自治法案 (*Home Rule Bills*)，然而這卻造成了愛爾蘭本身的分裂，形成聯合主義者(Unionists)與分離主義者(Separatists)的對立。前者以 Ulster 地區的新教徒為代表，後者則由南愛爾蘭民族主義者組成。

如前文所提到，從 17 世紀開始英格蘭大量將新教徒移入 Ulster 地區，到了 20 世紀此區新教徒已遠超過天主教徒。Ulster 地區的新教徒唯恐自身的優勢因為自治而淪為弱勢，因此組成聯合組一陣營，反對愛爾蘭實行自治。Unionists 組成 Ulster 自願軍 (Ulster Volunteer Force) 發起一連串的統一運動，要求繼續與英國維持統一的關係。分離主義陣營則以南愛爾蘭為大本營，組成愛爾蘭自願軍(Irish Volunteers)，以追求愛爾蘭獨立為目標。自治法案因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而暫時中止，此時愛爾蘭自願軍又再度複製老愛爾蘭人的模式，希望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英軍大量投入戰場的機會，在愛爾蘭展開武裝革命。德國方面也派人與

⁸¹ 張亞中，前引書，註 22，頁 208~209。

愛爾蘭志願軍聯繫，表達支持愛爾蘭自願軍的軍事行動，並且允諾給予援助⁸²。在 1916 年復活節前夕，德軍的援助並未依約到達，但愛爾蘭志願軍仍決定照常起義，發動復活節之役 (Easter Rising)。這次的起義雖然最後仍遭英軍鎮壓而以失敗收場⁸³，和過去不同的是這次的起義更堅定了愛爾蘭人反抗英國殖民的決心，這股力量反映在 1918 年的英國國會大選中⁸⁴。

1918 年的英國國會大選，參與復活節之役的小團體之一 Sinn Fein 組成 Sinn Fein Party，在愛爾蘭地區投入選舉角逐愛爾蘭代表席次。復活節之役唯一存活的領導人 de Valera，將 Sinn Fein Party 與復活節之役畫上等號，藉由愛爾蘭人對復活節之役的認同，尋求選民的支持。選舉結果 Sinn Fein Party 獲得 105 席中的 73 席，成為愛爾蘭代表中的最大黨⁸⁵。為了表示獨立的決心，de Valera 鼓動所有 Sinn Fein Party 當選者拒絕到英國宣誓就任，就地在都柏林自行宣布愛爾蘭共和國獨立，並召開第一屆愛爾蘭國會 (Dail Eireann)，推選 de Valera 擔任共和國總統⁸⁶。原本的愛爾蘭自願軍改組成愛爾蘭共和軍 (Irish Republican Army)，於 1919 年對英國政府宣戰，愛爾蘭獨立戰爭 (Irish War of Independence) 自此展開⁸⁷。不同於一般的正規戰，兩軍並未短兵相接正面對決。愛爾蘭共和軍採用的是暗殺與恐怖攻擊，英軍也以殘酷的手段以暴制暴。然而正逐漸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復原的英國政府，不願戰爭繼續擴大，1920 年頒布 *Government Of Ireland Bill*，將北愛、南愛分為兩個自治區，允許各自擁有自己的自治議會。北愛爾蘭的新教徒樂於接受此一法案立即於北愛 6 個郡選出議員成立自治議會；南愛爾蘭的天主教徒則是堅持繼續暴力抗爭。

⁸² McNally, Michael and Peter Dennis, *Easter Rising 1916: Birth of the Irish Republic*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7), p.30.

⁸³ 在這次起義當中，Patrick Pearse、James Connolly 等 14 名主要領導人都遭到逮捕處決，只有 de Valera 幸免於難。部分學者認為，這和 de Valera 具有美國公民身分有關。

⁸⁴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前引書，註 74, pp.4-12.

Jeremy Smith,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Home Rule to Independence* (Edinburg: Pearson, 2000), pp. 70~75.

⁸⁵ 選舉結果可參考 <http://electionsireland.org/results/general/01dail.cfm>

⁸⁶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301~302.

⁸⁷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 304.

歷時兩年的衝突不斷，雙方各有損傷，愛爾蘭共和軍方面已漸感人力不足，英國首相 Lloyd George 也想在談判桌上停止戰爭，以免愛爾蘭真的走向獨立。1921 年五月，南愛爾蘭 26 郡舉行第二屆愛爾蘭國會大選，Sinn Fein Party 取得 128 席中的 124 席⁸⁸，南愛爾蘭國會推舉 de Valera 與 Lloyd George 展開談判協議。英方的基本立場是要讓愛爾蘭成立自由邦政府與自由邦議會，但條件是自由邦政府必須承認英國對愛爾蘭的主權，自由邦議會之議員要宣誓對英王效忠。談判中的另外一項爭議是北愛爾蘭 Ulster 地區。因為握有既得利益的 Ulster 新教徒堅持反對愛爾蘭自治，因此英方所規畫的愛爾蘭自由邦並不包括 Ulster 地區。但 de Valera 的立場強硬，不接受一分為二的愛爾蘭，堅持要全愛爾蘭成為一個實質獨立的國家，而且不能只是「自治」，談判宣告破裂⁸⁹。

第二階段的談判 de Valera 改派 Sinn Fein 創立者之一的 Arthur Griffith (1872~1922) 和 Michael John Mick Collins (1890~1922) 擔任代表⁹⁰。英國方面除了 Lloyd George 還加入 Churchill。愛爾蘭方面雖不情願效忠於英王，但務實的 Griffith 和 Collins 為了要爭取可行範圍內最大的自由，決定對英國條件式妥協，以便在實質問題上有所進展。雙方針對 Ulster 地區重新畫界，將天主教徒聚集處畫入愛爾蘭自由邦，其餘的 Ulster 地區仍直屬於英國。1921 年 12 月 6 日英愛條約(Anglo-Irish Treaty)簽署完成，英愛戰爭畫下句點。1922 年 1 月 3 日愛爾蘭下議院以 64 比 57 票表決通過英愛條約，愛爾蘭自由邦 (Irish Free State)誕生⁹¹。

英愛條約雖讓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但卻也使得南愛爾蘭再度陷入分裂，形成支持自由邦的「政府軍」與反對自由邦的「反對派」之間的內戰⁹²。前者就是

⁸⁸ 選舉結果請參考 <http://electionsireland.org/results/general/02dail.cfm>

⁸⁹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313~314.

⁹⁰ Talbot, Hayden, *Michael Collins' Own Story*, (London: Hutchinson, 2007), pp.152.

⁹¹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313~314.

⁹² 條約的主要內容是：愛爾蘭南部廿六郡，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北部六郡(即為現北愛爾蘭)劃歸英國。自由邦享有名義上的自治權，但自由邦須效忠英王。對外政策和一部分內政仍在英國監督之下，且英國因軍事所需繼續控制南愛爾蘭部分港口。

Griffith 和 Collins 所組成的愛爾蘭自由邦政府；反對派領袖則為 de Valera。de Valera 反對英愛條約，因此率領 Sinn Fein Party 中的反對派退出政府運作。愛爾蘭自由邦宣告分裂，隨之而來的是愛爾蘭 11 個月的內戰。原本的革命戰友、改革夥伴，卻因為對愛爾蘭自由邦的立場不同，陷入自己人打自己人的局面。內戰的戰火之猛烈不亞於英愛戰爭，但反對派終究不敵政府軍的優勢火力。就在 Collins 與 William Thomas Cosgrave 下令鎮壓反對派後，內戰完結⁹³。

內戰雖結束，de Valera 所領導的 Sinn Fein Party 仍採取體制外的抗爭，1922-1927 年的國會選舉 Sinn Fein Party 皆有參選，但當選後皆拒絕宣誓就任以凸顯反對英愛條約的立場。1926 年底，de Valera 的態度卻有了大轉變。名義上，de Valera 雖仍然聲稱反對英愛條約，但實際上則是接受國會席次赴英宣誓就職，形同承認愛爾蘭自由邦與英國的主權關係。Sinn Fein Party 其他人無法接受 de Valera 的大轉變，因此 de Valera 選擇退出 Sinn Fein，另組 Fianna Fail Party。二十世紀初的復活節之役、英愛戰爭與愛爾蘭內戰，都讓國家和人民付出慘痛代價，但最後得到的依然只是自治。如果 de Valera 願意早點接受愛爾蘭自由邦政府，那麼 1922 年的愛爾蘭內戰或許就可以避免。

de Valera 率領 Fianna Fail Party 打著反對英愛條約的旗幟於 1932-1957 年間三度贏得選舉⁹⁴。在這 28 年間，de Valera 是愛爾蘭最重要的領導人。在他執政期間與英國政府產生許多衝突，諸如經濟戰爭、閉關自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立政策等等，在第三章當中會詳細介紹。第三章將進入本文的分析重點，本研究所要比較分析的是以 1959 年為分水嶺，前後兩期的愛爾蘭經濟外交策略的轉變及轉變之因。

⁹³ Collins 遇刺身亡後，Cosgrave 被推選為第一任自由邦總理。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316~318.

⁹⁴ 有學者認為，這是因為 1927 年 Cosgrave 政府改變選舉法規，要參選人在登記參選的同時，就必須宣誓「如果當選就要就職」，否則不得參選。新的選舉法規讓 de Valera 的就職有了正當性。

第三章 愛爾蘭近代經濟與外交

19 世紀末以來，愛爾蘭的政治菁英就以追求獨立為首要目標，急欲脫離英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掌控。追求獨立的精神就具體展現於愛爾蘭的經濟與外交政策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愛爾蘭建立自由邦政府，享有部分內政與外交上的自主權。愛爾蘭的經濟發展，受到國際環境和政府的經濟政策的影響。在國際環境上，歷經兩次世界大戰，美蘇雙極的國際體系逐漸成型，此時的英國雖不如大英帝國全盛時期強大，但仍是國際政治上的強權之一，自然不可能放任愛爾蘭。愛爾蘭想在政治上獨立自主，在經濟上卻又不得不依賴英國。在政府政策上，若欲分析愛爾蘭的經濟外交政策萬不可忽略的是「領導者的認知」。在本章及接下來的第四章當中，本研究將探討從 1932 年 de Valera 重新執政開始，一直到愛爾蘭共和國獨立初期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於此期間，國際上先是遭逢經濟大蕭條 (Great Depression) 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緊接而來的是戰後歐洲各國的快速復興和歐洲的統合。de Valera 與 Sean Lemass 是在愛爾蘭這段時間裡最重要的兩個領導人，兩人雖然同屬 Fianna Fail Party，Lemass 甚至曾是 de Valera 所倚重的財經官僚，但兩人主政期間，卻採取截然不同的經濟外交策略。本章將檢視「1932 年經濟戰爭」、「語言政策與戰時中立策略」，以說明愛爾蘭的經濟與外交政策。

第一節 自由邦政府時期的經濟戰爭

1932-1938 年愛爾蘭對英國的經濟戰爭有三條主要的導火線，分別是忠誠誓約 (Oath of Allegiance)、土地年金 (Land Annuities) 與愛爾蘭對英國長期的貿易逆差。在討論經濟戰爭以前，本研究要先簡單回顧忠誠誓約以及土地年金的由來，此外還有 1920 年代愛爾蘭自由邦的政治經濟情勢。

忠誠誓約的爭議起源於 1921 年英愛條約 (*Anglo-Irish Treaty*) 的簽訂。忠誠誓

約規定所有愛爾蘭人都必須向英國國王宣誓效忠，不宣誓者不得擔任公職。de Valera 認為，忠誠誓約是中古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惡俗，誓約的存在對愛爾蘭人是一種羞辱，因此「廢止忠誠誓約」向來是 de Valera 的選舉政見⁹⁵。de Valera 的另外一個政見則有關愛爾蘭自由邦政府與英國政府間的國債問題。1922 年愛爾蘭自由邦成立之時，英國政府出面協調，將原本英格蘭地主在愛爾蘭的土地交給愛爾蘭佃農，再由愛爾蘭自由邦政府每年支付約五百萬英鎊的「土地年金」給英國政府做為補償⁹⁶。首任的自由邦總理 William Thomas Cosgrave (1880-1965) 立場較為親英，雖然對英愛條約並不十分滿意，但更反對與英國正面衝突。Cosgrave 原與 de Valera 私交甚篤，兩人是復活節起義的革命夥伴。在 de Valera 擔任愛爾蘭共和國(Irish Republic)⁹⁷總統時，曾任命 Cosgrave 擔任內政部長，使 Cosgrave 累積行政經驗與知名度⁹⁸。直到英愛條約簽定後，de Valera 與 Cosgrave 對英愛條約的看法迥異。前者反對條約將北愛爾蘭分裂出去，更反對愛爾蘭以自由邦的形式繼續臣屬於英國；後者則是在 1922 年大選中投效「支持英愛條約」陣營。1922 年選舉結果，支持英愛條約的一方以 Cosgrave 所屬的 Cumann na nGaedheala 為代表獲得 58 席，反對英愛條約的 Sinn Fein Party 僅獲得 36 席，支持英愛條約陣營勝出。1922 年 12 月愛爾蘭自由邦正式成立，Cosgrave 被推舉為愛爾蘭自由邦第一任總理。愛爾蘭自由邦內戰期間，Cosgrave 為了穩固自由邦的秩序，下令出兵鎮壓並逮捕曾經在復活節起義中並肩作戰的反對派人士，處死 77 人，Cosgrave 與 de Valera 自此在政治立場上漸行漸遠⁹⁹。

1922-1932 年 Cosgrave 執政期間，愛爾蘭的經濟政策主張輕稅簡政，反對赤字預算，貿易上極力避免不必要的關稅保護政策，支持自由貿易。1927 年開始

⁹⁵ Canning, M. Paul, "The Impact of Eamon de Valera: Domestic Causes of the Anglo-Irish Economic War,"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vol. 15, no. 3 (Autumn 1983), p. 185

⁹⁶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 322.

⁹⁷ 此處所指的是 1918 年 de Valera 自行宣布獨立的愛爾蘭共和國，並非 1949 年獲國際承認的愛爾蘭共和國。

⁹⁸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註 45, pp. 315~317.

⁹⁹ 周惠民，前引書，註 33，頁 192~193。

Cosgrave 又推行一連串的工農計畫與交通、電力建設，三年內製造出一萬個就業機會¹⁰⁰。在 1929 年經濟大蕭條以前，愛爾蘭的經濟表現大致穩定，使 Cosgrave 先後在 1923 年與 1927 年贏得執政權連任總理¹⁰¹。

(表 2 約置於此)



¹⁰⁰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 註 45, p. 321..

¹⁰¹ 請參考 <http://electionsireland.org/results/general/01dail.cfm>

表 2 1922-1933 愛爾蘭主要政黨國會席次及百分比

政 黨 年 度	Sinn Fein	Cumann na nGaedhe al	Fianna Fail	Labor	Clann na Talmhan	Others	Total
1922	36(28.1%)	58(45.3%)		17(13.3%)	7(5.5%)	10(7.8%)	128(100%)
1923	44(28.8%)	63(41.2%)		14(9.2%)	15(9.8%)	17(11.1%)	153(100%)
1927/6	5(3.3%)	47(30.7%)	44(28.8%)	22(14.4%)	11(7.2%)	24(15.7%)	153(100%)
1927/9		62(40.5%)	57(37.3%)	13(8.5%)	6(3.9%)	15(9.8%)	153(100%)
1932		57(37.3%)	72(47.1%)	7(4.6%)	4(2.6%)	13(8.5%)	153(100%)
1933 ¹⁰²		48(31.4%)	77(50.3%)	8(5.2%)	11(7.2%)	9(5.9%)	153(100%)

資料來源：節錄自 <http://electionsireland.org/results/general/01dail.cfm> 再由
作者自行編輯製作，網底為總理所屬政黨。

¹⁰² 1933 年 Cumann na nGaedheal 改組為 Fine Gael Party。

由表 2 可知，Cosgrave 所屬的 Cumann na nGaedheal 從 1922 到 1927 年歷次國會大選中，席次雖均未過半。然而，其他政黨既無法單獨構成威脅，彼此間又不能有效聯合，因此 Cumann na nGaedheal 仍能以最大黨的態勢繼續執政。在第二章當中有提到，Sinn Fein Party 在 1926 年 de Valera 脫黨後隨即沒落，1927 年 6 月的大選中，Sinn Fein Party 只獲得 5 席，取而代之的是 de Valera 所創建的 Fianna Fail Party，一舉獲得 44 席，僅落後執政黨 Cumann na nGaedheal 三席。Cosgrave 眼見執政的地位不穩固，因而在同年 9 月宣布解散國會重新選舉。選舉結果 Cumann na nGaedheal 獲得 62 席，但 Fianna Fail Party 也增長至 57 席。在野的 de Valera 受到鼓舞亟思振作，等待重新贏取執政的機會。1929 年開始的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嚴重衝擊愛爾蘭經濟，訴諸民族主義本是 de Valera 最拿手的武器，經濟大蕭條給了 de Valera 絕佳機會。

受到經濟大蕭條的影響，1929 年起英國開始緊縮進口政策，依賴英國市場的愛爾蘭出口業者首當其衝。1929-1931 年愛爾蘭的經濟成長率為-9%，出口貿易額度萎縮 14%¹⁰³。面臨經濟的不景氣，de Valera 在怪罪執政黨之餘，又趁機將責任指向英國，因此廢除忠誠誓約、拒繳土地年金、平衡貿易逆差成了 de Valera 最有力的政見¹⁰⁴。原本要在 1932 年年底舉行的大選，Cosgrave 卻決定提前在 1932 年 2 月舉行，Cumann na nGaedheal 訴諸過去十年的執政表現希望贏得選民青睞，但是經濟不景氣的時刻，執政黨自然要背負較大的責任，選民往往較支持在野黨以尋求改變¹⁰⁵。在野的 de Valera 融合社會主義與民族情感的訴求，帶給選民新的希望。由前文表 2 可見，Fianna Fail Party 就在 de Valera 的領導下獲得 72 席，成為國會最大黨，de Valera 獲提名出任愛爾蘭自由邦總理，取得組閣權。經濟不

¹⁰³ McAleese, Dermot “Anglo- Iris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From Excessive Intimacy to A Wider Embrace,” in Drudy, P. J, eds., *Ireland and Britain Since 1922* (London: Cambridge, 1986), p. 88.
Irish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0.

O’Grada, Cormac, 前引書，註 64, p.445.

¹⁰⁴ McAleese, Dermot, 前揭書, p.89.

¹⁰⁵ Fiorina, P. Morris,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景氣加上錯估情勢提前投票，使 Cosgrave 從此失去執政權¹⁰⁶。de Valera 本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當有了一定的支持群眾，更讓他勇於不計代價謀以求改變現狀。

de Valera 就任總理以後，立即要面對群眾對他選舉政見的檢視。英國政府最初認為，即使 de Valera 的少數政府急欲實現競選時所提出的廢除忠誠誓約、停止繳納土地年金兩項政見，愛爾蘭議會中其他政黨也會否決此項提案。再加上經濟大恐慌的效應已漸漸開始浮現，英國並不願在此時與愛爾蘭在經濟上正面衝突。因為英國的貿易赤字必須仰賴出口彌補，而愛爾蘭又是英國最主要的貿易夥伴之一。

在貿易戰爭開始前，1931 年愛爾蘭自英國的進口額度佔其進口總額的 81%，而出口市場也 90% 以上集中在英國，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使英國政府不願貿然在經濟上與愛爾蘭直接衝突。同一年度英國對愛爾蘭享有高達 580 萬英鎊的貿易出超¹⁰⁷，如果雙方展開經濟戰爭，對英國貿易傷害甚鉅，無疑是在經濟大蕭條的當下雪上加霜。因此英國方面盤算的是再次政黨輪替。雖然 Fianna Fail Party 贏了 1932 年的選舉而得以執政，但 Cumann na nGaedheal 或許能夠在下次選舉中擊敗 Fianna Fail Party 奪回執政權。除此之外，英國也忌憚太激烈的作為會激起愛爾蘭民眾的仇英情緒，英國政府不希望因為 de Valera 一個人而拖垮全英國的經濟與英愛雙方關係。

重新執政的 de Valera 為了迅速鞏固政權，立即鼓動民族主義，片面宣布廢除忠誠誓約並停止對英國繳交土地年金。此時英國政府並沒有立即強烈反制的動作，仍希望透過外交談判，未有具體的報復性政策。1932 年 6 月，de Valera 與英國的協商代表分別在都柏林與倫敦兩度展開協商，談判過程中英國政府主張忠

¹⁰⁶ 1932 年 Cosgrave 下野後，終其一生都未再贏得組閣權。

¹⁰⁷ 請參考 *Irish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0。

誠誓約與土地年金都應該交由帝國法庭(Imperial Tribunal)仲裁，但是 de Valera 質疑帝國法庭的公平性，斷然拒絕英國政府的提議，第一回合談判宣告破裂¹⁰⁸。

有學者認為，愛爾蘭和英國衝突的升高，除了 de Valera 的意識形態，英國方面也有責任。F.S.L. Lyons 就將經濟戰爭的原因，歸咎於當時英國的聯合內閣¹⁰⁹。1932 年英國的政治情勢正處於大聯合政府時期，保守黨、工黨、自由黨共組聯合內閣。雖然聯合政府的首相是工黨 Ramsay Macdonald，但主要的決策者乃是保守黨的 Stanley Baldwin 和 Neville Chamberlain¹¹⁰。針對愛爾蘭問題，內閣中立場偏左的工黨與自由黨主張採行較溫和的協商路線來解決，但主要決策的保守黨卻立場堅決，拒絕對愛爾蘭讓步，政府中溫和派的声音因此被犧牲了¹¹¹。保守黨之所以主張採取強硬立場，是為了防堵 Lloyd George 與 Churchill。立場被歸為強硬派的 Lloyd George 與 Churchill 此時被刻意排除在聯合政府之外，執政的聯合政府不想因為軟弱的作為而遭致 Lloyd George 與 Churchill 的批判。若是對愛爾蘭政策失敗，民眾喪失對現任內閣官員的信心，無形中將提供 Lloyd George 與 Churchill 重新回到政府的機會。

就在 1932 年 6 月愛爾蘭與英國雙方第一回合談判宣告破裂後，英國大眾幾乎一面倒地認為是 de Valera 破壞了雙方的友好關係，督促政府要有更積極的作為以迫使愛爾蘭自由邦政府回到常軌¹¹²。以 Churchill 為首的強硬派人士認為，忠誠誓約和土地年金都不是 de Valera 的主要目的，其背後更大的陰謀是要藉此來否定 1921 年的英愛條約。他們認為 de Valera 想先了斷愛爾蘭自由邦和英國的關係，進而宣布獨立。在此種輿論氛圍之下，政府若持續消極作為將衝擊聯合內閣的聲望。內閣中除了少數工黨和自由黨閣員之外，其餘都傾向對愛爾蘭採取更

¹⁰⁸ Canning, M. Paul, 前引書, 註 95, p. 189.

¹⁰⁹ Lyons, F. S. L., *Ireland Since the Famine* (London: Fontana, 1973).

¹¹⁰ Canning, M. Paul, 前引書, 註 95, pp. 179~205.

¹¹¹ Hyde, H. Montgomery, *Baldwin: The Unexpected Prime Minister* (London: Hart-Davis MacGibbon, 1973), p.318.

¹¹² Canning, M. Paul, 前引書, 註 95, p. 189.

強硬的措施。

擔任英國自治領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Dominion Affairs)的 James Henry Thomas (1874-1949)認為，de Valera 的重新執政會成為英愛關係的重大威脅。Thomas 的政治判斷促成愛爾蘭自由邦與英國政府的衝突加劇。雖然 Thomas 也主張若 Cosgrave 能在下一次的大選中擊敗 de Valera，雙方貿易關係即可回到現狀，但英國政府必須有主動作為讓愛爾蘭再度發生政黨輪替。1932 年 6 月雙方談判破裂後，Thomas 認為強硬的行動將有助於 Cosgrave 在愛爾蘭的聲望；相反的，消極被動只會助長 de Valera 等激進份子的氣燄。因此他建議利用 1932 年 11 月英國對愛爾蘭的關稅優惠條約到期後，重新對愛爾蘭的貨物課徵關稅。若繼續放任 de Valera 恣意妄為，雙方問題就不再只是貿易層面的問題，終將演變成主權問題¹¹³。

1932 年 7 月 1 日 de Valera 正式宣布扣留 500 萬英鎊的土地年金，愛爾蘭與英國間的經濟戰爭自此展開。7 月 12 日英國以 20% 的稅率對愛爾蘭農產品課徵進口關稅做為愛爾蘭扣留土地年金的回應。就在英國以關稅作為對 de Valera 的報復後，愛爾蘭方面一則為了彌補愛爾蘭對英國長久以來的貿易逆差，再則要展現與英國抗衡到底的決心，因此 7 月 23 日宣布將要對英國出口至愛爾蘭的煤礦收取高關稅¹¹⁴。

愛爾蘭與英國於 1932 年 10 月再度展開協商，英方代表雖然考慮停止經濟戰爭，但是必須是在維持忠誠誓約和土地年金的完整性為前提下。愛爾蘭代表當然不願意就此罷手，雙方的談判又告破裂。就在二度談判破裂後，de Valera 決定執行廢止忠誠誓約並拒絕繳納 1932 年當年度土地年金。此時 Cosgrave 也派人至英國，要求英國政府一定要在 de Valera 將煤礦關稅相關法案三讀通過前有強硬作

¹¹³ Lyons, F. S. L., 前引書, 註 109, p.511.

¹¹⁴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88), p.42.

為。但英國駐愛爾蘭貿易特派員 William Peters 卻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他反對使用經濟戰爭的手段來解決問題。從政治面分析，對愛爾蘭經濟制裁只會讓 de Valera 更有藉口訴諸民族主義的仇英情緒來動員群眾，根本無助於 Cosgrave 的選情。從經濟面來看，英國出口至愛爾蘭的煤礦若遭到關稅報復，將對英國煤礦產業造成衝擊¹¹⁵。自由黨與工黨都呼應 William Peters 的看法，反對經濟戰爭，認為過於激烈的手段只會使愛爾蘭人民更仇恨英國¹¹⁶。

首相 Macdonald 則呼應 Cosgrave 的觀點，認為只要英國能夠繼續堅持到底，最後勝利的會是英國，且 de Valera 將會輸掉選舉；但如果英國對愛爾蘭妥協，在野的 Cosgrave 將因英國的讓步而難堪，而英國也將會在北愛爾蘭失去民心，愛爾蘭共和軍將會誤認為英國政府軟弱無能。況且，經過兩回合的談判，Macdonald 認為 de Valera 根本沒有意願要解決問題，de Valera 只是想要藉機引發更大的衝突，好完成個人獨立建國的心願。財政大臣 Chamberlain 也認為，對愛爾蘭的貨物課徵進口關稅，將是彌補土地年金損失最直接的方式。

de Valera 做為少數政府的內閣總理，卻仍大膽鼓動民族主義挑戰現狀。對外需應付英國的威脅與恫嚇；對內則要面對 Cosgrave 為首的嚴厲抨擊。但是就在經濟戰爭爆發後，愛爾蘭人民的仇英情緒果真被喚醒。1933 年 1 月 de Valera 眼見民氣可用，決定孤注一擲宣布提前解散國會重新選舉。依照英國最初的判斷 Cosgrave 能夠擊敗 de Valera 重新執政，讓英愛關係回歸常軌。未料選舉結果揭曉，在民族情感的催化下，愛爾蘭選民對 de Valera 愛戴遠勝過對 Cosgrave 的支持，由 Cumann na nGaedhea 所重組的 Fine Gael Party 再度敗選。

由前文表 2 可知，de Valera 所領軍的 Fianna Fail Party 在 1933 年大選中席次增加五席，突破 50% 的門檻。反觀由 Cumann na nGaedheal 所改組的 Fine Gael

¹¹⁵ Canning, M. Paul, 前引書, 註 95, p. 194.

¹¹⁶ Canning, M. Paul, 前引書, 註 95, p. 194.

Party 席次卻少了九席，在總席次比例上僅剩 31.4%。親英派 Cosgrave 的失敗形同英國政府的一大挫敗，英國內閣官員開始擔心，如果不能夠順利而且強硬的解決愛爾蘭問題，將會給 Churchill 東山再起的機會。熟知愛爾蘭事務的 William Peters 再度提出警告，認為阻礙雙方貿易協定的主因是錯把政治問題與財經議題綁在一起，若英國最後決定通過貿易制裁，形同迫使愛爾蘭另尋英國以外的貿易對象，英國將從此失去愛爾蘭市場。

但是在愛爾蘭方面，1933 年 3 月 de Valera 利用在議會中的優勢席次，通過 *Land (Purchase Annuities Fund) Bill*，決定將土地年金留做地方政府建設計畫支出之用，拒繳土地年金已成為既定政策¹¹⁷。同年英國就通過 *Import Duties Act*，針對愛爾蘭出口的產品課徵進口關稅從 20% 提高到 30%，這涵蓋了愛爾蘭總出口額的 90%。de Valera 隨即進一步扣留原本屬於英國駐愛爾蘭皇家警察的津貼¹¹⁸，情勢突然失去控制，經濟戰爭情勢升高。據統計，愛爾蘭對進口貨物所課徵的關稅，在 1931 年僅有 68 品項，平均稅率為 9%；到了 1936 年經濟戰爭結束前兩年竟高達 281 品項，平均稅率約 45%¹¹⁹。

除了忠誠誓約與土地年金的爭議，長久以來愛爾蘭對英國的貿易赤字也是 de Valera 急欲扭轉的對象¹²⁰。Cosgrave 執政期間雖主張自由貿易，反對關稅壁壘，但長久以來的產業結構與生產力不足的問題，使愛爾蘭對英國有相當大貿易逆差。在經濟戰爭發生的前一年，愛爾蘭對英國的出口約為 3,500 萬英鎊；對英國的進口則有 4,080 萬英鎊，貿易逆差達 580 萬英鎊¹²¹。Cosgrave 的自由貿易政策，讓許多外商，尤其是英國商人在愛爾蘭投資設廠，再將產品賣給愛爾蘭人。設在愛

¹¹⁷ 請參考愛爾蘭國會 1933 年 3 月 16 日會議記錄

(<http://historical-debates.oireachtas.ie/D/0046/D.0046.193303160008.html>)

¹¹⁸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前引書, 註 114, p.42.

¹¹⁹ W. J. L. Ryan, "Measurement of Tariff Levels for Ireland for 1931, 1936, 1938" i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and Social Inquiry of Ireland*, vol. 18, 1948-9, pp.109-133.

¹²⁰ Daly, E. Mary, "An Irish-Ireland of Business? The Control of Manufactures Acts, 1932 and 1934," in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4, no.94 (Nov. 1994), pp.251-252.

¹²¹ 請參考 *Irish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0.

爾蘭的工廠替英國人賺愛爾蘭人的錢，又排擠了愛爾蘭本土產業¹²²。de Valera 執政後一改 Cosgrave 所主張的自由貿易，改行「自給自足」的保護主義經貿政策，避免國內商品與他國商品競爭，也要保護本土產業不因外資企業而遭致淘汰。Fianna Fail Party 承諾要保護國內市場與本土廠商，具體作為體現在限制國外資本到愛爾蘭投資，讓愛爾蘭產業走向勞力密集化¹²³。特別是在對英國貿易政策上，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使原本就處於緊張的英愛關係情勢更加惡化。de Valera 想要藉由控制國內市場的方式，快速製造就業機會，扶持本土產業¹²⁴。因此愛爾蘭政府於 1932 年頒布 *Control of Manufactures Acts*，規定所有到愛爾蘭設廠的公司若外資股份大於本土股份，必須要先得到政府核可的執照¹²⁵。而政府發照的原則是，到愛爾蘭設廠的外資，不可以排擠到愛爾蘭的本土企業¹²⁶。Fianna Fail Party 的產業政策未考量愛爾蘭農優於工的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再加上英國對愛爾蘭農產品施加報復性關稅的結果，造成愛爾蘭在經濟戰爭期間農業損失嚴重。以酪農業為例，學者估計經濟戰爭期間愛爾蘭酪農的「生產者剩餘」大量萎縮，原本每年出口利益大約一千萬英鎊，經濟戰爭後僅剩下大約四百萬英鎊¹²⁷。愛爾蘭的消費者剩餘也因經濟戰爭而萎縮，由於愛爾蘭對英國的煤炭課徵高關稅，對愛爾蘭的鋼鐵製造業而言，進貨成本大幅提高，利潤降低就必須靠提高售價來補償¹²⁸。

從政治面來看，de Valera 用「取消忠誠誓約」與「拒繳土地年金」為號召，訴諸民族情感。而英國政府的制裁雖然傷害了愛爾蘭，但也激起了民眾對英國的反感。de Valera 正是利用這種仇英情緒在 1933 年選舉中鞏固了 Fianna Fail 的政治基礎。但若從經濟角度來看，用閉關自守的手段來「平衡貿易赤字」，卻嚴重

¹²² Daly, E. Mary, 前引書，註 120, p.248.

¹²³ O'Grada, Corma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since 1870,"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7 no. 107 (May, 1991), p.252.

¹²⁴ 前揭書，p.251.

¹²⁵ McAleese, Dermot, 前引書，註 103, p.91.

¹²⁶ Daly, E. Mary, 前引書，註 120, pp.246-272.

¹²⁷ O'Grada, Cormac, 前引書，註 123, p.252.

¹²⁸ O'Grada, Cormac, 前引書，註 123, p.261.

打擊了愛爾蘭的經濟發展。

(表 3 約置於此)



表 3 愛爾蘭經濟戰爭前後之進出口變動

單位：百萬英鎊

對 外 貿 易	年 度	1931	1936	變動 百分比
愛爾蘭進口總額		50.5	39.9	-22.2%
愛爾蘭出口總額		36.3	22.5	-38%

資料來源：1931 年資料來自 Irish Statistical Abstract, 2000。1936 年資料來自 McAleese, Dermot “Anglo- Iris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From Excessive Intimacy to A Wider Embrace”, pp. 88.

由表 3 可觀察到，自 1932 年 de Valera 執政開始，經濟戰爭與閉關自守政的經濟策對愛爾蘭的貿易衝擊相當大。愛爾蘭無論是進口或是出口市場都有相當幅度的萎縮，出口貿易縮減了 38%，進口也少了 22%。在其他數據方面，1932-1938 年的平均年度出口值為 2,130 萬英鎊，比 1925-1931 年的平均值少了 50%；畜牧業的產值在 1929 年尚有 1,970 萬英鎊，1934 年僅剩 610 萬英鎊。經濟戰爭對貿易所造成的傷害，一直要到 1960 年才回到 1930 年的水準¹²⁹。

1935 年英國方面因為深感歐洲戰事日漸吃緊，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時任英國首相的 Chamberlain 懼怕德國拉攏愛爾蘭從東面夾攻英國，因此願意在英愛關係上讓步。愛爾蘭方面則是憂慮即將接任英國首相的 Churchill 將比 Chamberlain 更難對付，必須把握時間取得最佳的談判籌碼。1935 年 1 月愛爾蘭與英國雙方簽訂 *Coal- Cattle Pact*，貿易上愛爾蘭同意以提高英國煤礦進口量的方式，換取增加愛爾蘭畜牧產品出口到英國的配額，經濟戰爭始有和緩的跡象¹³⁰。1938 年雙方簽訂英愛貿易協定 (*Anglo-Irish Trade Agreement*)，愛爾蘭同意一次繳清一千萬英鎊土地年金¹³¹，並且同意取消對英國貨物的關稅；英國則是重新開放愛爾蘭農產品進口，並歸還原本英國在愛爾蘭的軍用港口¹³²。

為了抵擋來自在野黨 Cosgrave 的挑戰，de Valera 選擇以民族主義迎戰。在 de Valera 的領導下，產業政策受意識形態主導，易言之，這場經濟戰爭在政治上的意義大於經濟上的目的。民族主義的貿易政策造成的負面影響短期內雖不明顯，但在經濟戰爭過後一一浮現。其中以前文所述的生產力下降最為嚴重。經濟戰爭所造成的另外一個影響則是財富的轉移。忽視比較利益的經濟政策，使得農業產

¹²⁹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前引書, 註 114, pp.44~45.

¹³⁰ Lee, Joseph, *Ireland, 1912-1985: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01.

¹³¹ 原本的積欠總額是一千一百七十五萬英鎊。在此次協議中，愛爾蘭獲得一百七十五萬的減免，英國則是終於在二次大戰情勢升高前，解決了與愛爾蘭的貿易爭議。

¹³² McAleese, Dermot, 前引書, 註 103, pp.92.

值下降，製造業的產值短暫上升¹³³，促使原本支持 Cosgrave 的工人階級轉而支持 de Valera。對於受害的小農，政府採用發放津貼的方式補償，因此這些原本就屬於 Fianna Fail Party 忠實支持者的小農雖不滿，也不至於投票反對 de Valera¹³⁴。短期而言，相較於工人受惠、小農受補貼，經濟戰爭的農業損失，最大的受害者是少數擁有廣大農地，經營農產出口的大農。討好對手的支持者，安撫自己的支持群眾，再把傷害轉嫁到少數大地主。這說明了為何在經濟表現不理想的情況下，de Valera 仍能四度帶領 Fianna Fail Party 贏得大選¹³⁵。

衝突的經貿政策讓愛爾蘭付出下降 3 個 GDP 百分點做為代價，換算金額大約是 3150 萬英鎊¹³⁶。對善於演說的 de Valera 而言，激起群眾對英國的仇恨是他的專長，也把愛爾蘭帶向孤立、保守。

「如果僕人對主人的拳腳相向感到不滿，並且希望能夠獲得他該有的自由，那麼這個僕人無可避免將面臨抉擇。為了換取夢寐以求的自由，他必須決定是否願意暫時放棄眼前的奢侈品與豪華宅邸，以及一切既有的舒適生活¹³⁷。」

從這段 de Valera 的論述中可見，為了實現民族主義的政治標的，寧可犧牲愛爾蘭的經濟福祉，也不願意再受制於英國。這位愛爾蘭的民族英雄讓愛爾蘭在他主政之下逐漸淪為「歐洲的乞丐」。

下一節將檢視 de Valera 執政期間的語言文化政策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立政策。de Valera 一心想驅逐所有英國遺留下來的殖民陰影，而語言具有乘載文化、

¹³³ O'Grada, Cormac, 前引書, 註 123, pp.251.

¹³⁴ O'Grada, Cormac, 前引書, 註 123, pp.255.

¹³⁵ Kevin O'Rourke, "Burn Everything British but Their Coal: The Anglo-Irish Economic War of the 1930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2 (June 1991), pp.359~365.

¹³⁶ O'Grada, Cormac, 前引書, 註 64, pp. 320~321.

¹³⁷ De Valera, Eamonn, *Fianna Fail and its economic policy* (Dublin: Nation Executive of Fianna Fail, 1928), p.3.

傳承歷史與表達認同的意義，自然成為 de Valera 極力想「改革」的標的。又因為不想與英國共處同一陣線，de Valera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寧可堅守中立，也不要接受美國邀請加入同盟國。事後證明，英語是愛爾蘭打入國際市場的重要工具，中立政策則是影響美國戰後貸款給愛爾蘭的意願。此二政策雖不是直接的經濟政策，卻仍可見 de Valera 在經濟外交上的抗衡態勢。



第二節 語言復興運動與二戰時的經濟外交

如前文第二章所述，塞爾特人 (Celts) 於西元前四世紀來到愛爾蘭島，他們同化了居住在當地的伊比利亞人，讓塞爾特語漸漸演變成為今日的愛爾蘭語。愛爾蘭語在語言學分類上屬於印歐語系的塞爾特特語族，西元 432 年，聖派翠克 (St. Patrick) 從歐洲大陸來到了愛爾蘭，將基督教傳入，將羅馬字母帶入愛爾蘭語。到了西元九世紀時，愛爾蘭語已經成為愛爾蘭與蘇格蘭地區的強勢語言，這是愛爾蘭語被使用的最高峰時期¹³⁸。西元十二世紀起，英格蘭開始對愛爾蘭展開入侵，英語也被英格蘭人帶入了愛爾蘭島。在語言的同化上，起初仍僅止於都柏林地區，在愛爾蘭島的其他地方，愛爾蘭語依然是民間日常生活最普遍的語言¹³⁹。然而，隨著英格蘭人殖民的深化，統治者有意識的要讓英語逐漸取代愛爾蘭語的地位。西元 1367 年，英格蘭頒布了 *Statutes of Kilkenny*，一系列的法案刻意打壓愛爾蘭語¹⁴⁰，壓制了愛爾蘭的語言習慣¹⁴¹。就在克倫威爾征服愛爾蘭後，英語成為愛爾蘭島上的強勢語言。在政治、經濟與文化上具有優勢的人，都是使用英語。1801 年愛爾蘭被併入英國後，英國政府於 1831 年在愛爾蘭設立國民學校 (National School)，使用英文教學，學校禁止學生以愛爾蘭語交談¹⁴²。

另一個使愛爾蘭語人口大幅下降的主因則是 19 世紀中葉的「大饑荒」事件。西元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饑荒，造成愛爾蘭島上約百萬人的死亡與三百六十多萬人的移民出走。1841-1861 此 20 年內，愛爾蘭人口成長率為-33%¹⁴³。饑荒多發

¹³⁸ 張學謙，「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以愛爾蘭語言復興為例」，施正鋒、謝若蘭主編，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9 年），頁 163。

¹³⁹ O'Riagain, Donall, "Irish – Official Yet Lesser Used,"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gress on Language Policies on Barcelona, (April, 2002).

(全文可見於 http://www.linguapax.org/congres/taller/taller3/article21_ang.html)

¹⁴⁰ 禁止在愛爾蘭的英格蘭人說愛爾蘭語、禁唱愛爾蘭歌謠、禁用愛爾蘭姓名。

(法律全文可見於 <http://www.libraryireland.com/JoyceHistory/Kilkenny.php>)

¹⁴¹ Sean O'Bradaigh, "An Ghaeilge Why it is so important," present at an Education Seminar in Dundalk, (February 20, 2000)

(全文可見於 <http://www.rsf.ie/gaeilge.htm>)

¹⁴² O'Riagain, Donall, 前引書，註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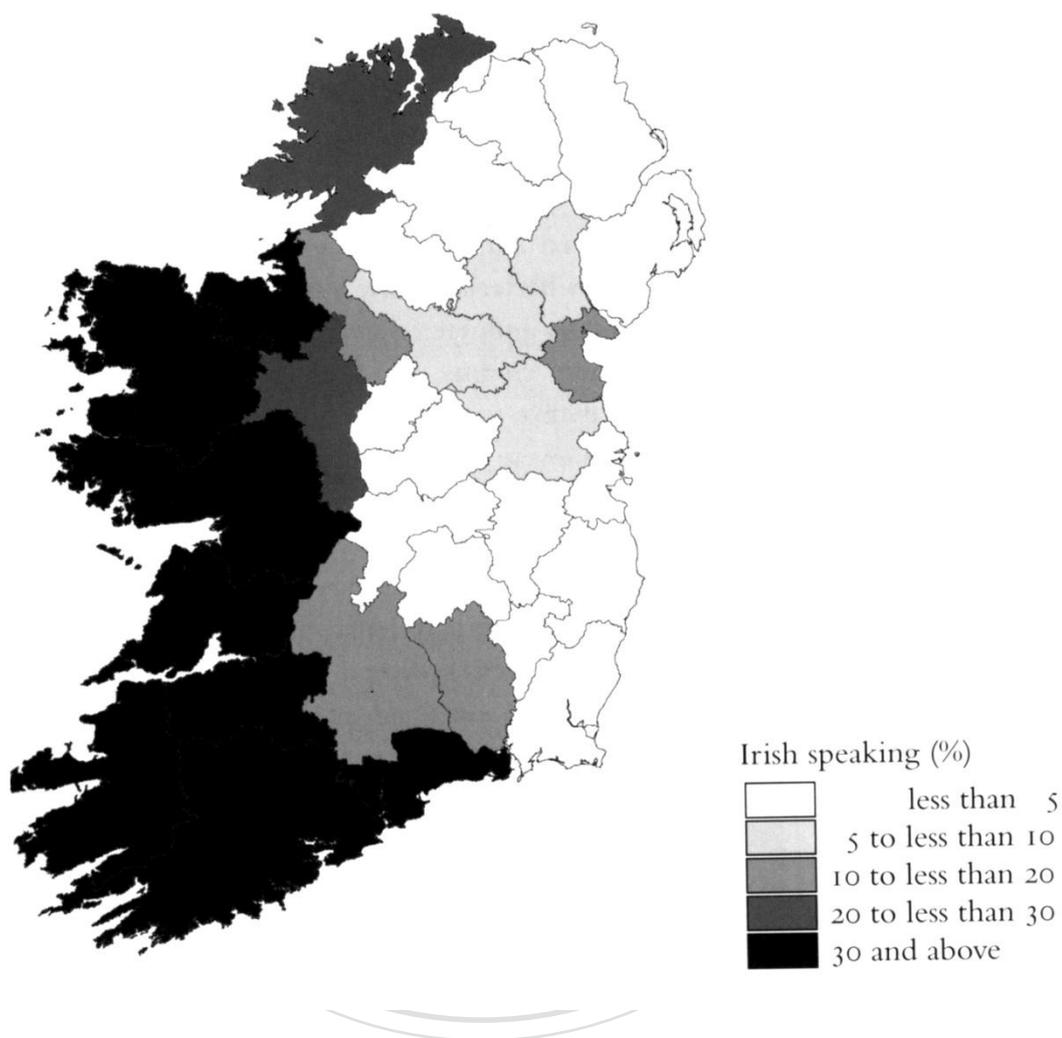
¹⁴³ 1841 年愛爾蘭人口為 6,529,000 人，1851 年為 5,112,000 人，1861 年更銳減為 4,402,000 人。

生於貧困農業地區，而這些地區正好就是愛爾蘭語被使用最頻繁，愛爾蘭語人口最多的地區。就在大饑荒的「天災」與英國政府政策的「人禍」雙重打壓之下，愛爾蘭語在愛爾蘭島上幾乎被連根拔除。

(圖 9 約置於此)



圖 9 19 世紀中愛爾蘭語人口分佈圖



資料來源：節錄自 Kennedy, Liam, Ell, Paul, Crawford, M. E, and Clarkson, A. L, editions, *Mapp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9), p.103.

由圖 9 可知，19 世紀的愛爾蘭語分佈圖略同於圖 4 的 1940 年代死亡率分部圖。愛爾蘭語人口分布最密集處也就是大饑荒時期死亡率最高的西半部及南部，因為大饑荒使愛爾蘭語人口銳減。

19 世紀晚期愛爾蘭的學界興起一股「反英國化」的浪潮，喚起許多有志青年投入愛爾蘭語言文化復興運動。1893 年在 Douglas Hyde (1938-1945) 的推動下，成立「愛爾蘭聯盟」(Conradh na Gaeilge)。此聯盟的主要目標有：

1. 保存愛爾蘭語並將愛爾蘭語推廣成為日常生活用語。
2. 研究並培植愛爾蘭文學¹⁴⁴。

雖然在愛爾蘭聯盟大力提倡之下，愛爾蘭語的文學作品有了亮眼的成績單，但在日常生活的語文方面，愛爾蘭語並沒有真正得到提升。1901 年的普查中，愛爾蘭語人口僅占總人口數的 19.2%¹⁴⁵。

愛爾蘭自由邦於 1922 年建立之後，愛爾蘭官方開始接手愛爾蘭語的復興。自由邦政府提出兩大語言文化目標：(1) 要讓原本講英語的地區改說愛爾蘭語，讓愛爾蘭語成為日常生活用語。(2) 要在原本講愛爾蘭語的地區加強推行愛爾蘭語，讓愛爾蘭語永續留存¹⁴⁶。愛爾蘭自由邦政府的愛爾蘭語復興計畫，主要透過學校教育來執行，自由邦政府甚至規定，擔任自由邦政府職務的公務人員，必須精通愛爾蘭語¹⁴⁷。de Valera 也參加過愛爾蘭聯盟，對英語還有英格蘭文化的仇視，也是他動員的利器。在 de Valera 率領 Fianna Fail Party 於 1932 年贏得大選重新執政後，為達到「去英國化」的志業，對愛爾蘭語的推行更是不遺餘力。1932

¹⁴⁴ 請見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4%9B%E7%88%BE%E8%98%AD%E8%AA%9E>

¹⁴⁵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前引書, 註 74, p.463.

¹⁴⁶ Desmond, Fennell, "Can a Shrinking Linguistic Minority Be Saved? : Lesson from the Irish Experience." in Haugen J. Einar, Derrick McClure, and Derick S. Thomason, ed., *Minority Languages Toda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2~39.

¹⁴⁷ O'Murchu, Mairtin . "Aspects of the societal status of Modern Irish," in Ball, J. Martin, and Fife, James eds., *The Celt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476.

年 de Valera 規定愛爾蘭語必須列為中學必修課程，畢業資格考也必須加考愛爾蘭語。1934 年語言復興運動進一步向下扎根，使愛爾蘭語成為中學入學考試科目¹⁴⁸。1937 年由 de Valera 所制定的「愛爾蘭共和國憲法」第八條當中明訂：愛爾蘭語成為第一官方語言，英語則淪為第二官方語言。愛爾蘭語因為憲法的保障，在法律上取得優勢的地位¹⁴⁹。

雖然在政治人物的制度安排下，愛爾蘭語享有第一官方語言的地位，但實際上愛爾蘭語的使用常只是象徵性與儀式性，非日常生活用語。政府投入資金與人力進行愛爾蘭語復育計畫，成效卻相當有限。公務人員雖然需要通過愛爾蘭語認證，洽公的民眾仍多使用英語。因此即使公務人員精通愛爾蘭語，平日使用的機會也不多¹⁵⁰。在學校教育方面，就算政府編列再多的預算，透過教育體系鼓勵學生學習愛爾蘭語，設計愛爾蘭語認證考試，一旦自學校畢業，愛爾蘭語就不再於日常生活使用。平時的商業活動，更不是透過愛爾蘭語進行。

(圖 10 約置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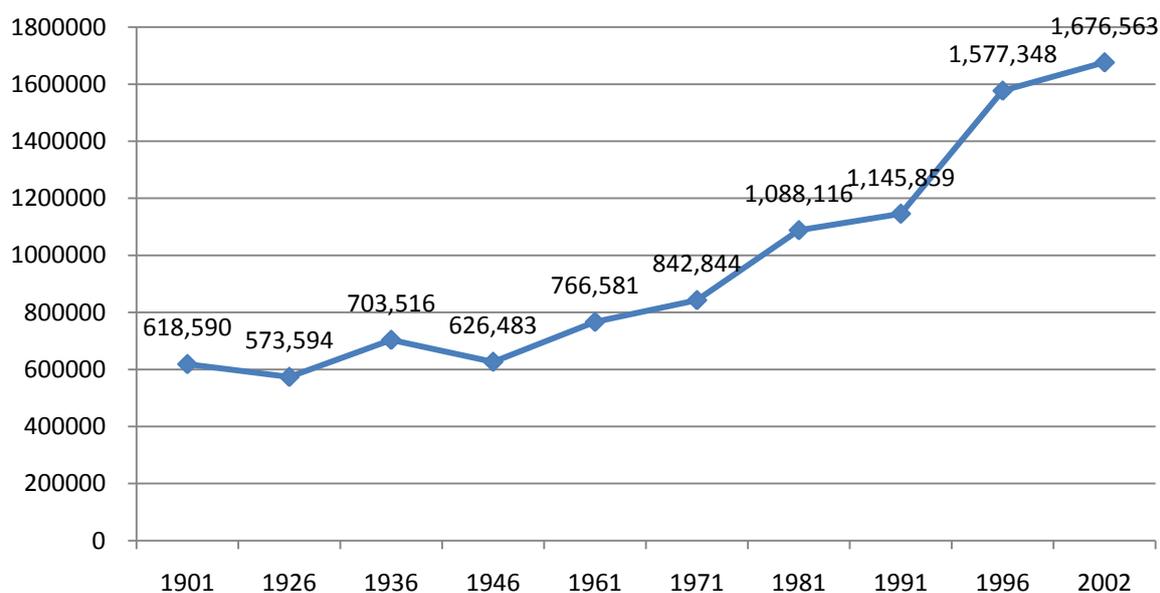
(圖 11 約置於此)

¹⁴⁸ 張學謙，前引書，註 138，頁 173。

¹⁴⁹ 憲法全文請見 [http://en.wikisource.org/wiki/Constitution_of_Ireland_\(original_text\)](http://en.wikisource.org/wiki/Constitution_of_Ireland_(original_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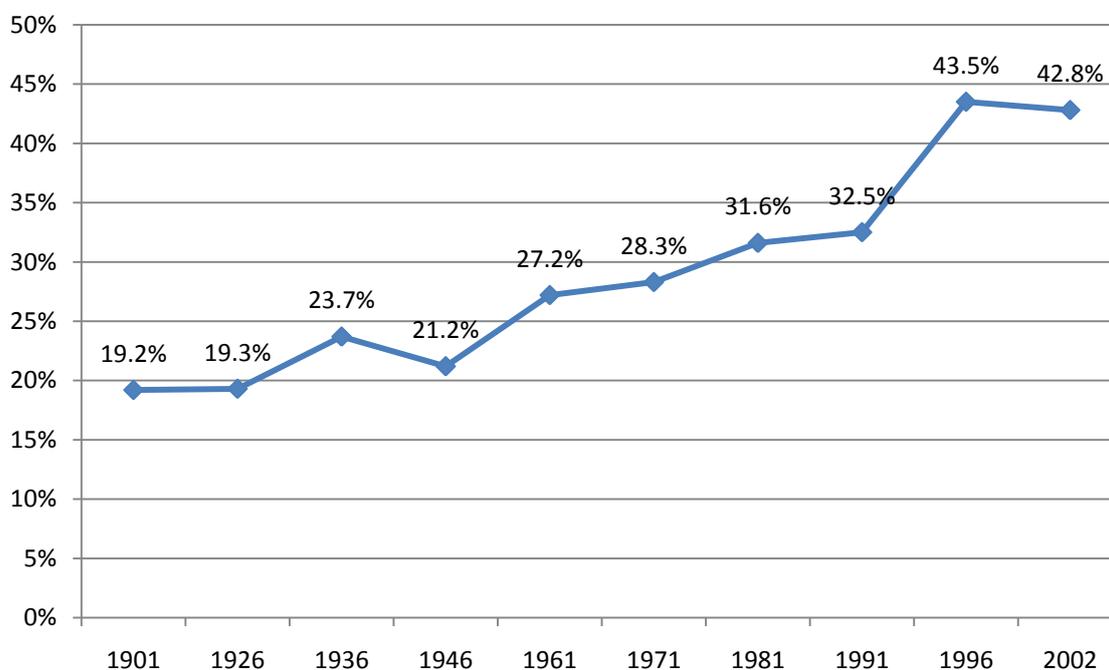
¹⁵⁰ Sean O'Bradaigh, 前引書，註 141。

圖 10 1926-2002 愛爾蘭語人口總數



資料來源：節錄自節錄自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ledge,2005), p.463 再由作者編繪。

圖 11 1926-2002 愛爾蘭語人口數占總人口數百分比



資料來源：節錄自節錄自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ledge,2005), p.463 再由作者編繪。

依據圖 10 普查資料顯示，從 1901 年到 2002 年，愛爾蘭語人口約增加了 105 萬人。1926 年至 1946 年是愛爾蘭語復興計畫推行的高峰期，但若換算成圖 11 人口比例可以發現到，在此二十年間愛爾蘭語人口比例自 19.3% 提升至 21.2%，僅僅增加不到兩個百分點。到了 2002 年雖然全愛爾蘭有 42.8% 的人表示自己「會說」愛爾蘭語，乍看之下超過四成。但是 2006 年另一項調查中，所得的結果卻是全愛爾蘭只有 3% 的人口，也就是 12 萬 6 千人，會在日常生活中「頻繁使用」愛爾蘭語¹⁵¹。其餘 97% 的人，不是很少說愛爾蘭語就是根本不會說愛爾蘭語。

語言和政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民族主義掛帥的政治人物常藉由愛爾蘭語式微的事實，作為外來殖民壓迫的證據，愛爾蘭語的復興運動也因此和獨立運動產生連結。在過去以農業為生產主力的時期，或許還有較佳的條件推行愛爾蘭語運動。但就在愛爾蘭產業轉型為第二甚至第三級產業導向的同時，去「英國化」的語言政策等同自動放棄先天的優勢。英語不只是在愛爾蘭的強勢語言，而且是世界的強勢語言，基於實用的理由，愛爾蘭人民自然選擇了英語。面對意識形態與經濟成長的矛盾時，種下了愛爾蘭語復興的失敗因子。

接下來，本研究要探討的是 1938 年英愛經濟戰爭結束後，1940 年代愛爾蘭自由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經濟與外交政策。在愛爾蘭島上，執政的 Fianna Fail Party 持續鎖國政策，在經濟上閉關自守。在外交領域上，1940 年代國際上最重要的事件，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歐洲戰場，愛爾蘭堅持中立政策，拒絕加入以英、美為首的同盟國來對抗軸心國。

即使進入 20 世紀愛爾蘭自由邦成立，愛爾蘭仍有很長一段時間還是延續殖民時代的經濟型態，農牧業人口佔大多數，其次才是服務業和工業¹⁵²。

¹⁵¹ 由愛爾蘭統計局所發布之普查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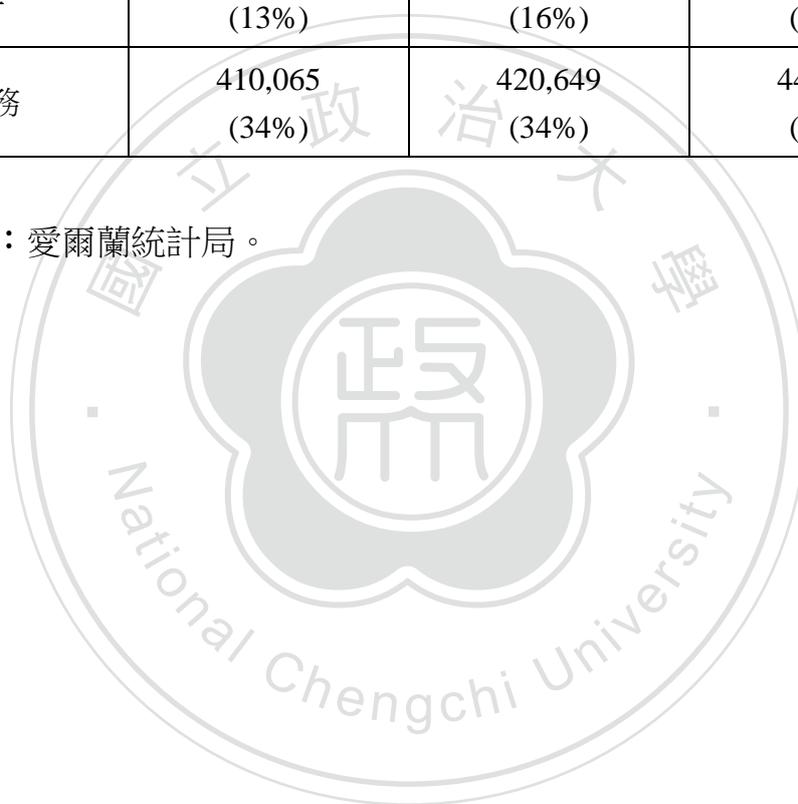
¹⁵² Gerry O'Reilly, "Economic Globalizations: Ireland in the EU-1973-2003", *Acta geographica Slovenica*, Vol. 44, no.1(2004), p.53.。

表 4 1926-1946 愛爾蘭農、公、服務業人口比例

單位：人

職 業 \ 年 度	1926	1936	1946
農	654,108 (53%)	613,353 (50%)	575,083 (47%)
工	158,841 (13%)	201,422 (16%)	208,138 (17%)
服務	410,065 (34%)	420,649 (34%)	444,524 (36%)

資料來源：愛爾蘭統計局。



由表 4 可知，愛爾蘭在 20 世紀中葉以前，農業一直都是生產主力，農業人口約佔總就業人口的 45% 到 55% 之間。至於工業方面，就如同前文第二章所述，英愛條約簽訂後，愛爾蘭島北方的工業重鎮 Ulster 屬於英國直接管轄，愛爾蘭自由邦的製造出口業僅能靠農業部門支撐¹⁵³。愛爾蘭缺乏天然資源，一直以來以農牧業為主要產業，是個被孤立且貧窮的國家，1932-1938 年對英國的經濟戰爭，又更一步限制了愛爾蘭的經濟成長。1938 年愛爾蘭與英國雖然簽訂英愛貿易協定(*Anglo-Irish Trade Agreement*)，終止兩國長達八年的經濟戰爭，但在 1940 年代 Fianna Fail Party 執政期間，主政者 de Valera 仍信奉保護主義經濟政策，反對愛爾蘭與他國貿易。對於國家的財政赤字，de Valera 主張削減政府花費來平衡赤字。雖然 de Valera 指派立場相對開放的 Lemass 擔任工商部部長，Lemass 在任內屢次提出重大內政建設，但並不被 de Valera 接受。de Valera 主張應該勤儉治國，藉由推動自給自足的國內經濟來提高國內的就業率，工商活動也要以國內市場為主，不歡迎外資企業到愛爾蘭投資，也不鼓勵本國企業向外發展。de Valera 追求愛爾蘭在經濟上完全的自給自足，所以並無推動國際貿易的措施，甚至禁止外國企業進入愛爾蘭市場，不願讓外資企業在國內市場獲得任何利益¹⁵⁴。但為了滿足國內工商發展所需，de Valera 選擇推動建立國有事業，諸如企業信用公司 (Industrial Credit Corporation)¹⁵⁵、愛爾蘭糖業公司 (Irish Sugar Company)，泥煤發展委員會 (Turf Development Board)、愛爾蘭航空 (Aer Lingus) 等國營企業¹⁵⁶。諸多依靠政策保護的國營企業，根本無法面對外來的競爭，促使政府的產業政策更加保守，經濟環境更加封閉。

de Valera 急於尋求愛爾蘭獨立自主的心態，也反映在愛爾蘭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外交策略上。1939 年希特勒入侵波蘭，英國政府向德宣戰，愛爾蘭卻在

¹⁵³ Daniel, T. K., "Griffith on His Nobel Head: The Determinants of Cumann na nGaedheal Economic Policy, 1922-32," in O'Grada, Cormac, ed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since 1870*, (Hants: E. Elgar, 1994), p. 56.

¹⁵⁴ Lee, Joseph, 前引書，註 130, pp. 224-236.

¹⁵⁵ 即為今日的愛爾蘭銀行前身。

¹⁵⁶ Burnham, James, 前引書，註 25, pp. 537-556.

英國宣戰次日宣佈中立。de Valera 公開譴責英國對德宣戰¹⁵⁷，並頒布「緊急權力法」(*Emergency Power Act*)授權各級政府機關逮捕現行犯的權力，防止中立政策遭到破壞¹⁵⁸。de Valera 雖然擔心納粹德國橫掃歐洲會破壞民主制度的存續，但長久以來依靠動員仇英情緒來攫取政治利益，他不願意也不敢公開與英國站在同一陣線。在英國方面，為了避免讓自己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1940 年擔任英國首相的 Churchill 提議希望能在愛爾蘭駐軍，由英國負責提供武器和人力防衛愛爾蘭。Churchill 甚至提出「協助南北愛爾蘭統一」為條件，希望愛爾蘭能夠加入同盟國，共同對抗軸心國。de Valera 則是顧忌愛爾蘭人民的感受與自身政治前景，拒絕 Churchill 的提議。除了英國之外，1941 年 12 月美國總統羅斯福也向愛爾蘭施加壓力，希望愛爾蘭能加入盟軍參戰，de Valera 依然不為所動¹⁵⁹。事實上，de Valera 也擔心最後輸的可能是同盟國。在 de Valera 的考量中，若是德國成功攻克英國，那麼與英國同盟將會遭受德國報復，形成一場重大災難，所以愛爾蘭寧願選擇中立¹⁶⁰。除了現實的考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立政策，所代表的還有獨立自主的意義。這相當於 de Valera 向世界宣示，愛爾蘭可以有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必受英國控制。愛爾蘭自由邦雖在名義上仍屬大英國協，但是確有實質上的獨立。

然而歷史證明，de Valera 和過去的愛爾蘭菁英一樣，再度對戰爭的情勢判斷錯誤。中立政策雖然不至於被視為德國的盟友，但未依羅斯福總統的請求加入同盟國，造成愛爾蘭實質的損失。因為愛爾蘭戰時的中立政策，有礙美軍在大西洋的戰略部屬，影響美國朝野對愛爾蘭的觀感。戰後美國協助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對愛爾蘭的放款遠低於歐洲其他國家¹⁶¹。在 1948-1951 年當中，美方放款 127.41 億美元，愛爾蘭僅獲得 1.33 億美元，在十六個接受援助的

¹⁵⁷ Lee, Joseph, 前引書, 註 130, p.246.

¹⁵⁸ 緊急權立法授權政府執行新聞與郵件檢查、合法逮捕「曾犯罪」與「可能犯罪」者。

¹⁵⁹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前引書, 註 45, p. 323.

¹⁶⁰ Lee, Joseph, 前引書, 註 130, pp.247.

¹⁶¹ Lee, Joseph, 前引書, 註 130, pp.305.

國家中排名第十四，僅高於葡萄牙和冰島。de Valera 政府的中立政策，再度傷害了愛爾蘭的經濟情勢與對外的貿易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受惠於美方貸款而快速復興，愛爾蘭的發展卻相對緩慢。在國際因素上，或可歸咎於愛爾蘭在二次大戰期間堅守中立，未給同盟國聯軍明顯的支持。戰後愛爾蘭又拒絕美國的邀約，不願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影響美國放款愛爾蘭的意願。但是愛爾蘭在 1950 年代經濟停滯的最主要原因，還是要歸咎於愛爾蘭共和國獨立後的經濟政策。

John Aloysius Costello(1891-1976)於 1948 年大選中，率領 Fine Gael Party 贏得執政權，雖未獲半數席次也不是最大黨，但已有足夠實力和其他小黨組成聯合政府。律師出身的 Costello 在執政後手段更為激烈，1948 年 11 月在愛爾蘭國會提出愛爾蘭共和國法案(*Republic of Ireland Act*)，宣佈愛爾蘭自此退出大英國協。隔年，英國也承認了愛爾蘭的獨立地位。數百年來一直致力於獨立運動的愛爾蘭，終於在 1949 年正式脫離英國殖民，成立了愛爾蘭共和國。

在第四章中，本文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首先討論愛爾蘭在 1948 年的政黨輪替與獨立建國，緊接著是 1950 年代三回合的政黨輪替。相較於 1932-1948 年由 Fianna Fail Party 長期執政，這段時間是愛爾蘭政局多變的年代。直到 1957 年 de Valera 再度擔任總理並於 1959 年交棒給 Lemass，愛爾蘭共和國的政治才重新穩定下來。而 1959 年開始正是愛爾蘭蛻變的關鍵。總理 Lemass 對愛爾蘭的擘畫，開創了愛爾蘭的新局。

第四章 蛻變的塞爾特之虎

1932-1959 年這 27 年中，有 21 年的時間是由 de Valera 擔任總理，主導著愛爾蘭的經濟外交政策。其中未掌政的 6 年為 1948-1951, 1954-1957, 這 6 年由 John Aloysius Costello(1891-1976)主政¹⁶²。本章將先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愛爾蘭的國內情勢，其中以「1948 年的政黨輪替」以及「1949 年宣布獨立」最為關鍵。至於經濟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愛爾蘭經濟發展持續不振，面對財政赤字，政府主張縮減支出，造成通貨緊縮。到了 1950 代，愛爾蘭經濟雖小有起色，但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的快速復興，愛爾蘭的經濟仍屬後段班。直到 1959 年 Lemass 接任愛爾蘭總理之後，愛爾蘭經濟才開始有真正的發展。「1965 年與英國簽訂 AIFTAA」、「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是愛爾蘭轉型的關鍵。

第一節 二戰後愛爾蘭的國內情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長期執政的 Fianna Fail Party 面對三方面的挑戰：

- 1、Labour Party、Clann na Talmhan 等左派政黨的復興，取代 Fianna Fail Party 在民族主義議題上的主導地位。
- 2、戰爭期間的經濟不景氣與資源短缺到戰後仍延續，人口也持續外流。
- 3、民族主義者不滿 Fianna Fail Party 在愛爾蘭的獨立建國大業上沒有進展。

1948 年的國會大選，Costello 所率領的 Fine Gael Party 的表現雖不如 1944 年，但 Fianna Fail Party 的表現更差。Fine Gael Party 在國會中的席次比例雖然從 21.7% 跌至 21.1%，但 Costello 卻得到 Labour Party、Clann na Talmhan 與 Clann na Poblachta 三個小黨的支持，共同組成聯合政府，中斷了 Fianna Fail Party 連續 16

¹⁶² Costello 曾於 1948-1951 及 1954-1957 兩度獲得國會過半支持，組成執政聯盟擔任總理。

年的執政¹⁶³。Fianna Fail Party 的席次比例則是由 1944 年的 55% 滑落至 1948 年的 46%，跌破 50% 的門檻。1948 年政黨輪替後，新內閣立即召開內閣會議討論愛爾蘭的獨立問題。同年 Costello 前往加拿大訪問，時任加拿大總督的 Harold Alexander(1891-1969)對愛爾蘭問題立場鮮明，反對愛爾蘭自英國分裂出去。在一場酒宴中，原本排定雙方要舉杯互敬對方元首，Alexander 卻臨時取消向愛爾蘭總統遙祝敬酒的儀式¹⁶⁴。家族與北愛爾蘭淵源頗深的 Alexander 更在國宴會場放置北愛爾蘭的圖像，激怒了 Costello。當下，Costello 立即向在場的記者表示，愛爾蘭將脫離大英國協，建立共和國。Costello 返回都柏林後，立刻制定愛爾蘭共和國法案(*Republic of Ireland Act*)，宣佈愛爾蘭退出大英國協。就在國會通過後，1948 年 12 月由愛爾蘭總統簽署公布。為紀念復活節起義，法案訂於 1949 年 4 月 18 日復活節當天生效¹⁶⁵。

愛爾蘭在經濟上雖沒有趕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復興，但在國家定位上卻因此戰爭而有進展。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大英殖民帝國，已非潮流所允許。再加上昔日歐洲的殖民地陸續興起獨立運動風潮，對於愛爾蘭的問題若英國持續打壓，則必須考量國際社會的觀感問題。向來以老牌民主國家自居的英國，也不願被冠上帝國主義的惡名。對於愛爾蘭突如其來的宣佈獨立，英國政府並沒有阻止。反倒是為了保住英國在北愛爾蘭的權益，英國國會在 1949 年通過愛爾蘭法案(*Ireland Act*)，法案中強調英國在北愛爾蘭具有合法的統治地位，除非北愛爾蘭議會同意，否則在任何情況下，北愛爾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自英國分裂出去¹⁶⁶。愛爾蘭法案通過後，對愛爾蘭共和國而言，雖然無法統一全愛爾蘭島，但至少脫離了大英國協，完成長久以來的建國目標。

¹⁶³ Sinnott, Richard, *Irish Voters Decide: Voting Behavior in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Since 1918*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p.46.

¹⁶⁴ 愛爾蘭總統依據 de Valera 1937 年所頒布的憲法而設置，用來取代愛爾蘭總督，僅具象徵性意義不具實權。

¹⁶⁵ Welsh, Frank, 前引書，註 37, p. 324.

¹⁶⁶ Roche, J. Patrick, and Barton, Brian, *The Northern Ireland Question: Nationalism, Unionism and Partition*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9), p. 83.

總理 Costello 雖然建國有功，但他所領導的聯合政府僅僅維持三年就面臨倒閣。1951 年 Costello 推動 *Mother and Child Scheme*，這是一個針對孕婦及 16 歲以下兒童的免費照護計畫。此醫療保健政策雖然立意良善，但卻觸怒了愛爾蘭醫師公會及公會背後的教會組織，認為這個醫療保健計畫不但削弱了家庭的功能，更會讓個人逃避責任，進而造成醫療資源的浪費。事實上，就連聯合政府中的其他政黨都不願支持 *Mother and Child Scheme*。1951 年 Costello 的聯合政府垮台，國會被迫重新改選¹⁶⁷。de Valera 再度率領 Fianna Fail Party 取得執政權。

(表 5 約置於此)



¹⁶⁷ Welsh, Frank, 前引書, 註 37, p. 325.

表 5 愛爾蘭國會主要政黨席次分配及所佔比例

政黨 年度	Fianna Fail	Fine Gael	Labor	Clann na Talmhan	Other	Total
1943	67(48.6%)	32(23.2%)	17(12.3%)	14(10.1%)	8(5.8%)	138(100%)
1944	76(55.1%)	30(21.7%)	8(5.8%)	11(8.0%)	13(9.4%)	138(100%)
1948	68(46.3%)	31(21.1%)	14(9.5%)	7(4.8%)	27(18.4%)	147(100%)
1951	69(46.9%)	40(27.2%)	16(10.9%)	6(4.1%)	16(10.9%)	147(100%)
1954	65(44.2%)	50(34.0%)	19(12.9%)	5(3.4%)	8(5.4%)	147(100%)
1957	78(53.1%)	40(27.2%)	12(8.2%)	3(2.0%)	14(9.5%)	147(100%)

資料來源：選舉結果來自 <http://electionsireland.org/results/general/index.cfm> 再由作者自行重新編繪，網底為總理所屬政黨。

由表 5 可見，1951 年的選舉過後，雖然 Fine Gael Party 在國會中的席次有明顯的成長，席次比例由 1948 年的 21.1% 上升至 27.2%，但卻無法再得到其他政黨的支持。Fianna Fail Party 雖未突破 50% 門檻，仍得以國會最大黨重新組閣。但是在 1954 年的選舉當中，Fianna Fail Party 的席次比例又掉到 44.2%，創下自 1927 年創黨以來的第三低點，執政權二度拱手讓給了 Fine Gael Party 與其他政黨所組的聯合政府。然而，聯合政府同樣未能把握二度執政的機會，受限於左派的意識形態讓愛爾蘭持續陷於戰後的不景氣之中。1957 年國會大選 Fine Gael Party 又輸給了 Fianna Fail Party，de Valera 再度獲得執政權。學者分析 1950 年代政權更迭的原因，多半認為愛爾蘭在獨立建國後，民族主義的口號已不再吸引選民，相較於歐洲各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快速復甦，愛爾蘭在經濟上的疲弱表現¹⁶⁸，引發民眾的不滿¹⁶⁹，選民在意的是獨立建國後愛爾蘭的經濟能否步上正軌。1959 年，年邁的 de Valera 將總理的職位傳承給 Lemass，de Valera 轉任僅具象徵意義的共和國總統，Lemass 執政後提拔的新生代政治人物，成為政府所倚賴的新官僚。Lemass 所領導的 Fianna Fail Party 給愛爾蘭人民相當不同的印象，在經濟政策上放棄了保護主義，堅持自由貿易，面對英國選擇以談判合作代替衝突。雖然批評者認為，Lemass 政府過於崇尚物質主義，但 Fianna Fail Party 在 Lemass 的領導下真的從左翼政黨轉型成為中道政黨，把愛爾蘭帶進一個新的時代。以下本研究要討論 1950 年代愛爾蘭經濟情勢。

觀察 Fine Gael Party 的經濟政策，可以發現在聯合政府當中，Costello 的政策處處受限於其他的政黨。內閣中的左派勢力龐大，讓總理 Costello 沒有太多發揮的空間。雖然 Fine Gael Party 是由主張自由貿易的 Cumann na nGaedheal 改組而成，但在執政的過程當中，Fine Gael Party 卻又被迫走上 Fianna Fail Party 在 1930 年代的老路，施行保護主義經貿政策。Costello 原想效法黨中前輩 Cosgrave 在

¹⁶⁸ 經濟問題在本章稍後會討論。

¹⁶⁹ Sinnott, Richard, 前引書, 註 163, p.34.

1920 年代執政時推行的自由貿易，於是在 1949 年成立了產業發展部(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IDA)，負責招商吸引外資，但由於受到法律及其他左派閣員的牽制，IDA 在初期並沒有實質上的權力。因為依照 1932 年的法令規定，對於有意在愛爾蘭投資工業或設廠的外資，有持股比例的限制，亦即外資所持有的股份不得大於本土股份，在愛爾蘭設廠的外資必須以不影響本土企業生存為原則¹⁷⁰。

如同許多新興的獨立國家，獨立初期的愛爾蘭共和國政府採取偏向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愛爾蘭的保護政策最主要透過關稅與進口配額來執行，藉此扶植本土產業，避免與國外企業直接競爭¹⁷¹。以農業為例，愛爾蘭為了保障小麥的價格，對進口小麥課徵關稅。但對畜牧業者而言，買不到便宜的飼料將提高飼養成本，造成畜牧業的萎縮。又因為畜牧業萎縮，小麥滯銷，最後農業也受害。在工業方面，愛爾蘭的工業以國內市場為主，例如成衣業與製鞋業，若想擴張市場則必須朝海外發展。然而如同前文所述，愛爾蘭多數產業都必須靠保護政策才能夠生存。這些產業無法與他國競爭，但是卻有力遊說國會議員，反對開放自由貿易¹⁷²。長久以來，愛爾蘭一直處於貿易赤字的狀態，IDA 雖有心將愛爾蘭的經濟轉型為出口導向，卻無法在產業結構上做出必要的配合調整。例如 IDA 想放寬外資持股比例、開放出口型外資投資設廠，但是來自左派與民間的力量卻強力反對，因為一旦失去政策的保護傘，這些傳統勞力密集的產業將面臨淘汰。

經貿政策持續閉關自守，讓愛爾蘭在 1950 年代的經濟低度成長。1950-1960 年間，年均 GDP 成長率約 2%，同一時期西歐各國的年均成長率為 3.7%。愛爾蘭人均 GDP 更是只有歐洲其他國家平均的 60-70%¹⁷³。經濟的窘境造成政黨的更

¹⁷⁰ 此禁令一直要到 1964 年 Lemass 政府才撤除。

¹⁷¹ Redmond, Adrian,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Change in Ireland 1949-1999* (Dublin: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reland, 2000), p. 90.

¹⁷² O'Hagan, W. John, *The economy of Ireland: policy and performance of a small European country*, (Hampshire: Macmillan, 1995), p. 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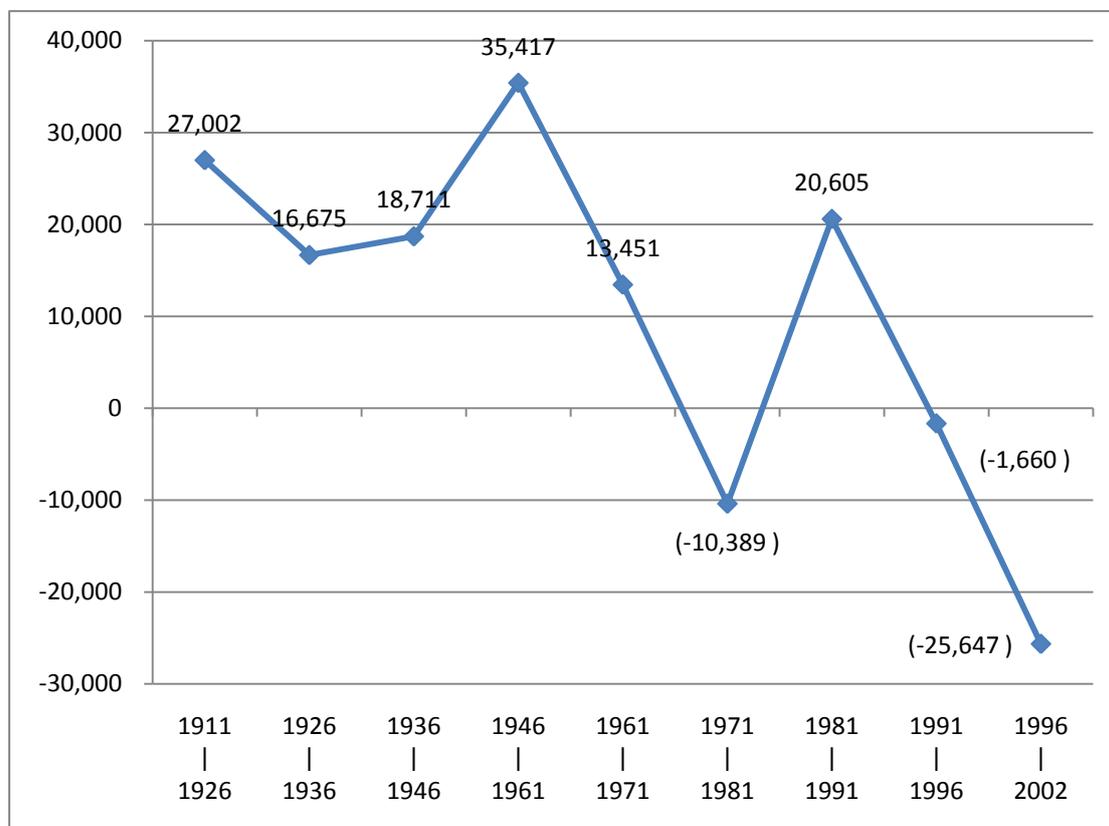
¹⁷³ 前揭書, pp. 34~35.

迭，也造成移民潮。

(圖 12 約至於此)



圖 12 1991-2002 平均每年淨外移人口¹⁷⁴



資料來源：節錄自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lledge,2005), p.464 再由作者編繪。

¹⁷⁴ 圖中正值代表人口淨外移；負值表示人口淨遷入。

由圖 12 可見，進入二十世紀後半葉愛爾蘭的移民潮仍居高不下，並未因糧食問題的解決或自由邦政府的建立而趨緩。移民人口在 1946-1961 年又突然竄升，此期間平均每年有超過三萬五千人的淨移出。在這波移民潮中，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人約有百分之二十外移出走，大大折損了愛爾蘭的競爭力。和過去不同的是，這波移民潮不再是因為英國的殖民政策，不是因為農災饑荒，也不是因為戰亂。追根究底，是愛爾蘭本身疲弱不振經濟所造成。1959 年以前的愛爾蘭共和國的領導人仍未走出保護主義的舊思維，也就無法振興經濟。

同一時間，歐洲正在法國與德國的帶領下，大張旗鼓進行區域整合。1951 年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1958 年正式成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其中以歐洲經濟共同體對愛爾蘭的衝擊最大。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立，代表區域市場的整合。經濟共同體成員間降低關稅去除貿易的障礙，有利於區域內的經濟發展；相對的，被排除在外的國家，要進入市場將遇到重重的阻礙。擔任副總理的 Lemass 深知，愛爾蘭要因應歐洲市場的變化，就必須捨棄保護主義的經濟政策。1957 年 Fianna Fail Party 重新執政後，Lemass 體認到調整國家經濟政策方針與恢復對外貿易的必要性，因此於 1958 年通過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uthority Act*，賦予 IDA 制定產業政策的權力。IDA 負責對外招商，吸引外資到愛爾蘭設廠，並且提供現成設備、教育訓練等協助。IDA 同時有權力給予特定外資在營業稅及所得稅率上的優惠，目的就是要吸引出口導向的外資企業到愛爾蘭投資。愛爾蘭在 1950 年代末期才開始改變方針，錯失了戰後歐洲經濟發展的契機。

愛爾蘭的經濟在二次大戰之後一直沒有復甦的跡象，進入 1950 年代的愛爾蘭，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且人口外移嚴重。面對經濟的不景氣，愛爾蘭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反應在選舉結果上。對比於 1932-1948 年 Fianna Fail Party 的長期執

政，1948-1957 年的政權更迭，對愛爾蘭的政治人物是個警訊，顯示政治人物無法再依靠操作民族議題來獲得選民的青睞。在下一節當中，本研究要探討的是 Lemass 執政後為愛爾蘭所帶來的變化。1965 年的 Anglo- Irish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簡稱 AIFTAA)與 1973 年加入 European Community(簡稱 EC)是愛爾蘭蛻變的關鍵。



第二節 AIFTAA 與 EC

愛爾蘭能夠在 1965 年與英國簽訂 AIFTAA，進一步在 1973 年加入 EC，Sean Lemass (1899-1971) 扮演其中最關鍵的角色。Lemass 於 1959 年起接替 de Valera 擔任總理。Lemass 擔任愛爾蘭總理的時間並不長，但由於他長期在 Fianna Fail Party 內擔任重要角色，因此對愛爾蘭的影響深遠。和 de Valera 不同，Lemass 對復活節起義的貢獻不大，不算是「革命英雄」，直到愛爾蘭自由邦建立之初的內戰期間，Lemass 選擇站在與 de Valera 同一陣線反對英愛條約，成為 de Valera 的左右手，才開始嶄露頭角。在 Fianna Fail Party 內，Lemass 長期擔任經濟方針制定者的角色，1932 年 Fianna Fail Party 贏得大選，de Valera 出任總理，任命 Lemass 擔任工業暨商業部長，使 Lemass 成為當時全歐洲最年輕的部長，又在 1945 年，46 歲的 Lemass 被選為副總理。從 1949 年開始，de Valera 健康情形每況愈下，Lemass 就時常代理 de Valera，逐漸在黨內掌握實權。1959 年 Fianna Fail Party 無異議通過由 Lemass 接替 de Valera 擔任總理職務，此時他已在愛爾蘭政府內服務接近三十年¹⁷⁵。

長期在 de Valera 政府中擔任經濟官僚的 Lemass 深刻體認到，人口外移所造成的生產力下降是愛爾蘭經濟的一大警訊。由圖 12 顯示，1950 年代每年平均外移人口數約為 35,000 人。面對人力資源的流失，政府無可卸責，必須創造就業機會才可能減緩人口外移的趨勢。然而，也僅有具競爭力的產業才是提高生產力與創造就業的契機所在，並非過去特別保護的傳統產業。1958 年先後出現兩份政策白皮書：“*Economic Development*”以及“*The First Program for Economic Expansion*”。前者由 T. K. Whitaker (1916-) 所起草，主張愛爾蘭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必須終止，但此計畫未受 de Valera 重視；後者則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

¹⁷⁵ Wilsford, David, *Political leader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CT: Green Wood Press, 1995), p.276.

1959 年 Lemass 擔任總理後開始依此大力推行自由貿易¹⁷⁶。

The First Program for Economic Expansion 能夠成為政策，除了有 Lemass 的大力支持，也因為此經濟擴張計畫兼顧發展工業與農業，獲得各地區勞工與農民的青睞。選區民眾罕見的主動對國會議員施壓，要求儘快通過相關法案。依據 *The First Program for Economic Expansion* 衍生而出的法案，就在朝野的高度共識下於國會中迅速通過，沒有經過太多的爭論¹⁷⁷。然而，真正促使政治精英和民眾態度轉變的因素，在於經歷了 1930 年代的經濟戰爭和 1940 年代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起的物資匱乏之後，1950 年代的愛爾蘭社會普遍瀰漫著一股先經濟後政治的氣氛，民族主義的口號不再為民眾所接納¹⁷⁸。

Lemass 推行一連串的產業擴張政策。在農業上，放寬農業貸款額度，藉此提升生產技術，刺激精緻農產品的出口貿易；在工業上，除了放寬外資到愛爾蘭投資的限制，IDA 更進一步藉由降低營業稅及所得稅率，吸引外商進駐愛爾蘭，並設專款補助產業創新研發¹⁷⁹。*The First Program for Economic Expansion* 獲得重視的程度，可看出愛爾蘭領導者認知已經改變。降低外資到愛爾蘭投資的門檻，更顯示愛爾蘭不再把自己孤立於國際市場之外，逐步走向貿易自由化。缺乏自然資源的愛爾蘭本就不該，且也無法自外於國際貿易市場。依照地理位置，愛爾蘭與歐洲、美國、英國建立市場關係是無可避免的¹⁸⁰。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成立，帶給 Lemass 很大的衝擊，歐洲整合對愛爾蘭而言是危機也是轉機。*The First Program for Economic Expansion* 的最終目標就是希望愛爾蘭共和國能夠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英國於此時卻又扮演愛爾蘭能否參與

¹⁷⁶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前引書, 註 114, pp.66~67.

¹⁷⁷ Jacobsen, K. John, *Chasing progress in the Irish Republic: ideology, democrac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74.

¹⁷⁸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前引書, 註 114, p.66.

¹⁷⁹ Jacobsen, K. John, 前引書, 註 177, p.75.

¹⁸⁰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前引書, 註 114, p.67.

歐洲經濟整合的關鍵。

在獨立以前，愛爾蘭領導者以追求愛爾蘭的獨立為目標，獨立問題是愛爾蘭與英國最大的爭議所在；愛爾蘭共和國確立後，北愛爾蘭問題成為愛爾蘭與英國的新衝突點。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攻擊活動，連帶衝擊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北愛問題成了愛爾蘭與英國間的不定時炸彈。當國家不安定，風險的不確定性就增高，外資當然卻步。因此，改善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就成為 Lemass 重要的課題之一。

依照政治均衡的觀點，透過國際建制與條約的簽訂可以舒緩緊繃的國際關係¹⁸¹。Lemass 在接任總理後，1960 年就首先針對牛隻貿易與英國簽訂協議，在價格問題上先取得初步共識，進一步則是要處理關稅互惠¹⁸²。Lemass 在 1961 年開始尋求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的機會，然而 1963 年的人會申請卻以失敗收場。當時的財經官員認為，入會申請的失敗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長久以來閉關自守的愛爾蘭，難以取得歐洲經濟共同體其他會員國的信任¹⁸³。因此總理 Lemass 深知「展現誠意」的重要性，愛爾蘭必須說服世界各國，愛爾蘭有決心要採行自由貿易。此時 Lemass 決定先從最大的敵人，但也是最密切的貿易夥伴—英國開始著手。1965 年在 Lemass 堅持下，運用 Fianna Fail Party 在國會中的優勢，主導英愛兩國簽訂 Anglo- Irish Free Trade Area Agreement (AIFTAA)，協議在 1966 年正式生效¹⁸⁴。協議生效前原本英國出口至愛爾蘭的「消費財」平均稅率為 20%；資本財的平均稅率為 14%；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goods) 則為 9%，雙方決定分十年將部分產品關稅降至零，進口總額的限制與保護性的所得稅率也逐年調降¹⁸⁵。

¹⁸¹ Schroeder, W. Paul, 2004, 前引書, 註 16, p.46.

¹⁸² McAleese, Dermot, 前引書, 註 103, p. 95.

¹⁸³ McAleese, Dermot, 前引書, 註 103, p. 96.

¹⁸⁴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前引書, 註 114, p.67.

¹⁸⁵ Jacobsen, K. John, 前引書, 註 177, p.81.

英國方面同樣也對愛爾蘭部分產品取消關稅，主要針對愛爾蘭的紡織品、服飾品、鞋類產品。協議簽訂後，大約只剩五百萬愛爾蘭鎊的產品會被課稅，僅占愛爾蘭出口至英國產品的 15%。就在 AIFTAA 期程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雙方的進出口數量同時增加，增加的幅度也大致相等¹⁸⁶。愛爾蘭與英國在農業與工業上各自具有相對優勢。雙方各自生產本身具相對優勢的產品，貿易自由化使雙方都能獲利。AIFTAA 得利者不只愛爾蘭，英國也獲益良多。

AIFTAA 不僅可以改善與英國的貿易，其簽訂更具有走向貿易自由化的指標性意義。這代表，即使面對英國這位八個世紀以來的宿敵，愛爾蘭也願意與之進行公平互惠的自由貿易。無可避免的，AIFTAA 衝擊了愛爾蘭的傳統產業，這些傳統產業面臨英國產品競爭的壓力。但也就是因為這股壓力，迫使傳統產業轉型走向現代化，可以提早為愛爾蘭加入歐洲共同體做準備。在 1960 年代，農業與工業劃分已不再那樣明顯，愛爾蘭擴張中的工業有許多是來自基礎農業的加工。例如：牛肉加工食品與鮮乳製品，就是來自傳統農業的轉型¹⁸⁷。

Lemass 在 1960 年代帶領愛爾蘭和世界市場建立關係，不但有利於經濟成長，還製造就業機會減緩移民潮¹⁸⁸。1950 年代愛爾蘭的人均 GDP 成長率為 2%；1960 年代結束閉關與保護主義，採取開放貿易和投資的經濟發展政策，人均 GDP 成長率提升為 3.7%。Lemass 的擊劃在 1960 年代就收到了效果¹⁸⁹。可再透過 GDP 的成長率進一步觀察。

(圖 13 約置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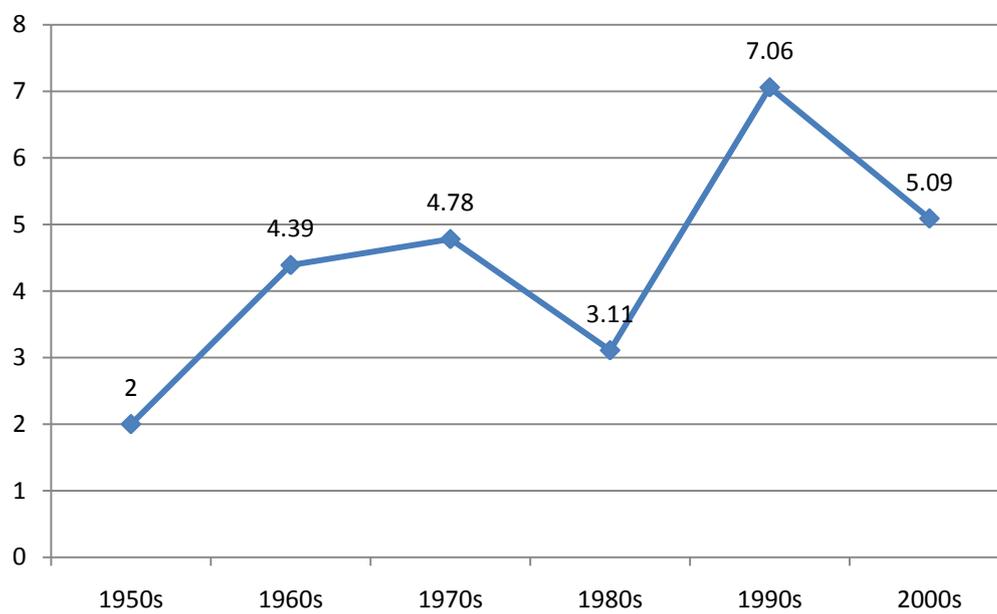
¹⁸⁶ McAleese, Dermot, 前引書, 註 103, p.96.

¹⁸⁷ Jacobsen, K. John, 前引書, 註 177, p.81.

¹⁸⁸ 依據上一節圖 12 所示，平均每年愛爾蘭外移人口數由 1950 年代的 35,000 人降至 1960 年代的 13,000 人。

¹⁸⁹ O'Hagan, W. John, 前引書, 註 172, p.212 ;
Wilsford, David, 前引書, 註 175, p.277.

圖 13 1950-2000 愛爾蘭經濟成長率變化



資料來源：愛爾蘭統計局，經編者自繪。



由圖 13 顯示，1950 年代年均成長率僅有 2%¹⁹⁰，1960 年代實行經濟自由化後，經濟成長漸有起色，年均成長率約為 4.39%。1970 年代年均成長率上升至 4.78%，這要歸功於 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與 IDA 的招商成功。

AIFTAA 的簽訂代表愛爾蘭的產業已經準備好要與世界各國競爭，更重要的是，具備了歐洲共同市場所要求的自由貿易條件。雖然 Lemass 於 1966 年即告病退休，並於 1971 年逝世，但他所指定的接班人 Jack Lynch(1917-1999)繼續他的路線。在 1972 年愛爾蘭的國會中，Fianna Fail Party 與 Fine Gael Party 兩大黨聯手，以超過 80% 的票數通過爭取加入歐洲共同體¹⁹¹。於國際間有了 AIFTAA 的背書，國內又展現朝野的高度共識，愛爾蘭在 1973 年的入會申請中，果真成功與英國同時加入歐洲共同體 (European Community)。第一章的文獻檢閱中曾提及，大多數的學者均認為歐洲的整合絕對是愛爾蘭崛起的重要關鍵之一。

歐洲的整合乃因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國家希望能藉由經濟的整合來強化歐洲的安全。「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及「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在 1967 年合併為一個單一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愛爾蘭雖然未能於 1963 年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但終於在 1973 年時成功加入歐洲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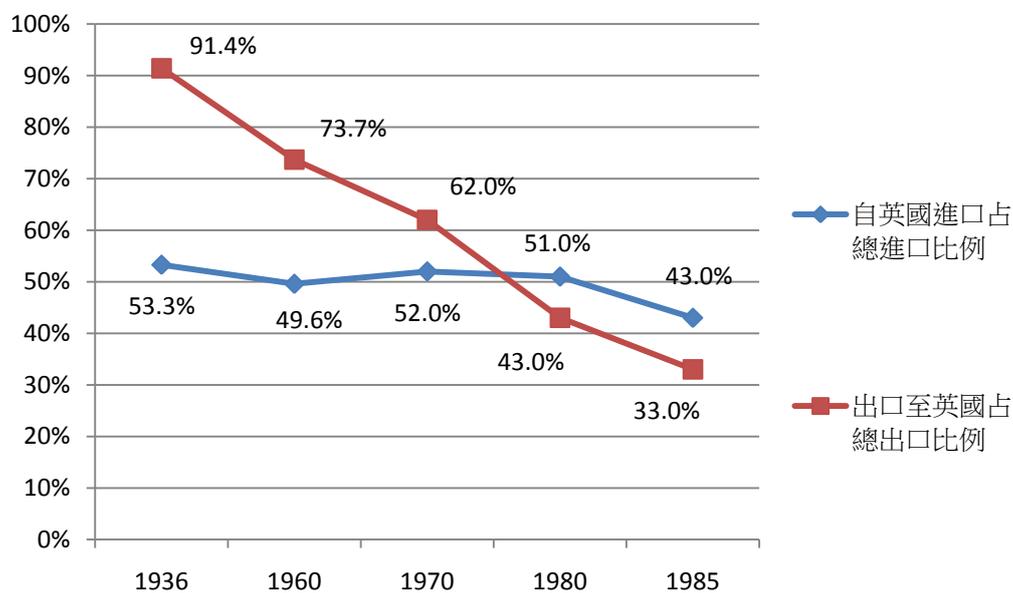
加入歐洲共同體是愛爾蘭重要的轉折點。從經濟利益上來看，歐洲共同體中的各會員國，成為愛爾蘭在英國之外的重要貿易夥伴和國外直接投資的來源。早一步加入歐洲的整合代表早一步搶進歐洲市場，更能進一步擴大出口。

(圖 14 約置於此)

¹⁹⁰ 1958 年出現負成長 2%。

¹⁹¹ Jacobsen, K. John, 前引書，註 177, p. 95.

圖 14 愛爾蘭對英國進出口比例



資料來源：節錄自 McAleese, Dermot “Anglo-Iris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From Excessive Intimacy to A Wider Embrace,” in Drudy, P. J, eds., *Ireland and Britain Since 1922* (London: Cambridge, 1986), p. 88 再由作者編繪。

由圖 14 可見，開放性的貿易政策，除了帶給愛爾蘭經濟發展，擺脫英國的貿易掌控，更是意料之外的收穫。一直以來，愛爾蘭總想在政治與經濟上擺脫英國的桎梏，尤其在經濟層面，過度依賴英國市場一直是愛爾蘭的隱憂。即使經歷了經濟戰爭，1936 年依然有高達 91% 以上的出口市場集中在英國，進口市場也有 53.5% 來自英國。1960 年貿易自由化前夕，英國市場佔愛爾蘭出口貿易的比率仍然高達 73.7%。貿易自由化後，愛爾蘭不再刻意排斥英國市場與資本，藉由 1965 年與英國簽訂 AIFTAA，1973 年與英國、丹麥同時加入歐洲共同體，成功打入歐洲市場。從圖 14 正可觀察加入歐洲共同體對愛爾蘭的影響。歐洲廣大的市場使得愛爾蘭的出口貿易有了新選擇，不再侷限於英國市場。愛爾蘭出口至英國的比率從 1970 年的 62% 下降至 1980 年的 43%，低於五成。此時的愛爾蘭才真正在經濟上脫離對英國的依賴，這正是前人長久以來所追求的目標。由 AIFTAA 和 EC 可知，經濟的互賴與政治主權的完整性並非完全互斥，發展自由貿易提升愛爾蘭的經濟，才真正鞏固了愛爾蘭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除了進出口貿易轉向，外商直接投資也是愛爾蘭逐步擺脫英國掌控的證明。自 1960 年代開始，愛爾蘭政府透過政策積極吸引外商到愛爾蘭投資，IDA 給予出口業優惠的稅率，成功招攬了許多出口導向的外資到愛爾蘭設廠。初期仍以英國資本為主，但愛爾蘭 1973 年加入歐洲共同體後，豐厚的歐洲資金隨之而來。在政策面與市場結構面的雙重作用之下，愛爾蘭的投資活動越來越活絡，1970 年代中期以後，美國與德國企業也逐漸加碼愛爾蘭市場。

愛爾蘭還具有另一比較利益，即語言上的優勢。英國殖民長達八個世紀，為了深化殖民，英國政府將英語教育深耕於愛爾蘭。卻因為語言文化因素，讓愛爾蘭意外在 1970 年代成為美國與歐洲之間的橋樑，獲得大量來自美商直接投資。除了英國之外，愛爾蘭是歐盟國家中唯一的英語系國家，愛爾蘭擁有說英語且教

育水準高的人力資源，且其勞力成本遠比英國便宜¹⁹²。因為沒有語言隔閡，再加上優質的勞動力，愛爾蘭對來自美國的投資者很具吸引力。1970 年代美商在愛爾蘭的投資年增率約為 38%，是美國企業對歐洲共同體其他會員國平均投資年增率的 3 倍。美商企業投資增長，最快速的時期出現在 1982-1994 間，在這段時間裡，美商對愛爾蘭的直接投資總額，超出美商對其他歐盟國家總投資額的 3.3% 以上¹⁹³。美商公司在愛爾蘭投資設廠，再將所生產的貨物轉運至歐洲出售，愛爾蘭因此成為美商公司的中繼站。

這種模式的跨國投資，改善了愛爾蘭的經濟環境，讓原本地處歐洲邊陲的愛爾蘭地位有了極大的轉變¹⁹⁴。1998 年，愛爾蘭已是每人獲得外國直接投資金額最高的國家，並且是外國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毛額最高的國家。而外國投資中，美國企業不論是公司數或投資金額都居首位；愛爾蘭的經濟總產出當中，美國企業就占了 54.1%；在美商公司工作的員工總數約有 9 萬人，占有外資企業就業人口的 64%¹⁹⁵。歐盟東擴後，東歐有更大的廉價勞力投入市場，但愛爾蘭卻有語言的先天優勢，這是其他國家所無法替代的。2000 年愛爾蘭成為已開發國家中，外國直接投資流入的第四名，並且是美國直接投資最大輸入國¹⁹⁶。愛爾蘭的外資公司數目約有三分之一為美商企業，美商在愛爾蘭的資金佔美商在歐盟投資總金額的 25%¹⁹⁷。2006 年美商企業在愛爾蘭投資仍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年投資額超過 610 億歐元¹⁹⁸。由此可知，美國已取代英國成為愛爾蘭最重要的經貿夥伴。

¹⁹² 請見 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2007-2013

(<http://www.ndp.ie/viewdoc.asp?fn=%2Fdocuments%2FNDP2007-2013%2FOverview.htm>)

¹⁹³ Ruane, Frances, and Buckley, J. Pet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rel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Trinity College*, (全文可見於 <http://www.tcd.ie/iis/documents/discussion/pdfs/iisdp113.pdf>)

¹⁹⁴ Roncevic, Borut, "Path from the (Semi) Periphery to the Core: On the Role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IES Proceedings*, no.1 (November 2002), p.13~14.

¹⁹⁵ Rebekah, Berry,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reland: making the most of other people's money," *Lehigh University*, (全文請見 <http://www.lehigh.edu/~incntr/publications/perspectives/v19/Berry.PDF>)

¹⁹⁶ 請見 Enterprise-Ireland (www.enterprise-ireland.com)

¹⁹⁷ Gerry O'Reilly, 前引書，註 152, p. 59.

¹⁹⁸ 請見 "Enterprise Statistics-at a glance, 2006," *Forfas*, (全文請見 http://www.forfas.ie/publications/forfas070117a/webopt/enterprise_stats_at_a_glance_2006_2.pdf)

愛爾蘭之所以能自 1959 年起改變經濟外交路線，且新的開放性政策在國內沒有遭遇保守派的杯葛，Lemass 的作為與當時愛爾蘭國內政治局勢是關鍵。

1943-1958 年間 Lemass 利用 Fianna Fail Party 選舉失敗甚至淪為在野黨時，著手對 Fianna Fail Party 進行黨內改革。由前文表 5 可知，Fianna Fail Party 在 1943 年國會大選中席次比跌落至 50% 以下無法過半，更在 1948-1951 及 1954-1957 兩度失去執政權，顯示 Fianna Fail Party 的民族主義訴求漸漸在愛爾蘭失去效用。於此 15 年間 de Valera 年事漸長，Lemass 時常代行視事，因此在正式擔任首相前，Lemass 在黨內人事與政府政策上就已具有很大的影響力。Fianna Fail Party 的失敗對 de Valera 而言是挫折，但對 Lemass 而言，則是黨內人事整頓的大好機會。Lemass 調整黨的路線，提拔新一代且與其理念相近的政治菁英擔任黨內要職，帶領愛爾蘭加入歐洲共同體的 Jack Lynch 就是此時他提拔的菁英之一。1957 年 Fianna Fail Party 以發展自由經貿為訴求重新獲得 53.1% 的國會席次，取回執政權。年事已高且身體狀況不佳的 de Valera 在擔任兩年總理後，1959 年交棒給 Lemass。此時的 Lemass 早已具有獨當一面的能力，推行新經濟政策自然水到渠成¹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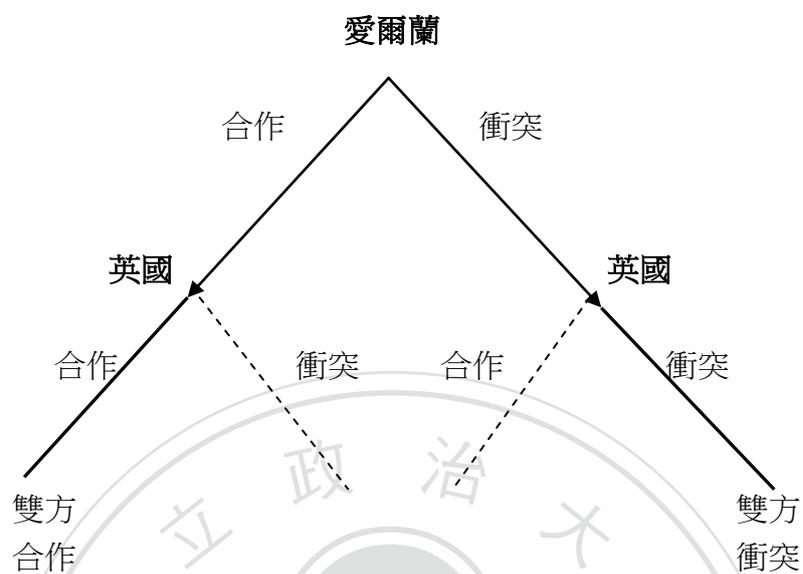
從 Cosgrave 到 Lemass，此二人皆曾是 de Valera 所倚重的專業官僚，兩人在獨當一面後都能勇於走出自己的路，不再受限於 de Valera 狹隘的民族觀。愛爾蘭詩人王爾德在著作中言道：「愛爾蘭人啊，八百年的仇恨忘了吧，對敵人以牙還牙，對同胞就會自相殘殺」²⁰⁰。第一章的表 1 曾以「合作」及「抗衡」描繪出一組 2x2 的英愛經濟外交策略分析表。雖然 12 世紀乃由英格蘭人首先入侵愛爾蘭島，但此後雙方的和戰關係卻取決於愛爾蘭的態度。

(圖 15 約置於此)

¹⁹⁹ 前引書，註 184, p. 276.

²⁰⁰ 吳祥輝，**驚歎愛爾蘭**（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圖 15 愛爾蘭與英國衝突合作分析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如圖 15 所示，當愛爾蘭採取合作的態度，雙方就有很大的機會促成合作雙贏；反之愛爾蘭一旦採取衝突策略，英國方面大多也會衝突以對。進入 20 世紀以後，愛爾蘭與英國的衝突合作關係仍然取決於愛爾蘭本身的經濟外交政策。1919 年的獨立戰爭與 1932 年的經濟戰爭就是雙方衝突的最佳寫照；1959 年 Lemass 接任總理後則是忘卻仇恨共創雙贏的典範。對愛爾蘭的政治人物而言，自由貿易，尤其是在政策上公開支持與英國自由貿易，是項極為大膽的主張，但是對 Lemass 而言，卻是無可厚非的抉擇。當區域經濟逐漸成型，愛爾蘭若不與他國發展貿易關係，不但難以突破，甚至連現有的基本水準都難以維持。因此 Lemass 認為，先與英國發展更緊密的貿易關係，才有指望能夠打入其他歐洲國家市場。由此可見，Lemass 的國家主義不同於 de Valera 偏狹的愛國主義。Lemass 不用情緒化的方式來動員群眾，反倒設法說服人民接受現實，放棄自給自足的口號。

Lemass 擔任首相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第一代的政治人物以 de Valera 為首，靠獨立運動起家，將國家主義置於至高無上之地位。「統一南北愛」、「推行塞爾特語」是主要目標。第二代則是較年輕的專業政治菁英，不受意識形態的教條所束縛，講求實用和經濟發展²⁰¹。普及的英語教育對第一代民族主義者而言代表壓迫、侵略；從實用角度來看，英語卻是愛爾蘭最珍貴的資產。英語或許不是這個國家成功的唯一因素，但是卻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利器之一，讓愛爾蘭成為美國與歐盟的重要橋樑。如同 Lemass 本身所言：「我們不是依照理論行事，而是要用最佳的方法完成任務。」Lemass 所言的任務，就是要發展得以鞏固政治獨立的經濟實力，唯有透過經濟發展才能保障愛爾蘭國家獨立地位的穩固，繼 Lemass 之後的愛爾蘭執政者也深知此道理，不再走向抗衡的老路。

有賴於 Lemass 在 1940 年代起開始提拔新一代專業官僚，因此即使 Lemass

²⁰¹ O'Hagan, W. John, 前引書，註 172, p.277.

退休下野，甚至因病逝世，愛爾蘭的自由貿易之路仍能繼續走下去。1970 年代雖然面臨石油危機和全球經濟的不穩定，愛爾蘭卻因為歐洲共同體，經濟得以加速成長。Charles Haughey (1925-2006) 在 1987 年接掌愛爾蘭總理職務，仿效前人大力推行振興經濟計畫。除了遵行歐洲單一市場的規範，積極吸引外資投入之外，更透過教育大幅提高人力技術水準。在 1990 年代的愛爾蘭經濟快速成長，國民所得倍增，失業率大幅滑落，贏得歐洲「賽爾特之虎」(Celtic Tiger)美譽。根據發行有 30 年歷史的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於 2003 年元月發佈全球化指數(Globalization Index)，愛爾蘭被列為世界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國家²⁰²。



²⁰² 該指數依照外國直接投資、國際旅遊、電信交通、網路服務來衡量。請見：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03/01/01/measuring_globalization_whos_up_whos_down

第五章 結論

在本文第一章，本研究提到以 Waltz 為代表的新現實主義是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國際關係。Waltz 認為，國際結構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框架了互動的個體 (Interacting Units)。易言之，個體層次的國家行為，被系統層次的國際結構所限定，國家的行動，取決於他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權力位置。但在現實世界中，許多國家的行為並不能用國際政治理論來解釋。以本文當中的愛爾蘭為例，1959 年作為前後期的分水嶺，雖然在系統層次上，愛爾蘭的權力在國際中的相對位置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愛爾蘭前後兩期的經濟外交政策卻截然不同。為了處理諸如此類系統層次結構相同，但個體層次行為不同的問題，外交政策理論(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的分析方法因應而生。外交政策理論是要解釋，國家在外交領域上究竟目標是什麼，又在何種情況下會去追求這樣的目標²⁰³。

諸多外交政策理論分析法中，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是最具代表性的途徑之一。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分析國家的外交政策仍要先從國際體系開始，因為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布，仍然是解釋國家行為時最具解釋力的自變數²⁰⁴，可以決定外交政策的大輪廓與大方向。然而，除了國際體系此一外部因素，國家內部因素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也不該被忽略。對於個案的分析，有進一步觀察各外交政策的形成過程與手段，始能獲得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認為，「內部因素」是連結「外部因素」和「外交政策」的中介變數²⁰⁵。而內部因素最重要的觀察指標就是「領導人的認知」與「國家社會關係」。

相較於新現實主義假定所有國家的領導人都是理性的，新古典現實主義學者

²⁰³ Rose, Gideon, "Review: Neoclassical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145.

²⁰⁴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482.

²⁰⁵ Rose, Gideon, 前引書，註 203, p. 152.

主張，「領導人的認知」是根據他主觀所見的國際權力分布而形成的。所謂的權力分布，並沒有一個客觀的量化指標。領導人依據自己的價值標準，對國際政治的權力分布形成認知²⁰⁶。而「國家與社會關係」則是指政府可動員資源的多寡²⁰⁷。一個國家或許國力強大，但弱勢政府中的領導人可能受限於制度或領導人的能力，必須對社會妥協讓步。領導人無法完全自由支配國家資源，只好選擇「受歡迎但是非必要」的政策；相對的，即使一國的國力不夠強大，但強勢政府中的領導人，將有較大的空間可以自由運用國家資源。在此情況下，領導人可以選擇「不受歡迎但是必要」的政府政策²⁰⁸。新古典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分析途徑，正好可以說明為什麼愛爾蘭會在 1959 年開始，從衝突抗衡的經濟外交政策轉變為政治均衡的思考。

從古至今，「獨立自主」、「驅逐英王」是政治菁英屢試不爽的民族主義口號，飽受多年欺壓的愛爾蘭人民，在經濟蕭條的 1930 年代，給「愛國演說者」de Valera 執政的機會。權衡國際上的經濟不景氣，此時 de Valera 的認知為愛爾蘭有機會抗衡英國。再加上 1932 年是 Fianna Fail Party 第一次在愛爾蘭自由邦成立後贏得自由邦政府執政權，亟需擴大支持群眾基礎，因此選擇了受歡迎但不必要的抗衡政策。de Valera 以廢止忠誠誓約和拒繳土地年金為藉口，在 1932-1938 年與英國展開激烈的經濟戰爭。緊接而來的又是一連串倡導自給自足的鎖國政策，保護本土企業，拒絕外資到愛爾蘭投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de Valera 又拒絕與英美同盟合力抗德，堅持中立政策。對 de Valera 而言，自給自足的經濟模式與獨立自主的外交策略才是符合愛爾蘭的國家利益。值此，de Valera 主導抗衡式經濟與外交政策，造成愛爾蘭在他執政期間，持續的低經濟成長率、高失業率與人口外移。

²⁰⁶ Keohane, Robert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 Keohane, Robert,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67.

²⁰⁷ Zakaria, Fareed, 前引書, 註 204, pp.39~40.

²⁰⁸ Rose, Gideon, 前引書, 註 203, p.163.

Lemass 與 de Valera 雖同屬 Fianna Fail Party，但對愛爾蘭國家利益的定義卻有很大的差異，執政時也有截然不同的作為。於外在環境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國家利用美國的戰後貸款快速復興。又鑑於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歐洲各國決定加速歐洲的統合，首先從經濟議題著手。Lemass 面對歐洲市場的整合，體認到愛爾蘭無法再自外於國際市場，過去 Fianna Fail Party 所主導的抗衡式經濟政策只會加深愛爾蘭在國際貿易上的邊緣化。國內政治方面，愛爾蘭在 1948-1957 年經歷了三度的政權輪替，民眾對愛爾蘭經濟的不滿已充分展現，無法再以民族主義的愛國口號搪塞。Lemass 利用 Fianna Fail Party 敗選的機會在黨內進行世代交替。終於在 1960 年代成功結束閉關自守的經貿政策，推行貿易自由化，使經濟成長率逐漸自谷底回升，自由貿易政策漸收成效。1965 年 Lemass 更是勇於選擇不受歡迎但是非做不可的政策，與宿敵英國簽訂 AIFTAA。1973 年繼任為總理的 Jack Lynch 依循 Lemass 腳步，與英國攜手共同加入歐洲共同體，更是賽爾特之虎崛起的重要關鍵。

愛爾蘭在國際政治中的相對權力位置沒有改變，但是因為統治者的認知及國內政治因素，讓國家的經濟外交政策劇烈轉變。1959 年以後的愛爾蘭政治菁英非但不驅逐英國文化，反倒利用愛爾蘭的英語優勢，讓愛爾蘭重新融入國際市場。賽爾特之虎的崛起不是靠槍砲、口號，而是讓世界稱羨的軟實力。

在本文的最後，本研究所要探討的是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外交情勢。「雙贏」是兩岸關係中最響亮的口號，然而雙贏的賽局確有可能因為雙方的政治敵對而「零和」化。即使兩岸關係與英愛關係並不能夠完全畫上等號，但事實上仍有許多相似之處。文化上使用相同的語言，經濟上也同樣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從 1949 年中華民國政府退居台灣以來，外交場域上雙方大多數的時間都呈現爭取正統地位，相互抗衡的狀態。就在國際體系不利於台灣的結構下，繼 1971 年退出聯合國之後，1978 年美國又宣布與中華民國斷交，台灣的外交處境始終處於

下風。到了 20 世紀晚期中國經濟崛起後，台灣愈趨劣勢。兩岸關係成了中華民國政府無法忽視的重要課題，必須思考如何在逆境中取得最佳利益。

(表 6 約置於此)



表 6 兩岸經濟外交策略分析表

中 國 台 灣	合作	衝突
合作	共創雙贏。 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台灣自我孤立。	台灣展現合作的誠意，藉由國際視聽向中國施加壓力。 雙方不顧經濟利益，使衝突升高。兩岸都可能在經濟上受創，對台灣影響尤其嚴重。
衝突	共創雙贏。 台灣成為國際社會眼中的麻煩製造者，台灣自我孤立。	雙方不顧經濟利益，使衝突升高。兩岸都可能在經濟上受創，對台灣影響尤其嚴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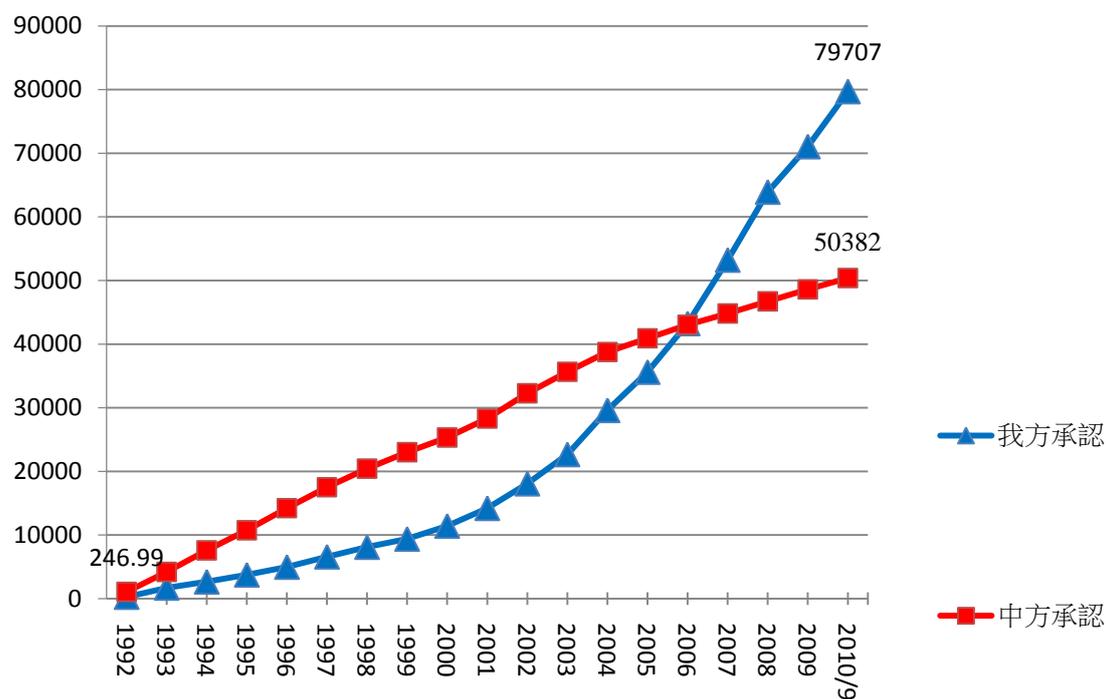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兩岸的經濟關係也可仿照表 1 愛爾蘭與英國經濟外交關係，繪製成如表 6 一個 2x2 的表格。雙方都可以選擇衝突或合作的策略，也都有機會相互合作共創雙贏，但也可能因相互抗衡而雙輸。自 1970 年代晚期中共推行經濟改革，採取對外開放的經貿政策後，海峽兩岸衝突對峙的緊張關係逐漸和緩。1980 年代晚期至 1990 年代初期，台灣方面對大陸政策除了制定「國家統一綱領」，並推行「西進」，兩岸的轉口貿易與台商到大陸的投資，使兩岸商業更加蓬勃發展，雖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稍有停頓，但在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確定中國大陸「政左經右」基調不變後，兩岸商業往來再度復甦。台灣與大陸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具體表現在雙方的貿易量逐年攀升、台商赴大陸投資數量與資本激增兩大方面。

(圖 16 約置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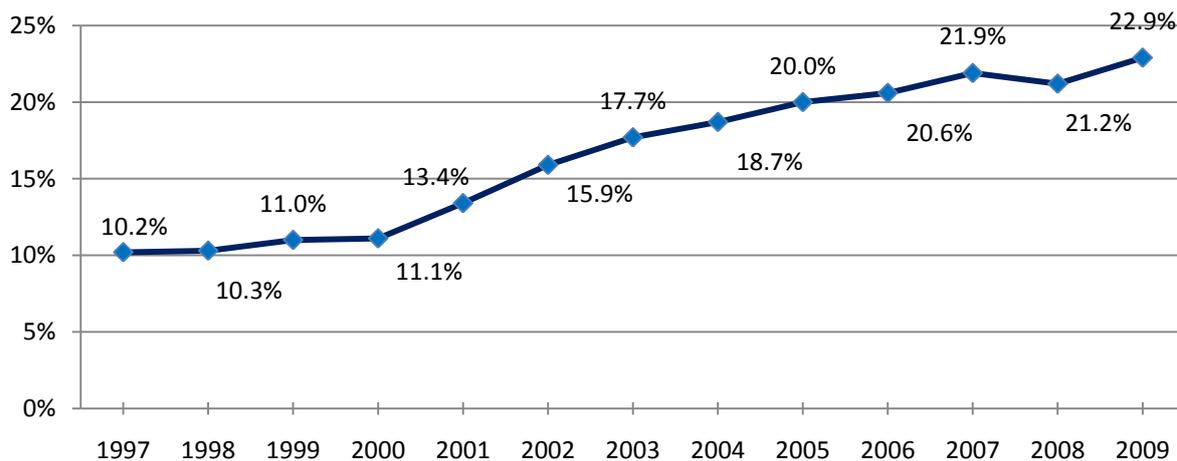
(圖 17 約置於此)

圖 16 歷年台商赴大陸投資累積額度（單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節錄自中華民國主計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再由作者自行編繪。

圖 17 歷年對中貿易佔我國總貿易百分比



資料來源：節錄自中華民國主計處，再由作者重新編繪。

從圖 16 可知，自 1992 年以來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額度大約從兩億四千七百萬美元上升到 2009 年的七百一十億五千八百萬美元。而且從圖 16 中可知，一直以來台商到大陸投資的實際額度一直大於我方政府所掌握的額度。2005 年起我方政府讓台商補申報，政府掌握的數字才較接近實際額度。從圖 17 可知，台灣對大陸貿易的總額占我國對外貿易總額，從 1997 年的 10% 攀升至 2009 年的 23%。兩岸關係與英愛關係最大不同在於，愛爾蘭同時仰賴英國的資本與市場，處於絕對的劣勢；台灣方面雖然需要中國大陸廣大的貿易市場，但台商在中國大陸的投資，卻也是大陸近年來經濟起飛的關鍵。海峽兩岸在貿易上的高度互賴已是不爭的事實，就自由貿易市場的角度而言，以政治力干預兩岸經貿往來可能造成市場的扭曲，不利經濟「雙贏」的出現。但在經貿發展的背後，卻仍必須受兩岸的政治現實性因素所制約。不可諱言，海峽兩岸截至目前為止仍處於「敵對競爭」的狀態，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野心，遠大於英國對愛爾蘭的企圖心，因此在兩岸往來頻繁的經貿交流中，不可能完全排除政治此一關鍵因素。

近年來在區域經濟整合的推波助瀾下，兩岸政府的政策互動所需考量的因素更加複雜，對台灣而言是挑戰也是機會。2003 年十月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高峰會在印尼峇里島宣佈 ASEAN 要在 2020 年前成為第二個歐盟，ASEAN 代表亞洲擁有一個愈來愈強的集體經濟與安全機制。此外，由中國大陸主導的「博鰲亞洲論壇」(Boao Forum For Asia, BFA)，代表著中國大陸在經濟快速成長過程中，努力要發展以中國大陸為中心的亞洲經濟整合²⁰⁹。在東亞的區域整合過程中，台灣似乎已喪失先機。所幸 2002 年 1 月 1 日，台灣正式成為 WTO 第 144 個會員國，為台灣帶來一個新的利基點²¹⁰。若能順應 WTO 所推動的全球貿易自由化，調整台灣的經濟結構來進行全球佈局，台灣才能保有繼續在兩岸經濟賽局中尋求雙贏的經濟實力。

²⁰⁹ 蕭萬長，「亞洲經濟整合過程中台灣的處境」，中華經濟研究院台商電子報(台北)，2004 年 3 月 1 日。

²¹⁰ 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中心 <http://taiwan.wtocenter.org.tw/crossStrait.asp>。

在 1990 年代以前，區域整合的效應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還不顯著，中華民國政府在訂定經濟外交策略時，尚不必過度計算區域整合所肇生的「衝突代價」。但伴隨著區域整合的興起，海峽兩岸都不願自外於自由貿易的建制之外，因此在選擇相互抗衡的策略時，勢必要考量在區域整合下所必須付出的額外成本。自此，兩岸的經貿互動關係不再只是純粹的政治成本計算，還要考量衝突的後果是否會造成無法負擔的經濟損失。從李登輝晚期到陳水扁執政任內，兩人雖屬不同政黨，但統治者的認知還有國內政治情勢發展，讓他們都選擇了受歡迎但是不必要的衝突策略。從「戒急用忍」到「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最後又退守到「積極管理有效開放」，過度保守的經貿政策，致使台商循其他管道出走大陸，台灣經濟因此每況愈下。

2008 年馬英九執政後，此時的中國大陸已是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強權，雖然無法立即以武力取得台灣，但經濟上的實力卻足以對台灣發揮影響力。又因為近年來亞洲經濟整合有加快的趨勢，東協與中國、韓國、日本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將陸續生效，台灣被排擠在這些貿易協定之外。一旦這些區域的貿易往來降至零關稅時，對我國經濟發展勢必產生嚴重衝擊。在世界金融風暴過後，主流民意普遍認為穩定兩岸關係，將有助於經濟發展²¹¹。面對在野黨的質疑，國民黨政府選擇不受在野黨歡迎，但卻是必要的政策，也就是重啟協商修補兩岸關係。藉由觀察愛爾蘭與英國簽訂 AIFTAA 的前因後果，再對照現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的簽訂過程，小國是否能藉由政治均衡的思考在夾縫中突出重圍，攸關小國的經濟命脈。

台灣過去幾年因為統治者的認知，面臨全球化的潮流無法在既有的基礎上守成，口號治國的後果更把台灣帶向鎖國的邊陲之島。在向世界伸張台灣主權之前，應先認清台灣的優勢所在。船堅砲利抗衡式的經濟外交，從來都不是台灣或愛爾

²¹¹ 遠見雜誌 2009 年 4 月份公布的民調顯示，超過七成民眾認為東協的整合將衝擊台灣經濟，而六成的民眾認為兩岸若能簽訂協議，將有助於台灣與東協的經濟合作。

蘭此等叢爾小島的強項，不如運用軟實力在「政治均衡」上另闢戰場。從愛爾蘭的經驗可得到啟發，發展經濟往往是小國的最佳生存之道。面對競爭敵手，也不一定要使用抗衡的策略來凸顯自主性；相對的，若能謹慎與敵手合作，共創雙贏，對小國反而是一大利多。地處大東亞經濟關口的台灣，先天具有中文優勢和高水準的人力素質，就好比地處美國與西歐間的愛爾蘭，在全球化中因為英語而佔盡優勢。領導者應在考量國際體系與審酌國家優劣之勢後，鼓起勇氣做出更有長遠性的經濟外交政策。



參考書目

- 甘逸驊，「北愛爾蘭和平進程：政府間因素與國際勢力的介入」，**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2 期(2004 年 3、4 月)，頁 1~30。
- 杜依庭，「全球化下愛爾蘭經濟發展過程之研究」，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年)。
- 李秋錦，「愛爾蘭經濟發展對我國的啟示」，**台灣經濟金融月刊**，第 42 卷第 1 期 (2006)，頁 1~19。
- 吳祥輝，**驚歎愛爾蘭** (台北：遠流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
- 邵玉進、王鳳鳴，「愛爾蘭經濟奇蹟及原因分析」，**歐洲**，第 4 期 (2002)，頁 88-95。
- 林健次，「愛爾蘭成長模式」，施正鋒、謝若蘭主編，**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9 年) 頁 135~160。
- 周惠民，**愛爾蘭史：詩人與歌者的國度** (台北：三民書局，2009 年)。
- 范盛保，「愛爾蘭的文化意象與主體意識-兼論愛爾蘭文化、產業」，施正鋒、謝若蘭主編，**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9 年) 頁 1~24。
- 張學謙，「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以愛爾蘭語言復振為例」，施正鋒、謝若蘭主編，**當代愛爾蘭民主政治** (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2009 年)，頁 161~192。
- 張亞中，**小國崛起: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台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頁 195~226。
- 張家瑞，「北愛爾蘭問題：衝突與和解」，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碩士論文(民 87)。
- 張勝柏，「論十九世紀愛爾蘭經濟發展的困境」，**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學報**，第 10 期 (2006 年 12 月)，頁 175~194。

蕭萬長，「亞洲經濟整合過程中台灣的處境」，*中華經濟研究院台商電子報* (台北)，2004年3月1日。

Barry, Frank, “Irish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ree Decades of EU Membership,” *Czech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53, No. 9-10, (2003), pp. 394~412.

Burnham, B. James, “Why Ireland Boomed,” *Independent Review*, Vol. 7, No. 4, (2003), pp.537~556.

Canning, M. Paul, “The Impact of Eamon de Valera: Domestic Causes of the Anglo-Irish Economic War,” *A Quarterly Journal Concerned with British Studies*, vol. 15, no. 3 (Autumn 1983), pp. 179~205.

McNally, Michael and Peter Dennis, *Easter Rising 1916: Birth of the Irish Republic*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7).

Coakley, John and Michael Gallaher, *Politics in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Connolly, J. Sean, *Contested Island: Ireland 1460-163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Connolly, Micheal,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in Northern Ireland* (NY: Philip Allan, 1990).

Curtis, E. and R. B. McDowell, , *Poyning's Law: Ir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172-1922*, (London: Methuen & Company Limited, 1968), pp. 83.

Daly, E. Mary, “An Irish-Ireland of Business? The Control of Manufactures Acts, 1932 and 1934,” in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4, no.94 (Nov. 1994).

- Daniel, T. K., “Griffth on His Nobel Head: The Determinants of Cumann na nGaedheal Economic Policy, 1922-32,” in O’Grada, Cormac, e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since 1870*, (Hants: E. Elgar, 1994).
- De Valera, Eamonn, *Fianna Fail and its economic policy*, (Dublin: Nation Executive of Fianna Fail, 1928).
- Desmond, Fennell, “Can a Shrinking Linguistic Minority Be Saved?: Lesson from the Irish Experience,” in Haugen J. Einar, Derrick McClure, and Derick S. Thomason, ed., *Minority Languages Toda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32~39.
- Donnelly, S. James, “Excess mortality and Emigration,” in Vaughan, E. W., eds., *A New History of Ireland V: Ireland Under the Un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Felicity, Heal, *Reformation in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17~127.
- Fiorina, P. Morris, *Retrospective Voting in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Fry, Somerset, and Peter Plantagenet, *A History of Ireland*, (Landon: Routledge, 1988).
- Gilbert, T. John, *The Treaty of Limerick, 1691*, (University College Cork, 2005).
-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Y: McGraw Hill, 1985).
- Henthorn, James, *Cogadh Gaedhel re Gallaibh: The War of the Gaedhil with the Gails* (London: Longmans, 1867).

- Hyde, H. Montgomery, *Baldwin: The Unexpected Prime Minister* (London: Hart-Davis MacGibbon, 1973).
- Jacobsen, K. John, *Chasing progress in the Irish Republic: ideology, democracy, and dependent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Jeremy Smith,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Home Rule to Independence* (Edinburg: Pearson, 2000).
- Kennedy, A. Kieran, Thomas Giblin, and Deirdre McHu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1988).
- Kennedy, Liam, Ell, Paul, Crawford, M. E, and Clarkson, A. L, editions, *Mapping The Great Irish Famine* (Dublin: Four Courts Press, 1999).
- Keohane, Robert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 Keohane, Robert,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167.
- Kinealy, Christine,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mpact, ideology, and rebellion*, (NY: Palgrave, 2002).
- Lee, Joseph, *Ireland, 1912-1985: Politics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Lyons, F. S. L., *Ireland Since the Famine* (London: Fontana, 1973)
- McAleese, Dermot “Anglo-Irish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From Excessive Intimacy to A Wider Embrace,” in Drudy, P. J, eds., *Ireland and Britain Since 1922* (London: Cambridge, 1986), pp. 87~106.
- Mokyr, Joel, *Why Ireland Starved: A Quantitative and analytical history of the Irish economy, 1800-1850*, (London: Routledge, 2006).

- Moley, Raymond, *Daniel O'Connell: Nationalism Without Violence* (NY: Fordham University, 1975).
- O'Bradaigh, Sean” An Ghaeilge Why it is so important,” present at an Education Seminar in Dundalk, (February 20, 2000) (<http://www.rsf.ie/gaeilge.htm>)
- O'Grada, Corma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since 1870,” *Irish Historical Studies*, vol. 27 no. 107 (May, 1991).
- O'Grada, Corma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Ireland since 1870* (Hants: E. Elgar, 1994)
- O'Grada, Cormac, *Black '47 and beyond: the great Irish famine in history, economy, and memor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O'Hagan, W. John, *The economy of Ireland: policy and performance of a small European country*, (Hampshire: Macmillan, 1995).
- O'Malley, Eoin, “The Decline of Irish Indus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iew*, vol. 13, no.1.
- O'Murchu, Mairtin . “Aspects of the societal status of Modern Irish.” in Martin J. Ball and James Fife eds., *The Celtic Languages*, (London: Routledge,1993), pp.471-490.
- O'Reilly, Gerry, “Economic Globalizations: Ireland in the EU-1973-2003,” *Acta geographica Slovenica*, Vol. 44, no.1(2004), pp. 47~88.
- O' Riagain, Donall, “Irish – Official Yet Lesser Used,” presented at the World Congress on Language Policies on Barcelona, (April, 2002). (http://www.linguapax.org/congres/taller/taller3/article21_ang.html)

O'Rourke, Kevin, "Burn Everything British but Their Coal: The Anglo- Irish Economic War of the 1930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1, no. 2 (June 1991), pp.357~366.

Rebekah, Berry, "U.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reland:making the most of other people's money," *Lehigh University*,
(全文請見 <http://www.lehigh.edu/~incntr/publications/perspectives/v19/Berry.PDF>)

Redmond, Adrian, *That was then, this is now-Change in Ireland 1949-1999* (Dublin: Central Statistics Office Ireland, 2000).

Roche, J. Patrick, and Barton, Brian, *The Northern Ireland Question: Nationalism, Unionism and Partition* (Hants: Ashgate Publishing Ltd, 1999).

Roncevic, Borut, "Path from the (Semi) Periphery to the Core: On the Role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IES Proceedings*, no.1 (November 2002), p.1~26.

Rose, Gideon, "Review: Neoclassical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1, no. 1 (October, 1998), pp.144~172.

Ruane, Frances, and Buckley, J. Pete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Irel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Trinity College*,
(全文可見於 <http://www.tcd.ie/iis/documents/discussion/pdfs/iisdp113.pdf>)

Schroeder, W. Paul,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 108-148.

Schroeder, W. Paul, "Why Realism Does Not Work Well fo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Vasquez, John, and Colin Elman, ed.,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rentice Hall, 2003).

- Schroeder, W. Paul,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 Essay o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Schroeder, W. Paul,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 (Palgrave, 2004).
- Schweller, L. Randall,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 Sean O'Bradaigh, "An Ghaeilge Why it is so important," present at an Education Seminar in Dundalk, (February 20, 2000)
(全文可見於 <http://www.rsf.ie/gaeilge.htm>)
- Sinnott, Richard, *Irish Voters Decide: Voting Behavior in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s Since 1918*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mith, Jeremy, *Britain and Ireland: From Home Rule to Independence*, (Edinburg: Pearson, 2000).
- Hayden, *Michael Collins' Own Story*, (London: Hutchinson, 2007).
- Vasquez, John, *The Power of Power Politics: A Critique*, (New Jerse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1981).
- Vasquez, John,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Programs," in John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rentice Hall, 2003).
- Vasquez, John,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ersu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s: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December, 1997).
- Vasquez, John, and Colin Elma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Prentice Hall, 1997).

- Wagner, Harrison,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argaining Power, and Political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 No.3, (Summer, 1998).
- W. J. L. Ryan, "Measurement of Tariff Levels for Ireland for 1931, 1936, 1938" in *Journal of the Statistical and Social Inquiry of Ireland*, vol. 18, 1948-9, pp. 109-133.
- Walsh, Brendan, "The Role of Tax Policy in Ireland's Economic Renaissance," *Canadian Tax Journal*, Vol. 48, No. 3, (2000), pp. 658~673.
- Walt, M. Stephen,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 Waltz, N. Kenneth,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Welsh, Frank, *The Four Nations: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Kingdom*,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ilsford, David, *Political leader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CT: Green Wood Press, 1995)
- Zakaria, Fareed,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482.